

卷首语

端午前夕，眉山举办了“三苏文化沙龙——苏东坡与美好女性”。其实，苏轼对女性赞美亦超前卓绝，如“佳人相见一千年”即为“千年等一回”的滥觞；而“幽梦”则衍生为秦观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至琼瑶“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说无人能懂”，而耳熟能详。现将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素描如下：

一帘幽梦，穿越十年岁月、生死永别和茫茫云海，从千里之外的密州对接夜雨之中的眉山，夜之欲、雨之心、梦之魂，渲染了五光十色的梦呓与黯然神伤的故居。时间岂能涂抹掉十年相伴的千种风情、万种滋味和无限惆怅，不思量，自难忘。

一片相思，梦作纱縠行老宅的芭蕉、竹林、杂花和桐花凤，宽大的蕉叶摇曳着雨后的清晨、轻舞的竹梢传送着晨曦的絮语、淡淡的花香混合着郊外的微风、嚶嚶的鸟鸣诉说着滴落的雨露。芭蕉、竹笼之旁的小屋子，假山、树影之间的小窗子，梳妆、打扮之中的小娘子，不正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弗吗？对镜理云鬓，顾盼生百媚。

你可知道：十年来，我从京城到地方，从杭州到密州，仕途奔波，身心俱疲，心境凄凉，却无法与你诉说啊！飘然出窗的你，一脸惊异，怔怔相向，是因为我旅途劳累、满面风尘吗？是因为我日渐衰老、鬓发如霜吗？相见无期，相逢不识，相顾无言。两行浊泪从岁月斑驳的脸庞滑落，炽热得灼伤了地上的小草。

一缕柔情，俄顷故宅，俄顷孤坟。三万短松断肠、一轮明月入梦，负载十年风霜、十年坎坷、十年凄凉，徘徊、伫立、沉默、倾诉，对明月如霜、夜色如水、千里孤坟。“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啊！这就是我年年肠断的地方啊！

苏轼

研究 SUSHIYANJIU

2011 年第 2 期（总第 25 期）



目 录

□苏学论坛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 编：张志烈
□执行主编：祝 云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08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 年 6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	课题组/ 4
谈苏轼常州所作词	张志烈/ 8
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	王文龙/12
苏轼在词发展演变中的历史贡献	李时英/15
试论苏词中的神话意象	田慧玲/22
苏轼的文学理念创新	
与文化基因的生成机制(下)	杨胜宽/27
苏轼军事思想转变原因初探	唐 瑛/33
浩然之气	
——试探苏轼、苏辙兄弟人格力量之精粹	陈慧君/37
谈东坡“重复自己”	郑秉谦/43
试论苏轼、苏辙《岐梁唱和诗》的意义	葛祥邻/45
苏轼签判凤翔时期政绩述评	任永辉/48
苏东坡与雪浪石	张玉橙/50
随风入俗放飞鸽	
——漫谈苏轼与鸽	钱邦伦/52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靖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希龙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何家治 周成仕
周裕锴 祝 云 涂普生
熊 英 蔡心华

□诗文鉴赏

悼亡沉痛 爱情深挚 夏承焘/54
不思量 自难忘 唐玲玲/55

□新书序评

苏词研究的新探索
——《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评论 潘殊闲/57

□苏学专家

王友胜教授的治学与成就 向二香 吴春秋/61

□研究史话

漫谈苏轼葬邾探因之旅 乔建功 王宪斌/65

□本期关注

苏东坡与美好女性
——辛卯年五月“三苏文化沙龙”综述 廖文凯/71
“美好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李海燕/74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八)
——命运多舛 雷金贵/75
在眉山三苏祠诗二首 龚学敏/79

□苏学动态

东坡为媒 心手相连 共谋发展 王 欧/80
会长办公会在眉山召开 秘书处/80
书讯三则 14 /36/80

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

课题组

内容提要：苏轼遗址地合作遵循既平等合作，又博弈竞争的理念，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就是苏轼遗址地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合作策略，就是苏轼遗址地 18 个市县之间，采取倡议、协议、主导的合作关系，采用研究、传播、应用的合作方式，选择多边、双边、区域的合作途径，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主体。

关键词：苏轼遗址地 合作理念 合作机制

文化巨星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宦游四方，在足迹所到之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苏轼遗址地 18 城市近 30 年来的合作，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研究合作机制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它有利于整合资源、有利于提升品牌、有利于形成合力，促进苏轼遗址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从而实现弘扬苏轼文化、提升城市品牌、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

一、关键概念

（一）苏轼遗址地

“苏轼遗址地”包括苏轼的遗迹和遗址所在的地方。主要指苏轼出生、游宦、贬谪、逝世和安葬的地方，还不包括足迹所到之处，如四川宜宾的牛口坝、江西省修水的来苏村、广西北海的合浦县等。苏轼遗址地涉及 11 个省：四川、河南、陕西、浙江、山东、江苏、湖北、安徽、河北、广东、海南，18 个市县，其中 1 个副省级城市杭州，10 个地市级城市眉山、开封、徐州、湖州、黄州、阜阳、扬州、惠州、儋州、常州，7 个县级或者县市级城市凤翔、诸城、蓬莱、宜兴、定州、邳县、栾城。

（二）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

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是苏轼遗址地为了达到

传承苏轼文化、弘扬苏轼精神、建设美好家园的合作目标，为了达到整合资源、提升品牌、形成合力的合作效果，而运用的合作策略或者苏轼遗址地以什么关系、方式、途径、主体合作的策略。以关系为标准划分，可分为倡议、协议、主导或者松散型、紧密型；以方式为标准划分，可分为研究、传播、应用；以途径为标准划分，可分为多边、双边、区域；以主体为标准划分，可分为政府、企业、社会。

二、合作理念

（一）“平等——首席”理念

平等与首席是相对的两个方面，要平等就不能设首席，而有首席就不可能平等，可是事物就是在矛盾中运动发展的，没有平等或者没有首席，苏轼遗址地合作都必将成为美丽的泡影。

苏轼遗址地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具有相等的地位、拥有相等的权力、享有平等的待遇，不是上级与下级、老师与学生、长辈与晚辈的关系，所以苏轼遗址地之间的合作是平等的、自觉的、自愿的，但不能因此就拒绝合作。合作是载体，苏轼遗址地在合作中认识别人，也在合作中发展自己。

但是平等中也有不平等。人分三六九等，席分东南西北，没有绝对的平等。平起平坐是姿态，但其中的嘉宾席位、最高席位、主人席位，总得有人去坐吧！比如徐州举办活动，徐州就是东道主，就必须牵头，就要花费钱财物。再如中国苏轼研究会自成立起，苏轼遗址地举办活动大都邀请它联合主办，与其他的苏轼研究会相比，不平等吧！这正如后现代主义学者威廉姆·多尔所说的，是“平等中的首席”。没有了这个首席，就没有了牵头，就没有了蛇头，没有了火车头，苏轼遗址地之间的合作就无法进行。

（二）“合作——博弈”理念

博弈，古代指下围棋；博弈也指赌博，比喻为谋取利益而竞争。合作与博弈也可看作是相对的两个方面。

合作对苏轼遗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合作是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交往是个人主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个人如此，一个团队、一个政府、一个地方的发展亦如此，一个苏轼遗址地的发展亦取决于其他苏轼遗址地的发展状况。

博弈是苏轼遗址地客观存在的事实。苏轼遗址地与非苏轼遗址地的博弈是显而易见的，苏轼遗址地之间的博弈也无庸讳言。苏轼遗址地争抢着举办苏轼学术研讨会、纪念活动、东坡节等，就是为了抢占先机。比如黄冈举办活动，就是要研究黄冈、宣传黄冈、发展黄冈，让其他苏轼遗址地为黄冈所用，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只不过与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相比，他是不损人而利己、平等互利而已。

三、合作机制

（一）采取倡议、协议、主导的合作关系

倡议是松散的、自由的、独自的、开放的，不约束、不强制、不统一、不限制，双方或者多方赞成或不赞成、接受或不接受、采纳或不采纳，自己掂量、自己选择、自己做主。因此，倡议仅仅是向其他苏轼遗址地的党委、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已，做不做、怎样做、什么时间做，顺其自然，是松散型的合作机制之一。常常采用倡议书、宣言之类的形式，如2007年11月18~20日，眉山市人民政府在纪念苏东坡诞辰970周年“2007年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上发表了《眉山宣言》，提出了苏轼遗址地“合作发展，和谐共进”的倡议。

协议是紧密的、约束的、强制的、封闭的，对订立协议的双方或者多方有约束力、强制力，必须赞成、接受、采纳，信息共享、步调共进、互惠共有，目标共达，是紧密型合作机制之一。双方或者多方求同存异，协商达成的共识、意见、看法，书面化以备查考，以防纠纷，因此，协议常常采用合

同或者协议书，比如《黄冈惠州儋州友好联盟框架协议》。

主导是合作一方在众多的合作主体中是主要的、重要的、独特的、能够引导发展方向的，它在众多合作主体之中有一定影响、一定资格、一定地位、一定能力，能够发挥一定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是紧密型合作机制之一。可采用联合主办或牵头组织的方式。1980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以来，苏轼遗址地眉山、黄冈、惠州、平顶山、杭州、凤翔、烟台、儋州、诸城、徐州、栾城、郟县、江阴、常州先后与之共同主办了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和7次纪念活动，属于联合主办。眉山市政协策划、组织、编辑《苏轼遗迹遗址》，在拟定目录之后，邀请苏轼遗址地政协文史委撰写该地苏轼遗迹、遗址条目，采用后在稿件末尾署名并付给稿酬，属于牵头组织。

（二）采用研究、传播、应用的合作方式

30年来，正是借助在苏轼遗址地举办“苏轼学术讨论会”的方式，传播了苏轼的生平事迹、诗词文赋和精神品格，推动了苏轼遗址地党委、政府对苏轼遗址、遗迹的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促进了苏轼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苏轼资源的应用。苏轼作品全集、选集的点校、笺注、注释、赏析等多达上百种，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张志烈等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陈迥冬《苏轼诗选》等影响巨大；苏轼生平传记约二百种，发端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曾枣庄《苏轼评传》、王水照《苏轼传》、颜中其《苏东坡》等影响较大；苏轼研究专著约百种，如刘乃昌的《苏轼文学论集》、曾枣庄等的《苏轼研究史》、朱靖华的《苏轼新论》等；苏轼研究论文数量惊人，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成果，在苏轼遗址地的研究者、爱好者、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赠送、阅读、谈论、引用，从而逐步掀起了苏轼文化的热潮，这是苏轼遗址地通过研究方式合作的结果。

本着“传播大于研究”的原则，苏轼遗址地的苏轼文化研究会相继办起了纸质媒介的报刊，并且免费赠送苏轼遗址地和大专院校的苏轼研究学者和广大爱好者。如《三苏祠》（眉山）、《苏轼研究》（眉山）、《中国苏轼研究》（人大）、《苏学通讯》（常州）、《放鹤亭》（徐州）、《东坡文化研究》（黄冈）、

《载酒堂》(儋州)等。但报刊的传播速度、受众、效果是不能与互联网相提并论的。如今专题的“苏轼文化网站”有眉山的“三苏文化研究网”和徐州的“中国苏轼文化网”等。在其它网站中开设“苏轼文化专栏”的有北京的“国学网”、苏轼遗址地的政府网等。为了提高效率,有必要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苏轼研究网”,因为它既是协调机制,又是信息平台。既是信息互动、迅捷、准确的关键,又是合作效率、效果、效用的关键。

本着“应用大于传播”的原则,苏轼遗址地应用苏轼资源进行文化建设和城市建设已蔚然成风。1998年至2002年间,河北栾城运用苏轼资源为当地的文化建设服务,在建设苏东坡祖籍纪念馆的过程中与苏轼遗址地进行了友好的合作,通过论证、调研、搜集、整理,完成了此项文化工程。眉山撤地建市以后,原眉山縣改为东坡区。其街道、学校、建筑、景点的命名,如东坡大道、杭州路、徐州路、东坡中学、远景楼、东坡广场、东坡湖等,其中心城区228条街道的名称都与三苏父子的名字和诗词文赋有关。在眉山东坡湖广场有“东坡醉月”主题雕塑;在眉山通惠河畔有“苏轼徐州抗洪”主题浮雕、“桃柳庵”主题建筑等等。其他苏轼遗址地城市亦如此。运用苏轼文化资源发展苏轼文化产业也需要苏轼遗址地的合作,以畅通信息、提升品牌和形成合力。苏轼遗址地旅游业若缔结旅游联盟,宣传互推、线路互连、客源互送,将大大促进其发展。

(三) 选择多边、双边、区域的合作途径

1980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以来举办的17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既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举办会议的苏轼遗址地政府的双边合作,又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其他苏轼遗址地之间的多边合作。黄冈、惠州、儋州合作主办东坡节亦属于多边合作,苏轼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他们紧密联结在一起,2010年11月18日三市缔结友好联盟,并签订了《黄冈惠州儋州友好联盟框架协议》。

1980年以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苏轼遗址地政府联合主办了17届全国苏轼学术讨论会,皆属双边合作。以“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为例。2009年9月,在徐州召开的会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在常州举办;2010年5月,学会委派工作人员前往调

研;2010年12月《苏轼研究》(总第23期)刊登了征文启事。2011年3月,双方协商初步确定会议议程;2010年6月遴选论文,邀请嘉宾。由此即可见出双边合作的大概。

合作主体也可在某个方面、某个部分、某个层次、某个项目上合作,如苏轼学校的合作。苏轼学校是以苏轼文化作为品牌特色的学校。所谓“品牌特色”是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以苏轼文化作为重点、主体和主题,作为文化符号、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以学校名称为标准可划分为,命名苏轼学校如宜兴市东坡中学、徐州市苏轼小学等,非命名苏轼学校如凤翔中学、定州中学等。以学校地点为标准可划分为,苏轼遗址遗迹地苏轼学校如眉山市苏祠中学、湖北省黄冈中学等,非苏轼遗址遗迹地苏轼学校如成都市苏坡小学等。以学校层次为标准可划分为,苏轼小学如惠州市东坡小学等,苏轼中学如眉山市东坡中学等,苏轼职校如惠州卫生学校等,苏轼高校如杭州东坡专修学校等。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苏轼学校与苏轼文化传播交流活动”既是多边合作,又是区域合作。

(四) 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主体

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主要有牵头主办活动、发表合作宣言、签署框架协议、进行互访交流、东坡学校合作等。牵头主办活动。一般以我主动举办你被动参与的方式,苏轼学术讨论会都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牵头,比如拟定讨论主题面向全国征稿,并从中遴选参加会议的嘉宾。发表合作宣言。2007年11月眉山市人民政府举办的“2007年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上发表了《眉山宣言》。签署框架协议。2010年12月,儋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0年中国海南儋州首届东坡节”之前,签订了《黄冈惠州儋州友好联盟框架协议》。进行互访交流。苏轼遗址地政协在2007年就已经缔结了友好联盟,签署了框架协议。政府合作的牵头部门:有的是政协,有的是文体局、有的是旅游局,有的是研究会……让举办活动的苏轼遗址地在联系时,有无所适从之感,影响了合作的效率。全国苏轼遗址地成立一个合作平台,便于信息交换、合作交流势在必行。

苏轼文化产业就是以生产东坡文化产品满足

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产业。特色之一在于具有苏轼文化的内蕴。特色之二在于突破第三产业的范畴。近年来,前往苏轼遗址地眉山三苏祠、郫县三苏祠与墓、黄冈东坡赤壁、儋州东坡书院等凭吊、瞻仰、观光的游客逐年增加,苏轼文化旅游业发展迅速。苏轼酒楼在苏轼遗址地黄冈、杭州、儋州、徐州、眉山等数量众多,仅眉山就有岷江东湖饭店、东坡国际大酒店、苏轼酒楼、眉山宾馆、味道长、眉山东坡酒楼(眉山店)等,他们以“东坡菜”或者“东坡宴”为特色。眉山的味道长以苏轼诗词为依据创意研发的“东坡文化宴”或曰“东坡味道宴”,有“淡妆浓抹”、“惊涛裂岸”、“春江水暖”、“橙黄橘绿”、“千里共婵娟”等,与其他以东坡创制的“东坡宴”或者“东坡家宴”相比,颇有特色。苏轼酒业潜力巨大。东坡酒业有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中山松醪酒业有限公司、河北省味道府酒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东坡酒业有限公司、湖北省黄冈瓮生香东坡酒业等。这些苏轼文化产业若联合成立产业协会,形成联盟,将会大大提高其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对其他非苏轼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商机不可限量。

民间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亦可成为合作主体。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30年来,苏轼遗址地的苏轼学会、苏氏联谊会等如雨后春笋。这些民间组织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联合型,一是独立型。

联合型,即民间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合二而一,如中国苏轼研究学会。1980年9月成立,2005年1月由四川大学迁到眉山。眉山市委于2007年3月专门成立了全额拨款的副县级事业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作为学会的挂靠单位,因此是民间组织与政府机构的联合体。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后,对全国的苏轼研究给予了指导与帮助,成为我国苏学研究的主导力量。

独立型,即有独立法人的民间组织。其中,有以研究为主和以传播为主两种类型。以研究为主的民间组织,如郫县苏轼研究会(2002年8月成立)、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2002年10月成立)、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2008年3月成立)、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2009年12月成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2010年1月成立)、定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2010年12月成立),等等,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以传播为主的民间组织,如华夏苏

东坡文化传播中心(2010年6月成立),以及各地的苏氏联谊会如上海苏氏联谊会、广东苏氏联谊会、四川苏氏联谊会等。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募集。

参考资料:

欧阳友权主编《文化产业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周成仕主编《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09年版。

周成仕主编《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蔡春林著《金砖四国经贸合作机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陈淑妮著《泛珠三角合作中技能人才整合策略与激励机制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钟汝、范明林著《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张志烈、马得富、周裕锺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成果缩写,刘清泉执笔撰写)

谈苏轼常州所作词

张志烈

内容提要：作者对苏轼所作常州词 6 首：《菩萨蛮》（买田阳羨吾将老）、《浣溪沙》（倾盖相逢胜白头）、《浣溪沙》（炙手无人傍屋头）、《浣溪沙》（菊暗荷枯一夜霜）、《浣溪沙》（几共查梨到雪霜）、《蝶恋花》（云水萦回溪上路）等的背景、内容进行分析、解说，言简意赅，引人入胜。

关键词：苏轼 常州词 简说

苏轼在常州、润州、真州一带所作词近 30 首。今将其在常州境内所作词 6 首，作一简约说明。

菩萨蛮

买田阳羨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
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 有书仍
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
风雨时。

此词作于元丰七年（1084）九月下旬，在宜兴买田已成之时。苏轼元丰七年由黄赴汝，沿长江东下，六月底达金陵，约八月十四日离金陵至真州，州守袁陟以学舍作为其临时居所。住真期间时来往京口，计居真二十余日。九月下旬始经常州到宜兴。词中洋溢买田归老的自适情怀，是在宜兴买田已成的口气，故应作于宜兴境内。

自贬黄以来，苏轼就在筹谋买田归老。如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就曾亲到黄州东南三十里之沙湖相田。元丰六年八月，曾遣儿子苏迈，往荆南买田，同时与杨元素、陈季常、乐京都曾商议买田之事。最后都未买成。赴汝途中，曾欲在金陵买田，未成。了元（佛印）欲助其在京口买田，亦未成。正如苏轼在《次韵叶致远见赠》中所说：“欲求五亩寄樵苏，所至迟留似贾胡。”这段时间心中一直悬念着。

宜兴买田成功，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实现

的，其愉悦情绪可想而知。再者，卜居宜兴又本是苏轼长时间的宿愿，在真州时与任职江淮荆浙发运使的同年友蒋之奇相见所作《次韵蒋颖叔》诗，很清楚地说明此点：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①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早在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兄弟同榜进士及第，在参加新进士琼林苑宴会时，言及宜兴风光，苏轼遂与他相约卜居阳羨。这件事可以说是苏轼一生的“常州情缘”的发端。清人王文诰解此诗时说：“江淮发运使置司真州，时蒋之奇正在真也。公自金陵访求田宅过此，初无意于真州，及遇袁陟，始有寄家之事，而蒋之奇又为谋宜兴田事，因有此作。其乞常之根，实肇端此诗也。”又说：“归宜兴事，始于蒋之奇，而成于蒋之奇。故唱和诗皆及宴坐相约之事，此非无因发也。如不谓然，则公方自金陵至真，其他距宜兴亦甚悬隔，何由知黄土村有曹庄田，事在必成，而经纪其事者，又适有此蒋生乎？此乃之奇预知其乡有曹庄田之可得，而遣其族人购之。故公自齐安以来，求田甚难，而至是则一拍即合也。”王氏所言甚确，尚有许多材料可证，兹略。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苏轼此前曾亲到过宜兴一次，那是熙宁七年（1074）春天。熙宁六年十一月，苏轼以转运司檄，往常、润、苏、秀赈济饥民，次年春天有组诗《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云：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羨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此诗是熙宁七年春苏轼亲到宜兴的证据。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十一记此云：“初游宜兴，泛荆溪，至单锡家获中都公与蒋希鲁谢启。”所言亦甚确。单锡，字君贶，宜兴人，与苏轼同榜进士，又是苏轼的甥女婿，证以苏文《题伯父谢启后》和《祭单君贶文》，知熙宁七年春苏轼到宜兴，泛荆溪，再次表示想要卜居宜兴是不争的事实。

就以上简略引证可知，从嘉祐二年（1057）琼林苑宴会上与蒋之奇相约，到熙宁七年（1074）九月宜兴买田告成，持续28年的“卜居阳羨”心结一朝实现，其情怀之丰富感受可想而知，本词就产生在这时心态的基础上。

首二句言阳羨溪山好，故到此买田归老。“来往”二句，用《庄子·山木》虚船触舟事“人能虚己以游世，甚孰能害之”语意，言自己将虚己而行，随顺自然大化。“有书仍懒著”言以高旷心胸对待穷愁，不似虞卿之穷愁著书。“且漫歌归去”，言将随意吟唱退归田野之志。“筋力”二句，言自己的健康状况尚不辞作诗，但要在感兴触发的时候。“风雨时”：这是苏轼与其弟相约早退的特有话头。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云：“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睢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云：‘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苏轼后在颍州作《满江红·怀子由作》亦云：“辜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

浣溪沙

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卖剑买牛吾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同社宴春秋。

此词作于元丰七年（1084）九月下旬到十月初。细审词中之意，当是在宜兴买田已成之后的心绪；

所赠之友人亦是在宜兴当地者。

“倾盖”句，用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语，言与这位友人相逢虽短却相知甚深。“故山”句，言蜀中老家只能梦中见到其松楸而现实却无法回去。松楸：陵上所栽，以指代祖父坟墓所在的故乡。菟裘，用《左传·隐公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语，指告老隐退之处。“此心”句，是说这里虽非故土，但只要居之心安，亦就是很好的退归养老之地。“卖剑”句用《汉书·龚遂传》：“上以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上文曾谈到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中云：“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这里词中用自己诗中成句，所指都是卜居宜兴、退隐躬耕之意。乞浆得酒：傅注：“《阴阳书》云：‘太岁在酉，乞浆得酒。’”此处言既买田宜兴，得归老林下之田庄，又复能乞居常州，所求已出望外了。愿为同社：韩愈《南溪始泛》诗三首其二：“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盖古农村同社之人，春秋同祀社神。《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飧其胙。”唐人王驾《社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此句是说愿与这位在宜兴新认识的友人卜邻而居。

浣溪沙

炙手无人傍屋头，萧萧晚雨脱梧楸。谁怜季子敝貂裘。顾我已无当世望，似君须向古人求。岁寒松柏肯惊秋。

此词作于元丰七年（1084）九月下旬到十月初，与上首词用同一词牌，内容上意思紧密连贯，而且用韵一样，当为同时且赠同一友人之作。时令、景物、心绪皆是宜兴买庄田已成之后的感触。

“炙手”句，用白居易《放言五首》其四语：“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意谓自己如今潦倒困顿，来往交游的人很稀少。“萧萧”句，言深秋以来的风雨使梧楸之叶脱落，这是用景物烘托上句的感受。“季子”，此指苏秦。《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这里全句的意思是以苏秦事况困顿并巧妙地切姓，亦兼有对这位友人“不我弃”的感谢。当世，犹言

用世，为世所用，干一番事业。“顾我已无当世望”，说看我自己已无望被社会任用了。“似君须向古人求”，说像你这样的朋友，不弃我于困顿，古道热肠，不可多得。此用杜甫《相从行赠严二别驾》成句：“高视乾坤又可愁，一躯交态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须向古人求。”“岁寒”句：言松柏坚贞，不因寒冷而改变，以喻友人之品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这两首词所赠的友人究竟是谁呢？

据词中信息，首先是先前不识的，此次到宜兴才“倾盖相逢”的。其次，此人应是宜兴当地人。其三，其居住地应当离苏轼买田之地不很远。其四，其人当热肠古道，有豪旷性格。从这几点看，我推测此人或许是慕容辉。周必大《省斋文稿》卷十九《书东坡宜兴事》引宜兴主簿朱冠卿续编《宜兴县图经》所载苏轼事有云：“邑人慕容辉，嗜酒好吟，不务进取，家于城南，所居有双楠并植如盖，东坡访之，目为双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诗。”又《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古迹》：“双楠轩，在县城南，慕容晖所居，状如偃盖，东坡为命名。”又《参寥子诗集》卷八有《慕容居士双楠轩》诗。

浣溪沙·咏橘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

此词作于元丰七年（1084）十月上旬到中旬，在宜兴买田已成又尚居停宜兴之时。苏轼一生，喜食柑橘、种柑橘、吟柑橘，关于柑橘的文字较多，还写过一篇比较柑橘异同的《黄柑陆吉传》。但他最欣赏的还是当时出产在太湖中之洞庭山上的“黄柑”，即《洞庭春色赋并引》中所言“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的名品。元祐九年春在定州时，友人钱济明寄来洞庭柑橘，苏轼复简《与钱济明书》中云：“寄惠洞庭珍苞，穷塞所不识，分饷将吏，并戴佳觥也。”这些涉及柑橘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则是其《楚颂帖》：“吾来阳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安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曰

‘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书。”文中说“暇当买一小园”，分明是田庄已买成之后的语气，意谓有空当再增买一处果园。所以这篇《楚颂帖》可以断定是在宜兴买田之后所写，时间是十月二日。为什么会写此贴？很有可能是吃到了当地洞庭特产柑橘名品后有所触发而写。说到吃柑橘的诗，与本词关系最密切的当是元丰六年的《食甘》诗：“一双罗帕未分珍，林下先尝愧逐臣。露叶霜枝剪寒碧，金盘玉指破芳辛。清泉漱漱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坐客殷勤为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贫。”这首词中的“香雾噀人”、“清泉流齿”，显然出自《食甘》诗。写词时櫟括自己诗句是作家常事，然而必得是作诗在前，作词在后。又词中云“吴姬三日手犹香”，荆溪正在标准的吴地，又是在太湖边上食洞庭珍品，故此句移他处不得。故知此词及下首词皆当作于宜兴。

“菊暗荷枯”，言橘熟之时，霜露之下已是菊暗荷枯的初冬时节。“新苞绿叶”，沈约《园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带霜润。”“青黄”，指橘熟时颜色。屈原《橘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香雾”一联，出自苏轼自己的《食甘》诗，诗则用刘孝标《送橘启》语：“始霜之旦，采之风味照座，擘之香雾噀人。”“吴姬”句，即《食甘》诗“金盘玉指破芳辛”之意。

浣溪沙

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木奴何处避雌黄。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含滋嚼句齿牙香。

此首词与上首词同咏橘，而又同调同韵，故必为同时之作。

“几共”两句，言橘柑与查梨同为果类，同经霜雪，同样可口，但橘经人题品称道，便生光辉。《庄子·天运》：“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桀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世说新语·品藻》：“楂梨橘柚，各有其美。”“题品”，品评，品题。李白《上韩荆州书》：“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这里指历史文献中对柑橘的许多赞誉。“木奴”，即指橘树。《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载：吴丹阳太守李衡于宅边种橘千株，临死谓其子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雌

黄”，犹言评论。古人以黄纸书字，有误则以雌黄（一种黄色矿物）涂之，因称改易文字为雌黄。“北客”句，言北方人初来或未见过橘子。“南金”，本指南方出产的铜，引申以喻南方优秀杰出的人才，这里用以喻橘，犹言这南方最珍异最宝贵的特产。

“含滋”，言亲口尝其滋味。“嚼句”，言以诗词吟咏其风采。二者皆得其美，故觉齿牙留香。

这两首词咏橘，描绘了橘子成熟的时令，刻画橘树的形状和果实的美丽色彩，更写出了食橘时的情态和美好感受，其实是通过橘的赞扬，写出了阳羨风物的美好，常州生活的美好，是宜兴买田成功后苏轼愉悦情怀的展现。

蝶恋花

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
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溪叟
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
空田百亩，归来分取闲中趣。

此词作于元丰八年（1085）六月到七月。毛本词题作“述怀”。王文诰《苏诗总案》元丰八年六月：“初闻起知登州，公将行，有怀荆溪，作《蝶恋花》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六载，苏轼由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复朝奉郎、知登州之诏命，下于五月六日。苏轼于五月二十二日至常州贬所，上谢表，六月始得到诏旨。他由常州赴登州是在七月下旬。此词内容，确为行前怀宜兴荆溪之作。春恋田庄山水美景，假设溪叟之语，表现心中为官与归老之矛盾，希望将来能够如愿归来。语言清爽中有沉郁之思。

“云水”三句，描绘宜兴南荆溪上风光。《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常州：“望，宜兴，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一十六乡，湖洑、张渚二镇。有君山、运河、太湖、阳羨溪。”阳羨溪即荆溪。“月白”二句，写荆溪月下澄明清净的景色。“溪叟”三句，假设溪叟旁观之言，展现出内心深处出仕与归田的矛盾。底事，何事，为什么。区区：辛苦劳瘁之意。苦，偏要，硬是要。溪叟私下议论说：为什么那样辛苦劳碌，硬要去当官嘛！“尊酒”二句，说将来自己还是一定要归老于此，享受闲适之趣。这既是表明终极意愿，也是当前解决内心矛盾的自宽之词。“尊酒不空”，用《后汉书·孔融传》：“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恒满，尊中

酒不空，吾无忧矣。’”王文诰评此词云：“词云溪上，即荆溪也。信为起知登州临去所作。自后入掌制命，出典雄藩，以及南迁海外，请老毘陵未克践归来之语。读公述怀此为之怆然也。”（《苏诗总案》卷二十五）王氏的这个体认是比较深刻的。

上面对东坡在常州境内所作的6首词作了简单的说明，本应该打住了。但还有一首词，虽然不是作于常州，但对了解苏轼的常州情怀关系密切，所以这里附带说一说。

满庭芳

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羨，复作一篇。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此词作于元丰八年二月，时在南都（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坡纪年录》元丰八年乙丑：“二月……蒙恩放归阳羨，复作《满庭芳》。”王文诰《苏诗总案》元丰八年：“二月至南都……告下，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再作《满庭芳》词。”苏轼元丰七年十月由常州北上时，于十月十九在扬州向朝廷上了一篇《乞常州居住表》，但是“奏邸拘微文，不肯投进”（见《与王定国》第十六简），就是有关管上奏的官员不给交上去。十二月一日，苏轼到达泗州，拘留泗州期间，又再写了一篇《乞常州居住表》，遣人到京城投交。这是东坡的一篇名文。洪迈称其“略无一佞词，真为可服。”（见《容斋随笔·五笔》卷九）郎晔注云：“公未至汝，上表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表朝入，夕报可。人知神庙之卒喜公也。”苏轼于元丰八年一月未到达南都，得到诏命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为汝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此词即作于得到诏命后。因元丰七年四月离黄州时作了《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故这首词即用其韵。

（下转第14页）

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

王文龙

内容提要：东坡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对矛盾：出仕与退隐、理想与现实、宇宙与人生，东坡词的积极意义在于：对现实人生的热爱、在顺境中的淡泊、在逆境中的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

关键词：东坡词 人生思考 矛盾 意义

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生咏叹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持续不断的人生思考：其广度和深度在词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东坡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涉及面甚广，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

出仕与退隐的矛盾。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①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②、“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③。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④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⑤可见词人仍在出处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⑥这里的“还乡”无疑是“退隐”的同义语。因此可以说，是老子的“功成身退，天之道”^⑦这一高招解救了他（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家的用世与道家的避世结合了起来），并且与前贤左思、李白、李商隐等人生怀抱一脉相通，不过

到头来都只是不能兑现的“画饼”而已。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官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⑧、“人生底事，来往如梭”^⑨。他的漂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人生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⑩。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⑪。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⑫；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⑬；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⑭；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⑮。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

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的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宇宙与人生的矛盾。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厌求”^⑯，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⑰、“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⑱。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他在《赤壁赋》中就从宏观的角度

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在词作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达观的态度相表里。

我以为东坡词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富有积极的思想意义的部分。试为拈出并简述于后。

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很充分。词的上片写对月饮酒时的思想活动，隐约地表现了词人在出处间徘徊的心境，而他的最后选择——“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有力地表明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偏爱。即使词人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⑨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风起，掀舞一叶白头翁”^⑩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⑪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样显示了词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在顺境中的淡泊。元丰末年至元祐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官”的殊遇。

“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⑫元祐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在逆境中的从容。作于黄州时期的写怀之作《定风波》词便是一个显例。上片写途中遇雨时的情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实际上，词人用象征手法写出了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娇·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词人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而代之以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自古以来，士大夫文人在失志之后一蹶不振，

身如槁木而心如死灰者大有人在，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的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这里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⑬而建安作家王粲《登楼赋》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⑭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⑮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⑯。这正是通达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

东坡词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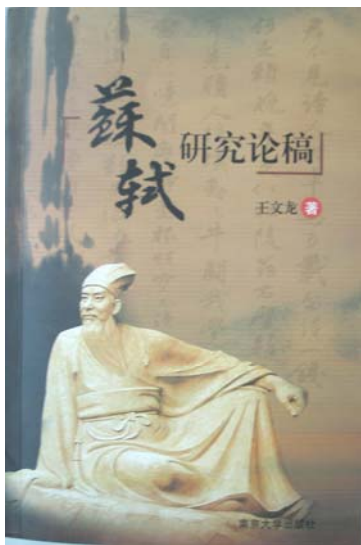
苏轼在其词作中表达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以至精神的滋养。

论文注释：

- ① 《沁园春》（孤馆灯青）。
- ② 《南乡子》（凉簟碧纱厨）。
- ③ 《行香子·清夜无尘》。
- ④ 《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
- ⑤ 《满庭芳》（归去来兮，清溪无底）。
- ⑥ 《南乡子》（东武望余杭）。
- ⑦ 《老子》（九章）。
- ⑧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 ⑨ 《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 ⑩ 《醉落魄》（分携如昨）。
- ⑪ 《满江红》（清颍东流）。
- ⑫ 《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
- ⑬ 《行香子》（三入承明）。

- ⑭《行香子》(昨夜霜风)。
- ⑮《千秋岁》(岛外天边)。
- ⑯《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
- ⑰《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
- ⑱《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
- ⑲《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 ⑳《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 ㉑《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 ㉒《如梦令》(手种堂前桃李)。
- ㉓《南歌子》(见说东园好)。
- ㉔《江城子》(梦中见了醉中醒)。
- ㉕《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
- ㉖《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选自王文龙著《苏轼研究论稿》,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10~213 页。)



王文龙著《苏轼研究论稿》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定价: 36.00 元

(欲购此书, 请与作者或《苏轼研究》编辑部联系)

(上接第 11 页)

词写乞居常州的请求得准, 能够归住阳羨的欣喜心情。上片先从阳羨的美好风光说起, 接着表示对朝廷的感激, 末写掉转船头迅速归去的打算, 展现了请求得准的愉快感。下片以仙游方式抒情, 幻想自己是仙人又回到天上, 借与织女的对话, 反映了在“人间”遭到的困厄和如今能解脱归去的喜悦之情。全词想象奇丽, 情感纵放, 用语洒脱不羁。

“归去”三句, 高兴地宣言自己能归到溪山美好的宜兴居住了。溪指荆溪, 山指阳羨东太湖中包山(即西洞庭山)。“千仞嵯峨”, 形容包山山岭高峻。“画楼”二句, 描绘阳羨地方平野景色。据《桃溪客语》载: 阳羨邵氏, 因东坡此词, 遂名所居曰天远堂。“老去”三句, 言自己未能报效朝廷, 却一再要求朝廷照顾。“弹铗悲歌”, 用《战国策·齐策四》中冯谖事喻自己此前的请求。“船头转”, 言掉转船头, 原来是向汝州走, 现在是向常州走。“长风万里”, 言张帆疾行万里长途。“归马”句, 形容船行如归马下平坡一样快而稳, 《即百步洪》诗中“骏马下注千丈坡”之意。“无何”二句, 言无何有之乡哪里有。《庄子·逍遥游》: “今子有大树, 患其无用, 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银潢”二句, 幻想自己在天上遨游, 在银河的极远处与织女相遇, 织女向自己发问。“何事”二句: 言为什么长住在人间, 久历许多风波险阻。这是借想象中织女的问话, 流露对仕途遭遇的不满。“顾谓”三句: 言自己回头对同来的童子说, 你腰下的斧柄怕已经腐烂了。此用《述异记》卷上: “信安郡石室山, 昔时王质伐木至, 见童子数人, 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 质含之, 不觉饥。俄顷, 童子谓曰: ‘何不去?’ 质起, 视斧柯烂尽。”词中这个镜头是以神仙自比, 表示在人间遭受的挫折不过俄顷而已, 不足道。“青衫”, 唐宋时低级官员服色。苏轼本为知州, 因谪降始着此服。这里说穿上破烂的青衫, 天上群仙笑之为千缕鱼蓑。此话在感叹自嘲中又深藏兀傲之意, 是东坡这段时间精神状态的形象呈现。细读此词, 对体会苏轼的“常州情缘”很有帮助。

论文注释:

①公自注: 蒋诗记及第时琼林苑宴坐中所言, 且约同卜居阳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苏轼在词发展演变中的历史贡献

李时英

内容提要：本文以大量苏轼词为例证，论说苏轼在词发展演变中的历史贡献：开扩了词的境界，使词的表现力更强，内容更丰富；开创词的豪放派；赋予婉约词以新的风采。

关键词：苏轼 词 演变 贡献

词，作为一种诗体，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现异样的光辉。多才多艺的苏轼在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被公认是一座高峰，一位影响深远的引路人。

一、开扩了词的境界，使词的表现力更强，内容更丰富

我们先看看苏轼之前词的发展情况。

词，始见于隋，起初被称为“曲子词”，原是民间一种在宴会上配乐演唱的歌体。盛、中唐时期，文人词逐渐兴起，著名诗人李白、张志和、白居易、刘禹锡皆有词传世。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刘禹锡的《潇湘神》（斑竹枝）等等都是人所熟知的名篇。晚唐时，出现了词的专门作家和作品专集。到了五代，词的内容日渐丰富，格律日趋成熟，艺术水平日见提高，词人的队伍也日益壮大。至北宋初年，词已发展成为与传统诗歌（古风、今体）并行的文学样式。

初、中唐文人词初兴时，题材涉及范围比较宽广，格调也比较高雅。但是，晚唐、五代的一百多年间，词的表现力却明显下滑，题材范围变得十分狭小，风格也偏于柔美婉丽。当时著名的词作家或身处高层，生活优裕，或行为放荡，沉迷女色，其美学趣味皆是倚红偎翠的“艳科”。词界被“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之类戒条所统治，因而排斥了广阔的生活和比较严肃的内容，偏向于描写

男情女爱、别怨离愁和抒发个人伤感之类。选录晚唐、五代十八家词人共五百首作品的《花间集》中，内容大都描写男女相思和女人的闺阁情怀，词风靡丽，浓艳雕琢。以两个代表人物为例。一个是被称为“花间派”的开创者温庭筠。他天资聪慧，文思敏捷；但“有才无行”，经常出入歌楼妓馆。他的《金荃集》（收词七十余首）中几乎是清一色描写享乐生活和男情女爱之作。如《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翠眉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另一个是做过南唐宰相的冯延巳。其词风虽较深婉含蓄，清丽多彩，但内容也多是男女离别相思之情。《谒金门》可见一斑：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授红杏蕊。斗鸭栏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北宋初期，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杰出词人初破藩篱，词的内容略有扩展，但也多侧重于反映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和感时伤事的情怀，词风雍容华贵、缠绵悱恻。

范仲淹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的词打破“词媚”坚冰，意境开阔，风格清新刚健。如描述边塞风光和抒发思乡之念的《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以“云破月来花弄影”、“无数杨花过无影”、“隔墙送过秋千影”而被称为“张三影”的张先，写了不少好词，但内容多是描写花香月色、离情别绪和士大夫生活。如《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境，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

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做过高官，得意于“表现富贵人家景致”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二人，风格颇近冯延巳。晏殊的《浣溪沙》可说是脍炙人口：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小晏追随乃父，作品内容、风格皆极相似。如《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被苏轼终生尊为恩师的欧阳修反对诗文浮艳之风，毫不掩饰地批评“穷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而他的词却受冯延巳的影响较大，与二晏相近，内容多是伤春怨别，词风婉丽。如《诉衷情》：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不过他写颍州西湖的十三首《采桑子》却表现出一种闲雅清新的格调，在当时和以后都颇有影响。如其中之一：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差不多与张、晏、欧同时，柳永将词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向前推进了一步。柳永的词，很适合许多市民的口味，故而流传很广。柳词大都写男女情爱。如《婆罗门令》：

昨夜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
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欹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除了男女情爱，柳词中还有不少描绘都市风光，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和抒发羁旅情怀，如《雨霖铃》（寒蝉凄切）。柳永还创制了许多慢曲新腔，加大了一首词的容量。然而柳词始终未能从内容上突破男情女爱的藩篱和摆脱倚红偎翠的华贵艳体，且有些词的情调不怎么健康。

苏轼年轻时，也曾沿着前辈词人的路子，写过

一些表现男情女爱的作品。如《蝶恋花》：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
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倾诉。

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一个男子的单相思。还有一阕《蝶恋花》，描述少女伤春：

蝶懒莺慵春过半。花落狂风，小院残红满。午醉未醒红日晚，黄昏帘幕无人卷。
云鬓蓬松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

然而，苏轼没有像同时代许多词人那样被“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桎梏。他这人写文章、作诗、填词，叙事、状物、写景、抒情，历来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正像他自己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在苏轼的心目中，诗词皆应是有感而发，为什么词就只能“媚”而不能“庄”，只可“言情”而不可“言志”？这太没道理。他不能接受这种限制。因而毫无顾忌地突破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打破枷锁，放开手脚，“以诗为词”，畅怀直书，从而开拓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对词体的解放和词风的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苏轼的词，题材丰富多样，意境高远开阔，表现手法不拘一格。自苏轼始，词不再只是为应付酒筵歌会、专事抒发男情女爱、别怨离愁、伤春悲秋的香软闺音，而是与诗一样能够叙写各种事物和表达各种思想感情的文学形式。举凡世事沧桑、仕途升沉、人生感悟、忧国胸怀、亲友情谊、交游聚散、江山胜景、田园风物、羁旅情状、怀古伤今、论史谈玄等等，皆可入词。于是，在他的词作中，或举杯对月，心驰神往；或挽弓射猎，慷慨激昂；或描绘江山，雄奇壮丽；或缅怀先杰，沉郁苍凉；或悼念亲人，催人泪下；或芒鞋竹杖，吟啸徐行；或口渴思茶，敲门求饮；或摹写田园，如诗如画；或叙写胸怀，飘逸旷远；或愤世嫉俗，鄙夷功利；或直抒胸臆，傲对人生……总之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

我们先看他几阕“戏作”。

在杭州作通判时，有僧人了然，“六根”未净，暗地与一个名叫秀奴的少女私通。后秀奴被家人发觉，再也不肯见他。一天夜里，了然酒醉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便恼羞成怒，强闯进房，把秀奴杀了。事发后，了然被捕入狱。苏轼审理此案，判处了然

死刑。那判词竟是一阕《踏莎行》：

这个秃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
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
伤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
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了然臂上刺字：“但
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日苦相思。”）

又：元丰七年，他被从黄州改谪汝州，途中，
幼子丧亡，经济上已近囊空如洗。到了泗州，朋友
请他去澡堂沐浴。浴室有代客擦背者，手略重，他
便笑着念道：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
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此词牌原名《忆仙姿》，苏轼嫌俗气，便改为
《如梦令》。

此类事很多。元祐年间，苏轼任杭州知州，离
任时，有两名歌妓跪在他面前，问何故，二妓说：
“大人曾答应我们脱籍从良。”苏轼笑道：“我忘记
了。”说完，随手写下一笺：

郑庄好客，容我樽前时堕帻。落笔生风，
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肌肤那
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二妓看后说：“大人，这……有用吗？”苏轼
道：“有用。”旁边有人告诉她们：“这是一首藏头
的《减字木兰花》，八句话的第一字连起来是“郑
容落籍，高莹从良”。原来那两个歌妓一个名郑容，
一个叫高莹。

上述诸例，可见苏词题材广阔之一斑。

因为这，有人批评苏轼“没规矩”，他却毫不在
意，一笑置之。

苏轼“以诗为词”的积极意义在于：改变了晚
唐、五代以来词的传统，扩大了词的内容，丰富了
词的语言和风格，使词摆脱了对音乐的依附，成为
独立的文学样式。

二、开创词的豪放派

豪放：旷达、爽快而无拘无束。豪放词，意境
广，气魄大，视野高远，宏观，大气，且意气风发，
个性张扬，富于阳刚之美。

在苏轼步入词坛之前的一百多年间，词的风格
多婉转柔媚，史称婉约词；而把以苏轼为代表那种
刚健词风称为豪放词。

自晚唐至宋初，词坛为婉约派所统治。不过，
豪迈风格的词也有人写过。如范仲淹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

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
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
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以长烟落日的景象、边声画角的氛围，烘托出
守边将士的劳苦和离家万里的忧思，写来悲壮苍
凉，深沉抑郁，可算是豪放之作。

稍后，王安石的《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
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
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
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
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
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
犹唱，《后庭》遗曲。

描绘金陵壮丽风光，表达热爱祖国江山的深
情，批判六朝统治者的奢靡生活，抒发对国事的忧
虑和感慨。这对于以婉约为正宗、充满“妇人语”
的北宋词坛，也是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

还有，晏殊的《喜迁莺》（花不尽）、欧阳修的
《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也都具有豪放之风。

但是，范仲淹一生仅留下词五首，而王、晏、
欧只是偶尔为之，并未形成一种倾向，一种风格。
只有到了苏轼，才真正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解除
旧的枷锁，打破婉约独秀的局面，创立新的词风。
《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说是一阕划时代之作。

熙宁七年，苏轼杭州通判任满，被调任密州知
州。那时，西夏、北辽经常派兵侵扰边境，而积贫
积弱的北宋朝廷无所作为，只能以割地赔款了事。
苏轼曾在《策林》中建议加强国防力量，但未被采
纳。因而对堪忧的国事，他时常耿耿于怀。在他
任密州知州的第二年秋天，密州百姓战胜旱、蝗、
盗寇等灾害所造成的饥荒之后，迎来了第一个丰
收。初冬十月，苏轼与众百姓登常山祭庙，以谢神
灵，归途中趁便出猎。那天，猎场上鼓角齐鸣，人
声鼎沸，苍鹰掠地，骏马腾空。苏轼平日很少骑马，
此刻，他仿佛是一位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将
军，满腔是为国杀贼的豪情，遂即兴吟《祭常山回
小猎》七律一首：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下得山来，意犹未尽，又挥毫填《江城子》一
阕：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

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显然，词胜于诗。不过，这一年他虚岁才四十，却自称“老夫”；且自比孙权“亲射虎”。此等豪言壮语，“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自有词以来，未曾见过，与那些香软阴柔之作，迥然不同。

苏轼的豪放词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雄奇瑰丽的画卷。他摒弃了晚唐五代的绮靡香艳，别梦离愁；而代之以袒露豪爽磊落的襟怀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苏轼式的浪漫：叫那些“诗庄词媚”、“诗言志，词言情”之类“规矩”走开些吧，他只要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地释放自己的内心感情。

苏轼入官场之初，怀抱“致君尧舜”的雄心大志，希望自己能成为时代风云的驾驭人。然而仕途失意，壮志难酬。在做了三年杭州通判之后，人家把他扔到旱蝗盗匪并行施虐的密州。但他并不因此灰心丧气，而是与密州百姓一起，尽全力战胜“三灾”，并重修城池街道。暮春时节，他登上新建的超然台，品新茗，抛旧怨，去烦恼，挥笔填《望江南》一阕：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常山出猎之后不久的中秋之夜，苏轼在超然台上宴请同僚。席间，大家一杯又一杯向他敬酒，他很高兴，醉了。于是举着酒杯，仰头问天边明月：“月亮啊月亮，你是啥子时候从啥子地方来的？你看见我弟弟了吗？他是不是也在赏月吟诗？子由贤弟，你现在在做啥子呀？”接着，又踏着自己月光下的影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同事们都带着醉态走了，他却乘兴写下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唐宋以来，有多少诗人、词人望月兴叹，对月伤怀，皓月清辉，却总也与怨愁伤感难解难分；而他苏轼却对着月亮，想要“乘风归去”。可又怕天

外寒冷，不如人间温暖。悲欢离合寻常事，不必在意，给人无限慰藉。通篇并无特别的狂言壮语，却蕴含无限空间。无怪人们将此词誉为“千古绝唱”。有人甚至不无夸张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六年后，苏轼在被贬地黄州，与友人夜游赤壁，和着箫声，吟唱曹操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次日，作《前赤壁赋》。数日后，又夤夜独自驾小舟至赤壁山下，踏月登赤壁之巅，站立在悬崖边上，听江涛怒吼，看雪浪翻腾。面对壮丽河山，他仰天长啸，胸中涌起一股奔放的豪情；想起朋友的话，心中又漾起一丝莫名的伤感：“当年赤壁鏖战的一代英豪，而今安在？人间如梦罢了！”回到临皋，挥笔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同是面对大江，先前，有一位前辈词人模拟女人的口气写道：“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苏轼不喜欢这个，也不想学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来倾诉无限的哀愁与委屈，他要面对壮丽的长江，抒发自己对历史对现实的感慨。

元丰五年九月的一天夜里，被朝廷贬谪黄州的苏轼在新建的雪堂与友人饮酒，夜深时，客人散去，他提灯笼，扶竹杖，独自一人回到临皋。他轻轻敲门，无人答应。顺步来到江边，听涛声阵阵，此起彼伏，觉得自己似在波峰浪谷间浮沉，心中那匹无缰的野马，放开四蹄，向无边无际的夜空驰去……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日日夜夜辛苦经营、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人——神仙——确实令人羡慕。如果真有葛洪那样的修行得道者，我苏轼一定跟着他，驾一叶小舟，随波逐流，随风飘荡，顺大江飘向海洋，飘向天边……可一定神，才觉出原来是孤零零地站在江岸上。于是踏着江边数十级码头走下去，寻出藏在小船中的纸笔，借着灯笼的微光，写下《临江仙》一阕：

刚写完，灯笼就被风吹灭，他只好踏着月色扶着杖返回雪堂，关门大睡。因为这一阕《临江仙》，

引起家人、好友乃至皇帝赵顼一场虚惊，大家以为他真到海外做神仙去了。

阳春三月，他去离黄州不远的沙湖看田，作《定风波》一阕。词前的小引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藐视风雨的狂态跃然纸上，还蕴含哲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淋雨受寒，苏轼病了，找到当地庞姓名医，一针即癒。庞医生邀客同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苏轼作《浣溪沙》曰：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好一个目无“定论”的苏东坡！

贬谪黄州期间，他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隐括为词（《哨遍》），并与好友击节高歌：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五浪语，琴书中有真味。……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有一次，苏轼问一个歌者：“我词何如柳七（柳永）？”那歌者说：“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持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说明苏轼词在依然盛行以柳永为代表的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有着与众不同的全新特色。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词亦如其人。苏轼豪放风格的形成，其实是他疏狂坦爽、乐观旷达性格的反映，是人生感悟的尽情倾吐。

苏轼的豪放词如一声惊雷，震撼了北宋词坛，也引来褒贬纷纷。有人批评他破了“词媚”的规矩，然而赞誉者日益增多，于是，豪放之风，达于四海。一些苏门或非苏轼门下的词人受了他的影响，部分作品也表现出新的豪迈气概，如黄庭坚的《念奴娇》（断虹霁雨）；晁补之的《摸鱼儿》（买陂塘）；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篇皆是。然而，豪放之风，一时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北宋词坛依然是婉约派占据统治地位。就连“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关系

最为密切的秦观在词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较接近柳永而不同于先生。不仅如此，婉约派词人还对苏轼提出尖锐批评。如稍后的李清照说苏词是“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葺之诗”；还有人批评苏轼不通词乐。但他们的看法遭到陆游反对，放翁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直至金兵南侵，大宋半壁江山沦入金人之手，张元干、岳飞、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南宋爱国词人继承苏轼开创的词风，横槊高唱，击筑悲歌，抒爱国情怀，吐豪情壮志，其宏大气魄，如撼地雄风，排空激浪，此时，豪放词派才达到了巅峰。

如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如陆游的《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如张元干的《贺新郎》：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谁伴我，醉中舞？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漫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如张孝祥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如陈亮的《水调歌头》：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

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特别是辛弃疾“以文为词”，题材多样，叙事，言志，抒情，说理，或雄浑奔放，悲壮苍凉；或倜傥婉约，清新流丽：其风格似苏轼而更有发展。

如沉郁悲凉地倾诉满怀忠愤的《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如怀着一片爱国忠忱遭到南宋朝廷冷遇而痛苦不堪的《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揲英雄泪。

如怀古伤今、意境高远的《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如用诙谐曲笔发泄愤懑，醉里憨态活灵活的《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上引诸例，皆千古名篇。

众所公认：没有苏轼，便没有辛弃疾。故后世论词，常苏辛并提。

三、赋予婉约词以新的风采

苏轼虽是豪放派的开创者，但他并不一概反对描写儿女情长的词章，而只反对把词囿限于男情女爱和不合士大夫清高雅正之美学观的市民情趣。比如，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苏轼既推重其全构，又批评“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苏轼赋诗填词，并非着意要做成某种风格，或者一味地抒豪情、吐壮志，而是从内容出发，顺其自然，或雄浑粗犷，或婉约柔美，该刚则刚，该柔

则柔，不刻意追求，不故加雕琢。因此，苏轼的词，时而海雨天风，豪迈奔放；时而缠绵婉丽，柔情似水；时而则刚柔兼及，于豪放中见婉约，或于婉约中见豪放，“端庄清丽，刚健婀娜”，融婉约豪放于一体。《东坡乐府》中，婉约细腻而近于晏、欧、秦、柳的作品，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也写女人，写送别，写离人的思念……但是，他的婉约词飘逸洒脱，落落大方，摒弃了当时流行的绮靡香艳之风，于婉转中洋溢一股素朴清新之气。

在进京应科举考试之前两年，苏轼便与王弗结婚。婚前，他瞒着父母，偷偷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约她在王家园外见面。到了约定时间，他兴冲冲的去了。正值暮春时节，杏树枝头已是红花凋落，绿叶丛中幼果累累。柳林的花絮也正随风飘散。绿水逶迤的王家园园门紧闭，只听见墙内传出少女嬉笑之声。他登高一望，见园中几个年轻女子在打秋千。不知其中有没有王弗，更不知未来的妻子为何不开门与他相会。说不清是惜春的伤感，还是对未来妻子不来赴约的失意，心里不觉生起一丝酸溜溜的惆怅。夜里，灯下作《蝶恋花》一阕，于清雅婉丽之中作旷达豪放之语，两种风格融合其中，浑然一体。（编者注：以上只是一家之言。）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王弗病故。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夜里，他梦见亡妻，醒来作《江城子·记梦》。借夜梦叙思念，诉悲怀，深沉真挚，凄切悲怆，催人泪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也写美景、美人。在任杭州通判期间，他与张先同游西湖。湖中遇一彩舟，有男女数人，皆艳妆丽服，纵情欢笑。独有一佳丽，风姿绰约，文静娴雅，正默然端坐，鼓弄秦筝。那凄凉哀婉之音如传说中湘水女神娥皇女英在倾诉哀伤，叩人心魄。正闭目凝神静听，筝音却渐渐淡远，睁眼看时，彩舟已不见踪影……遂作《江城子·湖上与张先赋，时闻弹筝》。晚霞、乐声、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写景抒情融为一体。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

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宋神宗熙宁六年正月（时任杭州通判），他奉命去各县巡视，与友人放棹富春江。一路上，高天碧蓝，群山郁翠，江水澄澈。天光山色，尽在如镜的碧波中。历历可数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溅起簇簇浪花；点点白鹭在水边沙洲上悠闲漫步……一幅幅美妙的画面从眼前掠过。同行者谈论当年严光拒绝汉光武帝刘秀的邀请，不愿做官而隐居于此，后人赞其高洁者有之，鄙其沽名钓誉者亦有之，问苏轼该如何评价。苏轼淡淡一笑：“褒也罢，贬也罢，都不过虚名而已。”于是作《行香子》一阕：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苏轼也写相思。熙宁六年十月（时任杭州通判），他奉命去常、润赈济，次年七月方回杭州。离家日久，思念家人，遂托名“代人寄远”，作《少年游》：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元丰元年春天，徐州久晴不雨，麦苗受旱。知州苏轼应百姓之请去石潭求雨，数日后，果然天降甘霖，便遵当地风俗，去石潭谢雨。归来就途中所见，作《浣溪沙》五首，描写久旱逢雨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借此抒发人生感慨，寄托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归田的心愿。其中一首是：

软草平沙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原是此中人。

徐州有燕子楼，在唐故相张建封旧宅中。世传建封家有歌伎名关盼盼，风雅多姿，尤善歌舞。建封亡故后，盼盼念旧情不肯再嫁，居燕子楼十余年，直至去世。徐州人传为佳话。一夜，苏轼读乐天诗，梦登燕子楼。第二天便去寻找，果然楼房尚在，只是已十分破旧。于是命人雇工匠重新修葺，竣工后，苏轼邀友好登楼饮酒，一高兴喝得大醉，夜宿楼中，竟然梦中见了关盼盼。醒来时，明月如霜，好风如水。起身伫立窗前，见月下小园，景色清幽：楼前

池水，波光粼粼，池上荷莲，已闭合入睡，只有荷叶上的露珠闪着银光……氤氲夜色的小园里，寂静无声，一片树叶落地，也铿然作响。苏轼从楼上下来，走遍小园，小园里阒无人影。他想，这燕子楼也曾灯红酒绿，盛极一时，可而今……只留下梦一般的故事。世人营营终日，啥子富贵荣华、虚名实利，旧怨新欢，都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回到楼上，不到半个时辰，一阕《永遇乐·夜宿燕子楼》便呈现纸上：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宋神宗元丰二年，因“作诗讥讽新政”罪名被贬黄州，寄居定惠院。一夕，午夜梦回，他起身出门小解。见朦胧的上弦月斜挂在叶儿尽落的梧桐树梢头。四下里寂静无声。他正想回屋，忽听头顶上“嘎”的一声，吓了一跳，只见一只孤雁，不知从何处飞来，盘旋一匝后，又影子般向别处飞去。他猛然觉得自己就是那雁儿，在寻找栖身之处……心中一动，回到房中，点燃蜡烛，作《卜算子》一阕，借孤鸿以寄托失意情怀。

缺月挂疏桐，漏院人初静。唯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也是在黄州，他收到好友章惇寄来一阕《水龙吟》求和，苏轼和词借杨花飘坠刻画一个女子的伤感和幽怨；咏物寄情，巧妙结合。其词曰：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晚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也写离情别绪。元丰二年（1079）他被贬黄州，与诸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五年后奉命改迁汝州。临别时，作《满庭芳》。娓娓倾诉至诚至厚的依依惜别之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感人肺腑。

（下转第26页）

试论苏词中的神话意象

田慧玲

内容提要：神话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300多首苏词中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意象，可概括分为神女意象、神物意象、神境意象三大类。这些神话意象的大量运用丰富了苏词的色彩，增添了苏词的神韵，使苏词充满浪漫之气。

关键词：苏词 神话意象 神女意象 神物意象 神境意象

神话是华夏民族文化中最瑰丽最宏伟的篇章，绵延数千年的神话传说满载多姿多彩的神人、神物、神兽、神境……先民们对自然、对世界最初的瑰伟神异的想象给后人创造提供了无尽的幻想空间与创作动力。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对巫山神女美丽形象的着力塑造，到曹植《洛神赋》对洛水女神动人风姿的精细描摹，从李白的“瑶姬天帝女，精彩化朝云”到李商隐“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众多的诗词歌赋对神话意象的运用使文学充满了浪漫之色、奇幻之美和飘逸之气。天性放旷多情的一代巨匠苏轼，创作了众多或豪放或婉约的美词，其间许多词对神话意象的运用圆融适意，别具一格，值得我们加以关注。苏词共有 350 首，其间使用了神话意象的词有 30 多首，概论之，可分为神女意象、神物意象、神境意象三大类。

一、神女意象

神女是苏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类神话意象。在苏词中或显或隐出现的神女意象有巫山神女、湘水女神、姑射仙人、缙山仙子。

苏词共有 9 首借用了神女意象，而以巫山神女最具代表性。巫山神女，传说为天帝之女，一说为炎帝（赤帝）之女，本名瑶姬（也写作姚姬），

未嫁而死，葬于巫山之阳，因而为神。宋玉《高唐赋》叙述楚怀王游高唐，昼寝，梦与神女相遇，其自称“巫山之女”。巫山神女皎若明月的美貌固然是诗词使用其意象的重点，神女与楚王缠绵悱恻的人神恋情更为人称道。苏词中的巫山神女意象别具特色，大都以苏轼的爱妾王朝云为比喻对象。苏轼与王朝云的爱情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朝云原是苏轼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她爱苏轼、懂苏轼、理解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因而苏轼给她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巧的是，“朝云”正是神话中巫山神女的名字，这样的暗合让人抚掌，也为苏词运用巫山神女意象构造虚实相济的情境埋下伏笔。

有词借神女意象状写王朝云的美丽风姿，如《南歌子》（云鬓裁新绿）：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

这首词，是苏轼因秦观的《南歌子》（以襄王与巫山神女之事喻苏轼与王朝云之情）而作，词中先写王朝云的外貌，云鬓乌黑，舞衣晓红，并用“新绿”、“晓红”、“翠筵”、“彩云”一系列美丽的色彩涂写朝云，塑造出一位绝代佳人形象，继而说王朝云来自巫山十二峰，却原来是神女下凡，王朝云的形象顿时与巫山神女重叠。那么下阕写朝云的舞姿，美丽如鸾凤飞镜，轻盈如春燕舞空，这样的飘逸灵动自然非神女不能为之了。结尾戏谑诙谐，既是对秦观词的回应调侃，也体现了苏轼对爱妾朝云娇娆美态的自豪，钟爱之情溢于言

表。

有词借缠绵的人神恋情叙述苏王的深情爱恋，如《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

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眉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

此词中的神女意象未曾直露，暗含在“梦”、“高唐”词语中，借用宋玉《高唐赋》中“人神遇合”的典故，含蓄地道出男子对昔日美好时光的怀念与思恋，那曾经的情景历历在目，爱恋的人顾盼巧笑仿佛就在身边，柔情似水。

有词借人神恋情的有始无终感伤阴阳两隔的孤独苦痛，①如《雨中花慢》（嫩脸羞蛾因甚）：

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

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长记当初，乍谐云雨，便学鸾凰。又岂料，正好三春桃李，一夜风霜。丹青口画，无言无笑，看了漫结愁肠。襟袖上犹存残黛，渐减余香。一自醉中忘了，奈何酒后思量。应算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

这首词是苏轼于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在惠州悼念王朝云所作。②“行云”取巫山神女“旦为行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赋》）之意，是朝云之名，也是神女之名，然而传说中的神女与襄王相恋的结局终是分离，朝云仙逝，又化作彩云回到巫山之阳，只剩下苏轼形单影只，与“寒灯孤枕，皓月空床”为伴，唯有通过朝云的画像来睹物思人。见到朝云遗物上的“残黛”、“余香”，犹忆爱妾生前之深情，殷殷难以忘怀。

此外，苏词《浣溪沙》（傅粉郎君又粉奴）、《满庭芳·佳人》亦运用了巫山神女之典，均为宴聚为歌姬作，借神女暗喻歌姬美貌，但意象并不突出，一笔带过。与之相似的还有《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的“缙山仙子”，《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中的“许飞琼”（传说中的仙女名，西王母的侍女）。以上诸词均远不如苏轼为王朝云所作的词情真意切，蕴藉深远。倒是《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用湘水女神意象，别有风味，其词云：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

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湘灵，古代传说中的湘水之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张华《博物志》中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③据苏轼词中意，此处湘灵当是指湘水女神，借以喻弹筝的女子。此时苏轼与业已致仕的张先一同游幸于西湖之上，忽闻湖上舟中有女子弹筝，其手法高妙绝伦，情辞哀婉动听，仿佛是湘水女神在轻声弹奏。此处运用湘水女神意象既表现了琴音空灵不似人间声乐，使人如处仙境，更与女子一曲未终，悄然而逝不见踪迹的神秘气息暗合，余味隽永。

二、神物意象

神物，神灵、怪异之物。《易·系辞上》：“探賈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苏词中的神物意象主要是神兽和神药。

（一）神兽意象

苏词中出现的神兽意象有：鸾、凰、鹏。鸾、凰意象在苏词中出现的频率最高。鸾鸟和凤凰，都是传说中的神兽，《山海经·西山经》中有：“女床之山，有鸟名曰鸾鸟。”《淮南子·地形训》上写道：“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广雅》：“鸾鸟，凤凰属也。”因而后世常鸾凤不分，往往并称。苏词中的鸾凤意象含义丰富，以下依次述之：

1. 借鸾凤意象喻恋情，表现男女两情缱绻和谐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鸾凤和鸣”这个成语早已成为我国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福。苏轼便在《雨中花慢》（嫩脸羞蛾因甚）一词中写到“长记当初，乍谐云雨，便学鸾凰。”这是对与王朝云曾经两情相悦，夫妻和谐的幸福生活的美好回忆。又有《殢人娇·戏邦直》：

别驾来时，灯火荧煌无数。向青琐、陈中偷觑，元来便是，共彩鸾仙侣。方见了，管须低声说与。百子流苏，千枝宝炬，人间有洞房烟雾。春来何事，故抛人别处。坐望断、楼中远山归路。

该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春（1076），乃苏轼借“彩

鸾仙侣”典故戏贺李邦直新婚。傅（傅干）注引《传奇集》：“大和末，有书生文箫游钟陵，因中秋许仙君上升日，吴蜀楚越仕女骈集，生亦往焉。忽遇一姝，风韵出尘，吟诗曰：‘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彩鸾。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生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俦侣也。’……”④

2. 借鸾凤飞舞的情境喻歌舞，表现舞姿的灵动飘逸

如“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南歌子·云鬓裁新绿》），以鸾鸟飞动时轻灵优美喻王朝云的轻盈舞姿。又有“因念浮丘旧侣，惯瑶池、羽觞沈醉。青鸾歌舞，铢衣摇曳，壶中天地。”（《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该词是苏轼回忆与友人宴聚的情景，词中的青鸾当指善歌舞的歌姬舞女，美酒令人沉醉，而歌姬舞女声音清亮、衣裙随风摇曳，似鸾鸟歌舞，令人如处神境。

3. 借骖鸾意象喻友人离别，表达对友人前途的祝愿

此类代表作为《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

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风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这首词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与王益柔游金陵赏心亭所作，傅注：“乘云，游雾，驾鹤，骖鸾，皆神仙之事。”案，此喻王将离金陵他去。⑤鸾鸟本是传说中的祥瑞神兽，《山海经·海内经》云：“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词中喻友人骖鸾离去，寓有对友人前程的美好祝愿。

4. 借乘鸾意象喻自己，通过塑造自己飘然欲仙的形象，表达超迈放旷的情怀

如《念奴娇》（凭高眺远）：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这是一首中秋词，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1082）作于黄州，此时苏轼仍在被贬中。与作于熙宁九

年（1076年）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相比，“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似已脱去了对“又恐琼楼玉宇，高出不胜寒”的惶恐，这是一种自我的宽慰，也说明面对坎坷的人生道路，苏轼的心境已历练得更为豁达。此外，下阕还提到了鹏鸟意象，《庄子·逍遥游》有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意象在苏词中仅出现此一处：“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以对神话传说中大鸟的推拒反衬苏轼内心的洒脱，诗人只要凭虚御风便可潇洒归去，又何须借助传说中的神鸟呢？比之上阕的乘鸾来去又提升了一个境界，此间放旷超然的真意，也只有苏轼才能到达了吧。

（二）神药意象

苏词中出现的“蟠桃”、“千岁药”、“金鼎药”均不是凡俗之物，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事物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典籍、诗词中，至今仍使人津津乐道，当源自于它们显著的功能性——使人长生不死。而这几种长生神物在苏词中的定位和作用却又各有不同，使苏词各具韵味。

1. 借用神药喻现实事物，侧重神药的功能性，强调现实中事物的养生作用

如《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玉粉，指碾成粉状的上品茶，“傅注：《广志》曰：‘千岁老松子，色黄白，味似栗，可食，久服轻身。’此句谓品茶、饮酒、服食松子，是养生轻身之千岁良药。”⑥

2. 借用神物漫长的时间特性，反衬时光短暂

如《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

九十日春都过了，贪忙何处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荚阵，风转柳花球。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厌求。东皇不拘束，肯为使君留。

蟠桃，神话中的仙桃，傅注：“《汉武帝故事》：西王母尝以桃五枚啖帝，帝食之，留核着前，母曰：‘用之何为？’上曰：‘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着子，非下土所种。’”⑦词中说“蟠桃动是千秋”，侧重蟠桃意象所代表的时

间概念，此词是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四月在密州与友人赏藏春馆残花所作，虽然上阕中“雨翻榆莢阵，风转柳花球”的春光美好可爱，下阕却以仙果的诞生时间之长反衬出人间春光易逝，不免带上愁怨之意，词末却又笔锋一转，另辟天地，写到“东皇不拘束，肯为使君留。”司春之神不受拘束限制，使春色常驻人间，为使君而留，则今日游园有花可赏矣。苏轼与友人交游的欢愉调笑之景跃然眼前，哀怨之意一扫而空，其对情景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

3.侧重神药的神话传说性质，亦即故事性，运用于词中，起塑造、烘托环境的作用

如《戚氏·玉龟山》中写到：“稚颜皓齿，绿发方瞳，圆极恬淡高妍。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缥缈飞琼妙舞，命双成、奏曲醉留连。”金鼎药，仙人用丹炉炼取的长生药物，“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仙人之间殷勤欢聚，赏“缥缈飞琼妙舞”，绘制出一幅仙气飞动的神人神境图。

三、神境意象

神境，指传说中神人居住之地。苏词中出现的神境意象颇为丰富，既有神山海岛等自然生成的神境意象，又有“瑶台阆苑”、“玉堂金阙”等具有人文色彩的神仙居住之所。神境不似凡间，神宫仙阙，灵气缥缈，瑞兽歌舞，神人来去，踪迹杳然。丰富多彩的神境意象使苏词色彩斑斓，充满浪漫之味。苏轼对神境意象的运用主要可分为三类：

(一)以神境意象喻梦，表现美梦难舍

如《桃源忆故人·暮春》：

华胥梦断人何处，听得莺啼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寂寞闲庭户。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著人无数。楼上望春归去，芳草迷归路。华胥，传说中的理想国度。《列子》卷上《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⑧该词以传说中的理想国度“华胥”喻指美妙的梦境。“华胥梦断人何处”，从美妙的梦中醒来，故人不知何处，惟留人独自寂寞。

(二)以神境意象虚写欢聚场所，塑造热烈

气氛

杜甫有诗云：“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丘。”(《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瑶池”是传说中西王母居所，位于昆仑山上，《列子》卷上《周穆王》：“(穆王)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⑨苏词描绘与友人的欢宴多用此意象。如“因念浮丘旧侣，惯瑶池、羽觞沈醉。”(《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追忆与友人宴聚的美好时光。瑶池在词中成为宴聚欢会盛况的代名词。“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曾到昆仑。乞得山头玉女盆。”(《减字木兰花·海南奇宝》)此“昆仑”亦与前词“瑶池”同。另外，“万家游赏上春台，十里神仙迷海岛。”(《木兰花令·元宵似是欢游好》)更是借神境意象的描绘勾勒出元宵游会的盛况。

(三)以神境意象写人，增添仙灵逸气

有的词缅怀友人，“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傅注：“瑶台、阆苑皆昆仑之别名。”此谓徐君猷已仙逝，升入瑶台仙境矣。⑩有的词写自己，“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仙境任“我”遨游，超迈放旷的情怀油然而生。

而提到神境，就不得不细说《戚氏》(玉龟山)：

玉龟山，东皇灵姥统群仙。绛阙岩峩，翠房深回，倚霏烟。幽闲，志萧然，金城千里锁婵娟。当时穆满巡狩，翠华曾到海西边。风露明霁，鲸波极目，势浮舆盖方圆。正迢迢丽日，玄圃清寂，琼草芊绵。争解绣勒香鞵。鸾辂驻蹕，八马戏芝田。瑶池近、画楼隐隐，翠鸟翩翩。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稚颜皓齿，绿发方瞳圆极，恬淡高妍。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缥缈飞琼妙舞，命双成奏曲醉留连。云璈韵响泻寒泉。浩歌畅饮，斜月低河汉。渐绮霞，天际红深浅。动归思、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杏花风数里响鸣鞭。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春妍。

因为这是苏轼运用神境意象最为丰富、神人神物并聚、风姿独具的一首词，所以本文特单独列出着重分析。此词做宋哲宗绍圣元年甲戌(1094)正月，定州。借咏周穆天子遇西王母事，对原本简单的远古神话传说加以想象虚构，改编成为离奇曲折的故事，从而营造出一种缥缈的仙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东坡戚氏词》：“东坡

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为《戚氏》词。公方与坐客论穆天子事，颇逐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他词，亦未容别进一语，且曰足为中山一时盛世耳。”^⑩由于是咏神仙之事，所以在这首词中苏轼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典故，并以铺排的手法层层展开，使这首词独具神韵，读起来有种仙气萦绕之感。词中神话意象极为丰富，既有传说中的神境“玉龟山”、“瑶池”，又有神人“东皇”率领群仙，舞姿缥缈的“飞琼”仙子，更有保长生的“琼壶酒”、“金鼎药”，神境里神兽云集“鸾辂驻跸，八马戏芝田”。多姿多彩的各类神话意象群聚一堂，配合浪漫的神话传说，塑造出一个雄奇漫怪却又灵气逼人的神话世界，一场神灵欢聚的盛宴。苏轼大才，众多神话意象在他圆融的运用组合下声色和谐，浑然一体。其对神境的大胆驰骋想象，构成一种奇谲的意象和虚幻的意境。此词作于宴饮上，以神之事烘托宴饮气氛，令人可以想见宴席中欢歌妙舞、觥筹交错的盛况，却又免于流俗，增添了一份雅意，充满了浪漫气息。

论文注释：

① 高培华《苏轼〈雨中花慢〉是悼念朝云》，《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②、④、⑤、⑥、⑦、⑩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83页、第163页、第517页、第749页、第173页、第514页。

③（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⑧、⑨ 转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77页、第424页。

⑪（宋）吴增《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0页。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篆刻：人生如梦）

（上接第21页）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老酒，相劝老东坡。云和？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苏轼有不少写女人的词。元祐五年，时任杭州知州，作《贺新郎》，以处境清幽而内心寂寞的美人之幽怨寄托怅惘情怀。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红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苏轼谪贬黄州时，好友王巩受其牵连也被贬岭南，他的侍妾柔奴相随不舍。六年后，二人皆回京。苏轼去看望老友。柔奴捧出用牛羊乳制作的点心，请客人品尝，并求词，苏轼作《定风波》相赠。不说她的花容月貌，婀娜多姿，而赞她：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这些，都是婉约风格又兼具豪放气概的杰作；真正可谓千姿百态，万种风情。

苏轼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人之一，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不仅是有名的词家，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画家、书法家，可称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苏轼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千年。他开创的豪放刚健的词风，影响了宋以后元明清诸代，并将对当代和今后的中国词坛继续发挥其典范的作用。

（湖南省衡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离休干部，作家、副编审）

苏轼的文学理念创新 与文化基因的生成机制（下）

杨胜宽

三、推陈出新机制

政治思想的“新”与“变” 苏轼是在被历史誉为“承平之世”的宋仁宗统治时代出生并成长的。对于史家侈谈的这个宋代难得的封建盛世，生当其中的苏轼却感受全然不同。他在早年所作《策论·策略一》中，对当时的局势有这样的基本判断“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⑬他认为国家处于这种情形，是最危险的。他用名医治病的道理来说明其危险性：“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卤莽因循苟且之所以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⑭或许此时的苏轼少年气盛，说话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轼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深刻而清醒的，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基于这样的分析和认识，苏轼相信，现存的三代以来遗文典籍和汉唐两朝的成败经验教训，不能为疗治仁宗统治后期社会的膏肓之疾提供有效药方；只是如庸医一般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够祛除这个时代的深不可测病因。所以，他在《策论》中强烈主张“涤荡振刷”“卓然有立”，要有除旧鼎新的勇气与决心，对吏治、外交、财税、军事等进行全面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路与举措。观其“夫当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论，以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之论，^⑮跟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激进思想与言论，简直别无二致！他以治

水为喻，阐述他的一整套治理天下的道理：

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冲溃决，腾涌漂荡而不可禁止也，虽欲尽人力之所至，以求杀其尺寸之势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馘馘乎若不足以终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虽杀之忧，而又有易衰之患，导之有方，决之有渐，疏其故而纳其新，使不至于壅阏腐败而无用。^⑯

跟治水需要疏其壅塞、去其陈腐一样，治理国家如果不能“疏其故而纳其新”，时弊就会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最终无法救治。苏轼这时强调的“疏故纳新”，重点在于革除一切腐朽无用的陈规旧习，创设新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使国家重新具有生机与活力。之所以他要激进地主张“涤荡振刷”“卓然有立”，是因为不如此，不能改变仁宗时期因循守旧、苟且度日的朝野痼疾。

至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激进式“熙宁变法”时，苏轼却很快站到了反对者的行列，强烈批评王安石的做法“操之过急”，转向了主张“渐变”的政治立场，表现出跟此前思想的巨大反差。如果分析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十分复杂的，既有苏轼主观方面的，也有时局与政治斗争等客观方面的。其实，“熙宁变法”的“骤变”与“渐变”的分别，只是后世区别当时士大夫对于这次自上而下变法活动的不同态度相比较而言的，其间只有相对和便于言说的意义，根本不能成为据此判断其孰是孰非或进步性与否的理由。事实上，对于王安石的操之过急变法举措，苏轼所反对的根本理由，不在于变法推进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不是充分兼顾富国强兵与富民安民的关系；如果富国强兵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这样的改革得不到人

心的支持，终究必然失败。苏轼在批评王安石变法主张的代表性奏章《上皇帝书》中，把“结人心”作为申张自己改革思想的首要观点，认为“熙宁变法”的那些改革举措，大多会导致丢失民心的可怕后果，这是他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思想，在他早年的《策论·策略五》中，已经有了透彻的阐述。比较两篇文章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从形式上看，苏轼在“熙宁变法”时的立场似乎变了，而实质上，他的根本主张是前后一致的，那就是把人心向背作为改革的根本取向，变化之中有不变者在焉。苏轼这位新法反对派的代言人，因此受到李定、舒亶等台谏官员的文字狱陷害，在遭受百日牢狱之灾后，被贬黄州四年多，仕途和人生命运遭遇重大挫折，身心受到巨大考验。

及至元祐初政治风向转到“熙宁变法”反对者一边时，苏轼又因为反对废除“免役法”而与司马光及其追随者发生尖锐矛盾，不仅元祐时期不断受到“洛党”群小的困扰和攻讦，而且在宋哲宗亲政伊始就受到接踵而至的一连串贬谪，不仅以老迈之年被贬瘴疠之地惠州，而且最后到了人迹罕至的海外孤岛之地儋州。他反对废除“免役法”的主张也很明确，“免役法”执行了十多年，民众已经接受了习惯了它，国家没有必要频繁变更法度，困扰百姓；他更不赞成司马光意气用事、因人废法的政治态度，因为政治家们意气相争的结果，遭殃的只能是广大百姓。

苏轼一生，经历了仁宗、神宗、哲宗几朝的重大政治事件，他的思想始终是随着时局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无论在仁宗朝的激进改革主张，还是神宗朝的“渐变”政治立场，不管是熙宁时期的反对新法，还是元祐初期的维护新法，都不难看出中间的变化是实际存在的，无怪乎像朱熹这样的批评苏轼者，要发出如此嘲弄般的议论：“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⑤事实当然不是朱熹所认为的那样，苏轼的政治思想和改革主张，确实在不断的更新变化，但他所坚持的改革目的和价值原则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观

念，用今天的眼光看作为封建时期士大夫一员的苏轼，这不仅不是他的缺点和局限，反而是他的进步和难能可贵之处。

文学艺术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⑥“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虽然是针对柳宗元的诗歌风格和诗歌创作“用事”要求来说的，但一般研究者都认为，这八个字体现了苏轼的重要文艺创作思想。钱锺书通过对这一诗歌创作观念出处和演变过程的考察，并且联系西方文论中的类似观念进行比较分析以后，认为宋代诗人所倡导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不独修辞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又说“此谛非徒为练字属词设耳”。^⑦表明这一观念，是宋人普遍认同的重要文学艺术创作原则。^⑧

仔细分析苏轼上述题跋，主要表达了两层重要意思，一是诗歌“有为而作”的观念，这是苏轼一生都坚守不渝的基本创作原则，人所共知，毋庸赘述。二是“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苏轼这里侧重强调的是注意防止“好奇务新”的创作倾向，为奇而奇，为新而新，显然已经背离了“有为而作”的根本要求，所以是他所反对的；另一方面，“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是实现文学艺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种创新理念所包括的内涵，具有宋代文艺思潮的鲜明时代特征，需要作些深入分析。

宋代的许多文学思想，大都是承继中唐韩愈而来的。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自言创作经历云：“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⑨他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进学解》等文章中，对自古以来的“剽贼”、“盗窃”行为也进行了尖锐抨击。表明在韩愈时代，为了提倡创新精神，是不惜抛弃陈言，鼓励戛戛独造的。而到了北宋时代，合理继承优秀文化遗产，适当运用故实俗语，成为创作界的普遍共识。周裕锴认为，“语言上‘以故为新’的观点在北宋中叶后才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⑩周先生所说的“以故为新”，近似于钱锺书所诠释的语意：“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⑪由此看出，北宋中叶以来的创作观念，比之韩愈时代已经有了重要转变，宋代作家们不再简单地拒绝包括陈言俗语故实在内的传统遗产，而是回到书斋，努力攫取古代典

籍中一切于自己创作有用的东西，兼收蓄之，点化用之，把这作为突破唐人创作规范，创立时代风格特色的一大法门，甘之如饴，乐此不疲。

苏轼把“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与“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并列在一起，显然是为了强调创作时必须把握好“故”与“新”、“俗”与“雅”二者关系的度，超过合理的度，就滑向了为奇而奇、为新而新的迷途，容易出现偏离创作宗旨的各种弊端。怎样处理好“故”与“新”、“俗”与“雅”的关系，让“故”“俗”为“新”“雅”服务，吸收、消化这个“化”的过程非常重要。处理得好，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使陈言俗语具有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它们此时已经完全成为作家创作立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新”，所以“雅”；处理不好，效果就截然相反。宋代江西诗派的末流，资书以为诗，生吞活剥，竞奇务巧，其陈言俗语就毫无生命力、表现力可言。

苏轼身处唐宋文学的历史转折演变浪潮中，他一方面发扬韩愈所倡导的文学创作师古人之意而不师其辞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结合时代创作要求，合理扬弃韩愈的儒家道统观念和对陈言俗语的偏见，积极探索兼收并蓄、综合熔铸古代遗产，建立有别于唐代文学艺术风格时代特征的创作道路，并在这一探索努力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清人叶燮对此有一段见解深刻的评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苏轼的成就及其在唐宋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

（韩）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忍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之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俗儒即以此为晚唐诟厉，亦可谓愚矣。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实有得也？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⑭

看来，韩愈提倡“务去陈言”是对当时陈言泛滥的改变，而苏轼等宋代作家“以故为新，以俗为

雅”，又是对韩愈“务去陈言”的合理扬弃与矫正，带来文学创作的新变与繁荣。

如果说苏轼政治思想上的推陈出新，是以革除积习陈规为特征，那么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推陈出新，就更多体现了对传统遗产的继承兼容，合理吸纳，对陈言俗语的点化活用，赋予新意。由于他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坚持“有为而作”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故”与“新”、“俗”与“雅”的关系，不仅在广泛的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时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而且在创立宋代文艺的时代风格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融通转换机制

打通文学艺术间的“墙壁” 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有言：“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权者异矣。”^⑮揣摩上下文意，刘氏对苏轼文章“打通墙壁”的做法似颇有保留，在有保留的前提下加以肯定。那么，这里所说的“打通墙壁”指的什么？《艺概·诗概》亦云：“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致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⑯综观两处所言，刘氏认为苏轼诗文的特点是“打通墙壁”，其结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作家进入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阈，创作时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左右驰骋，有如“舟行大海之中”；二是能够开拓心胸，超越别人，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这两方面都是苏轼打通各种艺术创作界线，综合运用不同艺术形式和表达方法，进而取得广泛艺术成就，达到超常艺术水平与效果的结果诀窍。

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⑰徐中玉认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指一切艺术都应该有所创新”，^⑱所有的艺术都应该追求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这自然是没错的。但我们想着重指出的，是苏轼对不同文学艺术体裁具有相通创作原理的规律性的深刻认识，这不仅是苏轼在文学观念上的一大进步，而且对宋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和显著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随着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自觉，文体划分日益细密，文体界线被提升到保持各

种文体独立特征的高度,不断得到强调。唐人专精者居多,而兼擅者并不很特出,才高如李、杜,专精于诗之外,文章方面着实用力不多,成就亦有限;韩愈虽然诗文兼擅,但对当时新兴的词,并未染指。这种情形,并非作家才力不能兼擅,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到北宋中期,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文坛重要人物,都提倡兼擅众能,打通各种艺术形式的体裁壁垒,从共同规律中借鉴其它艺术手法,丰富表现方法,增强表达效果,并且在创作中身体力行,其中苏轼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好的。比如《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虽然是论画,实际上也是在揭示如何认识和把握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评价一幅画,只注重形状像不像,显然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只就诗说诗,并不是真正懂得诗歌的人。苏轼所强调的是,要跳出诗与画的形迹要求之外,去看彼此相通的深层次的基本规律;如果诗与画的体裁本身已经难以突破和创新的话,那就应该在彼此融通和互相借鉴方面去尝试和探索。事实上,苏轼将不同艺术体裁“打通”进行审视评价的,不乏例证,如人所共知的对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价,又如《韩干马》:“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④不仅诗画如此,文学艺术的其它形式亦然。

苏轼不仅努力打通文学体裁之间、艺术形式之间、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固有壁垒,而且要打通作家与表现形式之间、作品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壁垒,不断寻求创新的途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⑤这首诗一般认为是苏轼称赞文同作画时的一种投入状态:画竹时不仅不见人,甚至嗒然忘记了自己身体的存在;“其身与竹化”,是怎样一种境界呢?徐中玉认为指的是“画家物我两忘,与竹融为一体”,^⑥从诗取意于《庄子·齐物论》看,苏轼描述的是文同进入画竹的凝神壹志的境界,当此之时,画家完全泯灭了物我之间的差别,而达到一种忘记物象、忘记技巧的自由表达,画家与竹、图画的点线色泽与竹的表象之间,已经浑然一体,没有了主客、物我、表现与被表现的差别;表现对象不再是静止的、固态的被描摹者,而成为画家心目中鲜活的、灵动的、有生命活力的事物,这样画出的竹子,就是完整而有生机的。《文

与可筧簞谷偃竹记》叙述文同的画竹经验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⑦文章着重强调的对所画对象的熟悉与整体把握,要体现其生命与精神,如果一笔画节,一笔画叶,也许形状更像竹子,但是可能忽略了表现其内在生命和品格精神。达到了这样的绘画境界,就能够“无穷出清新”,不仅可以创新,因为它是最个性化和最不可复制的,而且可以达到创新的无穷程度,因为表现对象是千差万别的,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就是独一无二的创新产品。

打通文学体裁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壁垒界线,是为了更好地互相借鉴,丰富表现方法,提高表达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作家具备多样的艺术才能,融会贯通,才能左右逢源。打通创作中的物我、主客分别,是为了进入艺术的自由境界,充分感受表现对象的生机活力与独特品格,放下对形似、工拙、好坏的计较,而全身心地与表现对象化而为一,去感受其内在的生命实质。如果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不用说,创作出来的作品是最具独创性和不朽艺术价值的。

“反常”与“合道” 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⑧学者冷成金在其所著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一书中,把追求反常合道而获得的“奇趣”,作为苏轼的艺术精神,进行了专节分析,但是论述的重点,完全在于与“趣”相关的问题上。^⑨本文对冷著已经阐述的苏轼重“趣”问题,不再辞费,而把观照的重点,放在“反常合道”作为苏轼所概括的一种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模式的分析上,探讨其作为一种融通转换机制,在文学创新观念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在艺术创作上的反常与合道的思维,比较典型地反映在古代绘画中,最著名的例子要算唐代文人画的创始人王维所作的《袁安卧雪图》“雪里芭蕉”图景。从宋代开始,围绕这幅画是否违背自然常理发生了许多争论,赞扬的、批评的各有理由。赞扬的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云:“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信成,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批评者又指责画家不懂自然常识。姑且抛开这些争论不谈,我们

所注意的是“雪里芭蕉”的出现与文人画兴起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稍懂中国绘画史发展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画经历了从工笔画到写意画的发展演变,重大转折点就出现在王维创立文人画时期。顾名思义,写意画就是着重体现绘画者的思想意趣和主观感受,其它都需服从于画家意趣与感受需要的表达。明白这一点,王维画出“雪里芭蕉”,就不能简单从常识常理去解释和评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难以理解文人写意画对传统工笔画突破的事实与意义了。

当然,并不是文人写意画都是违反常识常理的。重要的是,“雪里芭蕉”写意思维方式的出现,它预示着文人画在重意的创作原则影响下,画家可以在观察事物的方式与角度,摄取表现对象的取舍与构造,图画意境的凸显与创新等方面,将会有不同于传统表现形式的许多方法与立意的拓展空间与创新形式。

苏轼作为宋代文人写意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用“反常合道”的文学艺术理念与实践,把宋代重意艺术推向了新的发展水平,并形成了宋代文学艺术的鲜明时代风格特征。在绘画艺术上,苏轼非常赞赏绘画立意新颖独特,而不拘泥于点画图迹的画工之似。《画水记》最清楚地显示了文人写意画由传统工笔画转变之后所追求的新的审美标准:

古人画水,多作平远细皴,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画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近岁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⑤

古人画水,追求的是穷物尽相,得其形似,乃是画工的技法;而文人画兴起以后,画家追求的是自出新意,画出水的变化姿态,是文人欣赏的活水的效果与意趣。《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云:“画以人物为神,花、竹、禽、鱼为妙,宫室、器用为巧,山水为胜,而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⑥显然,山水之胜,主要不在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模拟肖似,而在于能够表现出整幅图画的诗一般的意境和画家对所画山水的把握理解,达到“浑然天成,粲然日新”的艺术效

果。《书陈怀立传神》则反复强调绘画的根本要领和崇高境界,在于捕捉所画对象的“精神”,而后将画家所理解的“意思”成功表达出来:“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顾)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彩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而复生,此岂能举体皆是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谓顾、陆。”^⑦

可见,苏轼提倡的“反常合道”,注重的是突破传统常规对创作的束缚,努力超越形迹之似的工匠技法表现层次,把创作主体的思想情趣和审美品位融入艺术作品之中,使之更加接近于艺术表现的内在本质,“活水”论、“传神”论、“成竹”论,都体现了苏轼关于艺术创作“反常”与“合道”的辨证关系与深刻联系,揭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在实质,体现其努力超越传统、寻求创新的观念与追求。

“自是一家”的范式意义 “自是一家”是苏轼任职密州时对自己的词的评价,《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⑧词在北宋的发展,柳永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他在时人规摩五代以来小令词的风气下,开创具有世俗化特征的慢词写作,从词的体式、结构、句法、辞彩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造,使宋词走向能够为市井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创作方向,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人笔记中言,“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其盛况可以想见。苏轼在柳永之后,决心尝试不同于柳词风格的词风,按照他的审美要求对词进行革新。

书信所指小词,即苏轼熙宁八年(1075)知密州时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时年40岁。如果按照薛瑞生对苏词的编年,其词的创作始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⑨则苏轼从事词的创作已经十五六年,写词约有70多首。考察苏轼知密州之前的词作,大凡以酬赠别情占多数,且皆为小令;从知密州开始,苏轼的词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比如写现实生活题材(《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心志情怀(《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出现优秀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和幽默风趣的游戏词(《殢人娇·戏邦直》)等。从词的体式上看,之前基本上以字数不

多的小令为主，而此时已开始写作像《沁园春》这样的长调作品（101字）和《雨中花慢》、《水调歌头》等慢词。从词的质量看，之前基本没有产生流传广泛和重要影响的佳作，而此时的两首《江城子》、《沁园春》、《水调歌头·中秋》等，都称得上苏词的上乘之作，在后世具有广泛影响。

苏轼对《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矜赏，有基于自己这一时期找到了写词自别于柳永词风的创作路数并初步形成独立风格的欣喜之情存于其间，其实不单指此词而言。之所以苏轼有这样的喜悦和自负，是因为词作为一种文人染指的新兴文学形式，虽然始于中唐，但两百年间在词的体式和风格上，并没有太多的创获，基本没有摆脱“词为艳科”、侑酒佐欢的传统窠臼。柳永对词的改造引起了苏轼高度关注，所以他每每把柳词作为参照来评判时下的词坛和作家的水平。但是，柳词的世俗化创作道路又是苏轼不能完全接受的，因为其世俗化倾向的词作中，出现了不少庸俗，甚至淫秽的内容，其过于媚俗的词作指向导致作品的格调比较低下，因而受到士林的抵制与批评。苏轼有见于此，决心在词的改革上“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使词的内容更健康，格调转向高雅。南宋人胡寅认为，苏轼对柳词的革新作用在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酒边词》序），是很有见地的。

苏轼致力于词的雅化，主要方法就是陈师道所讲的“以诗为词”，即把诗歌的某些技法运用在词的写作中，抒写作者的性情志意和理想胸襟，创造出接近于诗歌意境和风格的新词风，后世研究者也把这称为词之“诗化”。苏轼对柳永词的低俗化倾向表示不满，但对部分格调高雅的作品仍然予以肯定，如对柳氏《八声甘州》中“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等句，就极力称赞其“不减唐人高处”。⑥这里的唐人，不是指唐代的词人，而是指唐代的诗人，认为柳永的词句，具有唐诗的高雅意境。对时人的词作，他也用诗歌的标准进行评价，如评价蔡景繁的新词，俨然“古人长短句诗”，得之惊喜；⑦评价陈慥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⑧用“诗人之雄，非小词”来称赞对方的词作，可以看出苏轼对诗词的褒贬态度。当然，这里显示的主要不是苏轼尊诗卑词的观念，而是反映了他主张用诗歌的手法和情调来改变过去婉约词的侧艳柔媚风格，使之具备诗歌的表现功能和高

雅情调。

在词学专家叶嘉莹看来，古代词发展到北宋中期，士大夫写词，往往在词里表现作者的学养与襟抱，词的境界由于作家这种主观情怀与学养成分的增加而得到提升，这是一个渐进的“诗化”的发展趋势与过程，“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并且认为，苏轼之前的作家，这种尝试基本是无意的，而只有苏轼是“带着一种有意的想要开拓创新的觉醒”。⑨苏轼有意识地通过寄予诗人情怀和运用诗歌表现手法对词风进行革新，最终实现了拓展词的表现领域，提高词的品格与地位，使宋词在此后具备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表现功能与作用，彻底改变了“诗庄词媚”的传统格局。

苏轼对宋词的革新，不仅改变了词的发展道路，丰富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表现内涵，同时也完成了苏词“自是一家”的风格创造，奠定了其在宋词发展史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其影响从苏门人士开始，经历南宋初的豪放词诸家，直至金、元、明、清各代，千余年间不绝如缕。其启示意义在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进步，根本在于勇于创新；只有具备先进的创新观念，才能创造独具个性和高水平的作品；文学艺术的质量取决于此，文学艺术的发展进步取决于此，作家的贡献、地位、影响也取决于此。

参考文献：

-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苏轼著《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页《策论·策略一》、第227页《策论·策略一》、第235页《策论·策略四》、第235页《策论·策略四》、第2109页卷六十七《题柳子厚诗二首》、第365页卷十一《文与可筼筻谷偃竹记》、第2552页卷五《书柳子厚渔翁诗》、第408~409页卷十二《画水记》、第2212页卷七十《跋蒲传正燕公山水》、第2215页卷七十《书陈怀立传神》、第1560页卷五十三《与鲜于子骏三首》、第1662页卷五十五《与蔡景繁十四首》其四、第1569页卷五十三《与陈季常十六首》其十三。

（下转第42页）

苏轼军事思想转变原因初探

唐 瑛

内容提要：和早年倡导积极备战，平素多训练兵士以待国之不测等军事思想相比，苏轼后期的军事思想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朝廷几次用兵结果狼狈的直接刺激，缘于他对战争破坏性和残酷性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历代治乱兴亡规律的总结等。

关键词：战争 军事 宋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作家诗人成林，但鲜有人能够与苏轼相比。他之没人能比，既体现在他为文的雄视百代、经历人生遭遇挫折后的坚强上，又体现在他治国方略的卓有成效上。仅其治国方略，就有多方面的内容值得研究，军事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下面，本文就苏轼人生前后军事思想变化的缘由，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自然，要探寻苏轼军事思想为何要发展变化，我们当然得首先谈及苏轼人生前后两个阶段究竟有怎样的军事思想。在苏轼前期，因为他自小树立了为国效力的伟大志向，所以无论在人生的信念上还是其他方面，他都以超凡卓著为人称誉。他那常为后人所引用的那句“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①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明证。与人生志向的超凡坚毅相伴随，则是他早年军事思想上的积极主动。如“自古创业者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②就是例证。而这番话，从字面上讲，是说军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撑，军队在国家日常生活里，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苏轼在给朝廷的各种奏议和上书中，很是主张朝廷的军队在敌我双方的战争中处于主动的防御地位。非常强调战争开始前，既要对敌方有充分的准备，也要求自己一方能有主动的防卫和全方位的训练。“昔者先王知兵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

不敢忘战”，③由于任何时候不敢忘战，所以他认为积极主动地对付战争就是理所当然。除了这一点，在应对策略上，苏轼也一改当时许多人的恐战、消极懈怠为积极谋划，力主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以求取得相应的胜利，所谓：“天下之患，非经营祸乱之足忧，而养安无事之可畏。”④带着上述积极备战的心态，所以他分析天下的形势时说：“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⑤面对战争不可避免的必然之势，苏轼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⑥

其言下之意，国家的各个阶层，都要用“尊武尚勇”的精神来熏陶他们，让他们懂得一些兵法战术。而对在官的庶人，则用军队的行阵之法交给他们；对从民间抽调起来缉捕盗贼的差役，则传授给他们射击和刺杀之术。尤其是应该仿效古代，定期集合官兵于都城，演习武事的做法。应该说，苏轼的这种将兵法战事积累于平时的做法，假如真正贯彻到了北宋军队演练的实际中，那朝廷的军队打起仗来绝对不是后文将要谈论到的那样不堪一击。但历史不能假设，所以尽管他有如此积极主动的战略思想，可一旦自己深入了解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朝廷官军在对辽、对西夏作战的实际表现以后，苏轼有关军队和战争的思想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苏舜钦是比苏轼略早三十年的蜀中同乡。对于这位以诗文著称的老乡兼前辈，苏轼不可能没有耳

闻。尤其对他很有名的那首描写北宋军队一次对西夏作战失败的《庆州败》，苏轼极有可能在中进士前都已经拜读过。诗歌长达十六句，是这样来描写景佑元年(1034)这次战争的实况：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
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
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
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
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
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
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
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嶮巇。
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
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
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
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
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
其余剺首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
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
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
地机不见欲饶胜，羞辱中国堪伤悲。⑦

这首《庆州败》，生动细致地给人们展示了承平日久的北宋军队，在与西夏交战中的狼狈和悲惨。由于长期缺乏训练，“马肥甲重”的北宋军队，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开自己的弓箭武器，就已经“连颠自欲堕深谷”，溃不成军了。“虏骑笑指声嘻嘻”，既写出了敌军将士的骄横，更显示出西夏敌军对北宋军队不堪一击的调笑和蔑视！而后文“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剺首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等诗句，更是极其形象地描绘出兵败被俘的北宋将士们，被俘虏后贪生怕死的丑态：或弃甲丢盔乞求免死，或毁坏己面哭泪连连，或争以“能歌能吹”的小技求得性命的苟延。除这些以外的降俘，或被剺鼻，或被割耳放走，都“矢液皆淋漓”，让人惨不忍视。“守将沮气陷者苦”的一语总括，无不给那些抱着“欲饶胜”的人们以当头棒喝。国家蒙羞，军队不堪一击，将士涂炭，《庆州败》给人们展示了北宋军队作战能力的实际状况！

除了《庆州败》的真实写照，苏舜钦与兄长苏舜元做的《瓦亭联句》，也对在战争中宋军的作战能力有清晰的反映：

（才翁）不知饵牵落槛穽，一挥发复如惊飙。
（子美）重围八面鸟难度，相顾无路惟青霄。
（才翁）地形窄束甲刺骨，眦裂不复能相磨。
（子美）弃兵袞袞今不杀，部曲易主无纤器。
（才翁）恸哭皇天未厌祸，空同无色劲气消。
（子美）狂童得志贱物命，陇上盘马为嬉遨。
（才翁）仓皇林间健儿妇，剪纸沥酒呼嗷嗷。
（子美）将军疾趋占葬地，年年载柩争咸嵎。
（才翁）朝廷不惜好官爵，绛密封印埋蓬蒿。
（子美）三公悲吟困数败，车上轻重如鸿毛。

⑧

脆弱、幼稚和容易上当受骗的宋王朝军队，在强大的西夏军面前，就像“饵牵”落于陷阱中，如待宰的羔羊，被敌军重重围住后，又如插翅难飞的鸟儿。战场上到处连绵不断的弃兵，其发出震动上天的“恸哭”之声，更是惨不忍闻！无能的朝廷，则不惜用蜡印封的官爵刻印，一再用这些追封来缅怀阵亡的将士，并把它们与将士们的遗体一起，埋葬在乱草丛中。平素煊赫高贵的朝中三公九卿们，在战车上亦如鸿毛一样轻贱，不堪一击！《瓦亭联句》描写的情况，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苏轼加以了自己的印证。如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里，他这样来说北宋朝廷禁兵的疲弱：“焦情既九，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⑨更何况，苏轼的第一次做官，就是在战争硝烟未尽的陕西凤翔开始的。战争破坏造成的惨状，未必不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争战后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残卒随处可见等情形，无一不慢慢地修正着苏轼曾经那视战争为轻而易举，胜利不费多大力气就可获得的看法。

除了上面已经列举的可能已经听闻到的朝廷兵败的惨状，还有元丰期间和熙宁时期，北宋朝廷的几次轻率用兵，几至全军覆没对苏轼所带来的直接刺激。

第一次熙宁五年的那场战役。关于这次战役，《宋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帝志复河、陇，筑古渭为通远军，以韶知

军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险，诸将谋置阵平地，韶曰：“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徒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乃径趣抹邦山，压敌军而阵，令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斗，师小却。……初，思立之覆师也，羌势复炽，朝廷议弃熙河，帝为之吁食，数下诏戒韶持重勿出。^⑩

本来，朝廷发动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想收复河、陇之地。而负责此次军事的首领是秦凤经略王韶。在对西夏用兵之前，王韶率领的宋军曾攻打西夏西北的吐蕃。与吐蕃交锋的大获全胜，冲昏了宋军将士的头脑。他们满以为对西夏打仗会与吐蕃一样。本想一口气吞掉河州、洮州、岷州的宋军，孰料每一次与西夏的交战都难以获胜。尤其是西夏军经过两次小的溃退以后，其来势更猛，即上面引文所说的“羌势复炽”。在此举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朝廷只好数次下诏王韶的军队“持重勿出”！神宗本希望通过这次战争能夺回丢失的一些地盘，不想战争下来宋军几乎得不偿失，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次是元丰四年的灵州之战。宋神宗轻信李宪的建议，派重兵驻扎在约距灵州百余里的地方，想趁西夏的内乱大举进攻。不料宋朝军队与勇猛的西夏骑兵一交锋，就乱成一团。幸好被前来接应的另一支大军赶上，两支军队一起，才稳住阵脚，合并包围了灵州城。但灵州城的坚固难攻，宋军无可奈何，只得驻在灵州城外。紧接这次溃败的，是更惨重的一次用兵，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乙未，诏李宪、张世矩将兵救永乐，又令沈括遣人与夏约，退军，当还永乐地。夏人围永乐城，厚数里，游骑掠米脂，且据其水砦。将士昼夜血战，城中乏水已数日，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至绞马粪汁饮之；夏人蚁附登城，尚扶创格斗。沈括、李宪援兵及馈饷，皆为游骑所隔。种谔怨徐禧，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请禧乘兵气未竭，溃围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摇矣。”珍曰：“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屋国耳。”高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夏人呼珍来讲和，吕整、景思义相继而行。夏人髡思义，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环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孙昌裔

劝永能从间道出，永能叹曰：“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所也！”顾易一卒蔽衣，战而死。徐禧、李舜举、李稷，皆为乱兵所害；曲珍、王湛、李浦、吕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挥马贵，独持刀杀数十人而死。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乃还。禧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耳！”中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灵州之败，秦、晋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谔陈进取之策，禧更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至于覆没。舜举资性安重，与人言，未尝及官省事，至是被围急，断衣襟作奏曰：“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冬，十月，戊申朔，沈括、种谔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帝涕泣悲愤，为之不食。^⑪

永乐城被围，北宋朝廷派李宪、张世矩前往营救，并命令沈括派人与西夏谈判，希望西夏退军，归还永乐，但西夏人不肯。宋军被西夏军重重围困。久受围困的北宋军队，终于在这年九月的一天，被西夏兵攻破城墙，缺乏作战能力的宋军遭到西夏军队毁灭性打击，损失极其惨重。不但将士一万二千人全军覆没，而且钱粮之丧更不可计数，消息传来，神宗当庭痛哭。此事以后，在北宋的朝堂上，再罕见言兵事者。怎样力保现状，追求平安，成了北宋朝廷很长时间里的救命法宝。

事实上，当我们进一步去追溯北宋的上述战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除却准备的仓促以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从太祖以来，一直推崇右文政策所留下的阴影。整个军营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军事训练的严格性都不能彻底地进行，造成整个朝廷的军队战斗力很弱。从文人到武将，普遍对战争感到恐怖。不但像富弼那样的老臣，以“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⑫等语，明白地告诉神宗自己对战争的坚决反对外，而且身系战役中的将官，一旦听到有关战事的消息后，也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下面一则材料的记载，有淋漓尽致地反映：

三月三月，丁亥，夏人陷抚宁诸城。初，种谔进筑永乐川、赏捕岭二砦，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

光岭、葭芦川四砦与河东路修筑，各相去四十余里。已而夏人来攻顺宁砦，遂围抚宁。折继昌、高永能等拥兵驻细浮图，去抚宁咫尺，啰兀兵势尚完。谕在绥德节制诸军，闻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书召燕达战，悸不能下笔，顾运判李南公，涕泗不已。^③

我们看，种鄂自己身为这次战争的统帅兼前线指挥，按理说应该有一切关于战事的心理准备。可你看他，一旦闻听到西夏人到了，就茫然不知所措了。情急之中想召唤别人参与作战，又惊恐得不敢下笔。再回头看着运判官李南公，眼泪鼻涕流个不停，哪里还有战争中镇定自若、骁勇善战的一点风采？

也许正是上述几次朝廷军队作战结果的狼狈，才使苏轼从根本上对有关国家军队的认识有了新的看法，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他早期的一些军事思想，很难再在他的言论中见到踪影。他早期的一些军事思想，如“夫当今之所宜先者，莫若破庸人之论，以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④“夫大国，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⑤等论断，不再见他在任何地方提及。

所以晚于苏轼的朱熹曾说：“东坡早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⑥朱熹的这番言论，也同样是寻找出了苏轼军事策略和主张何以变化的直接根据：即王安石用兵的狼狈。更何况当朝更多像苏舜钦那样的诗人其诗作对苏轼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得不使他重新思考自己原来的积极主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再加上官场的磨砺，曾经积极用世的苏轼更明白了历代兴亡治乱的教训，尤其是当时国家的现状，都改变着他的看法。也许正因为认识到当朝是“将帅疲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军事一兴，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不能自全”，故而他能有“好兵犹好色也，伤身之事非一，而好色者死；贱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⑦这样的认识。而此种思想的提出，则完全体现出苏轼后期

军事观的明显转变，也体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军队形势和百姓疾苦等问题思考的深刻和凝重。虽然在检阅军队，增修弓箭社、训练弓箭手，有效加强边境防备方面，苏轼并未加以改变。

论文注释：

①、② 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③、④、⑤、⑥、⑦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28 页《策略二》、第 228 页《策略二》、第 235 页《策略四》、第 280 页《策断一》，第 1048 页《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⑧、⑨、⑩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63 页《安万民五》。

⑪、⑫ 付平骧等《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 1990 年版，第 34 页、第 99 页。

⑬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卷三百二十八，列传八十七。

⑭、⑮、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卷七十七、卷六六、卷六八

⑰ 朱熹《御纂朱子全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第 1450 页卷五十九《诸子二》。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东坡赤壁文化丛书”简介

黄冈赤壁的历史源远流长，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赤壁“二赋一词”，使得原本就令人称奇的黄州声名鹊起。随着当今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有识者以为东坡赤壁不应忽略这一前景可观的人文旅游资源。有鉴于此，编纂此套丛书。

丛书主编黄冈市赤壁管理处主任张龙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 1 版。五册为：《苏东坡谪居黄州》（王琳祥著，定价 40 元）、《苏东坡黄州名篇赏析》（饶晓明、方星移、朱靖华、饶学刚著，定价 40 元）、《黄州赤壁集》（汪荣纂辑、王琳祥点校，定价 60 元）、《赤壁之战战地研究史》（王琳祥著，定价 40 元）、《黄州简史》（史智鹏、张龙飞著，定 56 元）。

联系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公园路 11 号赤壁管理处，邮政编码：438000，电话：0713-8366568

浩然之气

——试探苏轼、苏辙兄弟人格力量之精粹

陈慧君

内容提要：本文为了探究苏轼、苏辙兄弟人格力量的精粹，以他们大量的生平事迹为依据，诠释了他们兄弟俩卓尔不群的思想境界、刚直不阿的人格力量和始终如一的言谈行为。他们不仅传承了孟子提倡的道德规范“浩然之气”，而且突破了封建道德的规范，成为一种亘古常新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苏轼兄弟 人格力量 浩然之气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苏轼、苏辙兄弟俩一致推崇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而且身体力行，成为他们人格力量中的精粹。

“气”字最早在我国甲骨文中已出现，其本义是指云气。“气，云气也，象形。”（《说文》）后人引申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宇宙生命。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气”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美学概念，还是一个道德概念，甚至是一个生命概念。总而言之，“气”的内涵包容非常丰富，非常宽泛。在老子、管子和庄子等先秦百家的著作中都有关于“气”的论述，只是各自的内涵不尽相同而已。一般而言，所谓“气”是指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即是一种审美态度，一种人生境界。

关于“浩然之气”的命题，在管子的著作中即已出现：“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披四海。”（《内业》）管子极言浩然之气对人的重要性，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与能量。

孟子对“浩然之气”内涵的诠释主要从道德人格角度出发。有人问孟子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

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是一种正大刚直之气，即正气，它必须与道义相结合，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可以说，“浩然之气”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孟子还认为，它是可以后天培养的，主要加强道德上的自我修养。

苏辙对“浩然之气”的涵义理解非常透彻，而且对它作了形象而明确的诠释。他以江水作比喻：“今夫水无求于深，无意于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为易勇，不为险怯，故其发也，浩然放乎四海。”这是大自然表现出的“浩然之气”。而这种“浩然之气”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始终。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生死得失而不惧。”（《吴氏浩然堂记》）

苏轼对“浩然之气”并未作专门的论述，从他对两位先辈诗人——李白和韩愈的高度评价之中足可以看出对“浩然之气”的大力推崇。李白在金銮殿上命权倾一时的太监高力士替他脱靴，历史上传为佳话。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里写道：“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一位正义之士。唐宪宗为了迎佛骨而大肆铺张，糜费财力，韩愈极谏，皇帝大怒，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任上，他施

行了许多善政，深得潮州人民的拥护。韩愈去世后，当地人士为他建庙立碑以资纪念。到宋朝，韩庙年久失修，潮州太守王涤决定修缮，并特意请苏轼为之撰文。苏轼向来推崇韩愈的道德文章，欣然命笔。他在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也盛赞韩愈的“浩然之气”，写道：“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不论是李白还是韩愈，他们行为上所显示出的这种大无畏的人格力量，就是“浩然之气”。

苏轼、苏辙兄弟俩不仅推崇浩然之气，而且，他们的人格力量中同样充满了“浩然之气”，这是他们先天的优秀禀赋的自然流露，也是后天受孔孟等诸子百家的文化陶冶所致。这种“浩然之气”贯穿于他们毕生的言行之中，特别体现在他们为了维护国家、黎庶的权益而不顾个人得失、安危的大义凛然的气节上。

苏轼的性格外向、率真、豪放；苏辙的性格内敛、忠厚、谨慎。兄弟俩性格各异，但在禀赋上完全一致，为人处世刚正不阿，心口如一，坦荡无畏。苏轼评论苏辙：“子由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与子由弟》三首之一）。苏轼更是率直坦诚，疾恶如仇，自云：见到不平事，如蝇在食，不吐不快。在官场上，他们出于对社稷、百姓的高度责任感，敢于犯颜直谏，揭露奸邪，为民请命。

兄弟俩早在青年时代，在参加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制科所写的策论中，就敢于针对朝政的弊端进行激烈抨击，甚至敢于逆龙鳞，将批评矛头直指当朝皇帝本人，显示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苏轼指出：当朝“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兴而礼乐未具”，“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世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苏辙对时政的批评没有其兄那么全面，但对后宫的糜费批评尤其尖锐：“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此何为者也？凡今百姓所为，一物已上，莫不有税……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岁邀金缯，而又内自为一阱，以耗其

所遗余，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他将后宫糜费说成是皇帝自挖陷阱，确实深切。正因为如此，兄弟俩的《御试制策》在考官中引起的争议很大，苏辙差点被罢废，由于司马光等重臣力争，加以仁宗皇帝的首肯，才得以通过。

苏氏兄弟对朝廷政策不拘新旧，唯以百姓的利益为臧否标准。为了坚持真理，他们决不随权势俯仰。为此，变法时期触犯了变法派，使得王安石对他们大失所望；废法时期又得罪了废法派，惹得司马光不悦。结果，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与凶险。

在熙宁变法之初，苏氏兄弟恰巧在京城，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所抵牾。其实，兄弟俩都有变革社会的迫切愿望。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在进献给皇帝的策论中就写道：“当今之世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赋重民贫，边境不宁，民生不安。因此，若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我大宋王朝则危矣！”（《进策二十五首·策略一》）苏辙也认为：“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也”（《新论三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还指出：“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世之本……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应该说，这些社会问题把握得很准。他们同王安石变法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变法的目标、进程和具体做法。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在于以强国为先，通过各种途径聚敛财富充实国库，而且急于求成；二苏重民生，以富民为先，主张渐变，这同司马光、欧阳修等大臣的见解一致。

在熙宁变法期间，苏轼先后两次上皇帝书，指责新法之弊端，反对青苗法尤烈，引起了变法集团的强烈不满，必欲将他撵出朝廷才罢休。于是，王安石的手下诬陷苏轼扶其父灵柩返蜀安葬途中，利用官船贩运私盐等违禁品谋取暴利。结果经查证纯属诬枉，还他以清白。司马光和一些老臣非常欣赏苏轼的这种耿直不阿的精神，司马光曾对神宗说：苏轼“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得失，隳官获遣，无所顾虑，岂非忠臣？”

苏辙尽管处世比较谨慎，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原则性大事，决不含糊，也同其兄长一样敢说敢当。他本来已经进入了王安石的变法机构——置制三司条例司，是变法成员之一。当青苗法的草案制定

之初，他预见到散发青苗钱会带来的弊端，当面向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为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认为还是实行汉之常平法比较妥当。当时，王安石也认为有道理，表示要考虑，后来由于吕惠卿等从中阻挠，才否决了他的意见。然而，苏辙坚持己见，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全面论及新法，否定之处颇多，结果被外放河南府留守推官。不久，事实证明苏氏兄弟对青苗法弊端的担忧不无道理。由于新法忽略了对吏治的整顿，在青苗法的施行中确实出现了严重弊端。朝廷内外的一些官吏为了邀功请赏，强制百姓多贷青苗钱，甚至摊派到户，贫困农户无法偿还借贷，致使民间积欠日益严重，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一直延伸到宋神宗后世。

毋庸讳言，苏氏兄弟对新法确实否定面过宽，有些偏激，但其出发点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或谋取私利，而是完全出于公心，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后来，在司马光当政的元祐朝，苏氏兄弟被召回朝廷受到重用，但他俩对司马光要求在短期内废除全部新法的做法同样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新法已经施行了多年，通过实践检验，应当“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即合理的保留，不合理的废除。特别是围绕着免役法的废除，争论很激烈。苏轼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各有利弊，百姓出免役钱募人代役，便民甚多，然而由于有司奉行失当，追求宽剩之利，引起百姓不满，只要除去弊害，即是良法。司马光听不进去。苏轼当面顶撞说：我苏轼若知媚公，不顾全大局，何不早先迎合王荆公，早图富贵？苏辙连上四章，也极力反对。他非常客观地分析了两者各自的利弊：雇役之弊在聚敛民钱，差役之弊在民不得专力于农，其实相半。且罢差役已二十年，今若恢复，吏民皆未习惯，恐别生诸事。对司马光要求来年即改变新法中有关科举考试的格式，苏氏兄弟也不同意。苏辙奏：“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以往贡举，规定策论一律以王安石和吕惠卿等编撰的王氏经学《三经新义》为标准，这显然过于专断。苏辙的建议非常合理、可行，得到众大臣的赞同。

尽管司马光是位正人君子，并未排斥苏氏兄弟，但那些废法派决不会放过他们。司马光去世后，

理学派的门生朱光庭、贾易等出于对苏氏兄弟才学的嫉妒，废法之争便成了攻击排挤他们的借口。当时，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秉承仁宗的遗愿，重用苏氏兄弟，还多方庇护他们，但苏轼仍不能安立于庙堂，两年内先后出任了杭州、扬州和颍州三个地方官。

苏轼入仕后，对民生的深切关注，成为他为政之道的亮点，为此差点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他的许多诗歌可以说是“悲歌为黎元”。他在杭州、密州等地任地方官期间，亲自目睹了新法的弊病，切身感受到了百姓的苦难，因此写了一些同情民间疾苦、讽喻朝政的诗。例如：揭露官府繁重徭役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谴责赋税“吃”人的《吴中田妇叹》，讽刺新法弊端的《山村五绝》等。正是这些为民请命的诗作，被别有用心的人李定、蔡确等新政投机分子以“讪谤朝政”的罪名，将他拘捕入狱，制造了一个震惊中外的“乌台诗案”。

从苏轼向朝廷参奏的章疏中也可以看到，多数是他在地方任上为民请命的内容。在密州他最早抵制吕惠卿首创的《手实法》，率先向朝廷参奏其法残民之烈。此法规定，凡百姓家的一切财产物品：田亩、屋宅、家畜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均要向官府交纳五分之一的财税；如隐瞒不报，提倡邻里相互告发。此种横征暴敛前所未有，在其试行之处，民怨沸腾。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为了疏浚已经淹塞过半的西湖，顶着朝廷中许多反对者的压力，一再向朝廷上奏，请求批准并拨专款疏浚西湖。西湖开浚之后，杭城百姓家家挂苏轼的画像，饮食必祝祷，还替他建生祠。洛党却弹劾他疏浚西湖劳民伤财，于国于民两无益，完全是沽名钓誉，为自己树碑立传。苏轼对这些诬枉之言从不放在心上，照样我行我素。

苏轼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其中之一，便是积欠之累，多次上札子请求朝廷减免贫困户的积欠。《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对民间积欠之危害阐述得尤为深刻尖锐：“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苏辙担任谏官期间，“当时台谏论列，多子由

章疏”(《曲洧旧闻》),得罪了许多大臣,表现了其铁面无私、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元祐初,熙宁、元丰时期的执政大臣大都在位,如旧相蔡确、韩绛和枢密使章惇,他们对司马光的执政大加干扰,尤其是章惇,完全同司马光对着干。苏辙接连上章请求将他们外放,以保证朝廷的安宁。苏辙对一些野心家,如吕惠卿、蔡京等本质看得很透,对朝廷的不当处置敢于接二连三地参奏。蔡京是北宋晚期祸国殃民的巨奸,在元祐初期他还是名开封府知州,其奸猾的本性尚未充分暴露,人们对他认识尚浅。当时司马光决定五日内罢免役法、复差役法,同朝大臣都感到为难,只有蔡京积极响应,按期悉改畿县雇役,得到了司马光的赞扬。苏辙就此事数次上章弹劾蔡京不忠,“因缘攀附,故意扰民。”揭露了蔡京投机派的嘴脸。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苏辙的先见之明。

在对待吕惠卿的处置问题上,同样显示了苏氏兄弟光明磊落、奋不顾身的品格。熙宁变法时期的风云人物吕惠卿,不仅是个野心家、阴谋家,而且人品极其卑劣。王安石变法时,吕惠卿确实是其得力助手,青苗法等新法多出其手。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吕惠卿对他马前鞍后亦步亦趋,两人情同父子。然而,当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失势后,吕惠卿为了取而代之,一再在神宗面前诋毁他;为了阻止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又制造事端对其进行诬陷;当王安石第二次进京复相时,他甚至用王安石给他的私人信件诬告其对皇帝不忠。这一切致使王安石心力交瘁,第二次自请辞位。可是朝廷对吕惠卿非常宽容,只是将他以资政殿学士出知延州。吕惠卿为了讨好新当权派,又竭力挑起边事逞能。苏辙一再上章弹劾,请求加重惩罚,“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促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见其在位,侧目畏之”(《乞诛窜吕惠卿状》)。终于促使朝廷将吕惠卿贬谪建州,不得签署公事。

苏轼时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执笔撰写了贬谪吕惠卿的诰词。当时,朝廷官员就议论,倘若吕惠卿回朝,必杀二苏。兄弟俩听了坦然地一笑了之。执笔撰写贬谪大臣的诰词是很容易得罪人的,虽然以

后吕惠卿未能东山再起,但贬谪苏轼的理由却与此诰词直接有关。由于吕惠卿是神宗熙宁变法时期的红人,因此撰写贬谪其诰词更让执笔者为难。当时本是另一大臣刘贡父值班,应由他执笔,此人胆小怕事,急忙装病出宫,太皇太后这才命苏轼执笔。苏轼为了避免有损伤神宗皇帝之嫌,特意在文中加以说明,以古为例:“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故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伯鲧是尧的臣子,治水九年而未成,并不损害尧之仁爱之名。宰予擅长言论,一次,孔子发现他昼寝,责骂其:“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尽管宰予是孔子的72门徒之一,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并不损害孔子的圣贤之名。以古谕今,说明吕惠卿之奸佞,并不影响神宗的贤明。应该说,苏轼的诰词无暇可击。然而,由于在苏轼的政绩中找不到纰漏,政敌们屡次以此诰词中的这几句说明为借口,弹劾苏轼攻击先帝用人不当,有“讪谤先帝”罪,同朝的朋党对他的排挤是如此,“元祐党祸”的罪名也如此。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哲宗亲政之后,在朝廷人事上作了一番大调整。他任命章惇为相,蔡京、蔡卞兄弟俩为骨干,元丰时期的大臣纷纷被召回,顿时在朝廷中形成了一股反对元祐,恢复熙宁、元丰的浪潮。其实,这是太皇太后高氏逝世后的必然形势。实际上,哲宗、章惇之流并非想继续推行新法,而是出于政治报复,因此不久便发展成一场对元祐大臣反攻倒算的政治运动,史称“元祐党祸”。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大臣被冠以“元祐奸党”。尽管司马光已经作古,章惇对剥夺其一切封谥特权不解恨,竟然要对其破棺鞭尸。在士林中苏轼首当其冲,殃及父弟门生。这场政治迫害一直延续到宋徽宗时期,直至宋孝宗登基才获得彻底平反昭雪。

在这场政治风云变幻之初,如果苏氏兄弟能够审时度势,臣服于新的当权派,有可能避免卷入一场无妄之灾。但他们不但不善于见风转舵,反而逆风而上,势必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祸。

本来,兄长被贬往定州任职后,苏辙还在朝廷任职。但他不顾自身安危,依然敢于犯颜直谏,抨击新政。他以御试制策所撰策论为题,上章直谏新朝政策和人事的大变动:“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

敢不言。……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颍滨遗老传》）。新派人物借此挑拨离间，挑出奏章中的几句话加以弹劾：“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匱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说什么汉武帝穷兵黩武，苏辙以汉武帝比当朝皇帝，罪大恶极。哲宗大怒，即以“倡为奸言”的罪名将苏辙降职放逐，连降三级，一贬再贬，直至贬逐到岭南，还不放过他。

在士林中，苏轼成为这场政治大迫害中首要对象，是由于他是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高氏的所器重的人才。哲宗对摄政的祖母非常反感，而宰相章惇又同司马光一向不对头。章惇与苏轼是同年，而且与苏轼一向交情不错，“乌台诗案”中，他还曾替苏轼讲过好话。苏轼还是其长子章援的恩师——元祐期间，苏轼主持贡举时，章援中了状元。章惇此人非常感情用事。因此，如果章惇当政时，苏轼如能屈从于他，很可能会放他一马，最多将他贬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苏辙也可能不至于贬往岭南。蔡京就是一例。王安石变法时，此人并未在京城，更非骨干分子；反之，元祐废法时期，他在京城也属于元祐大臣，而且积极执行司马光五日内废除免役法的命令。可是，章惇当政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新派人物”，当了对元祐大臣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还有一个苏轼、章惇的同年林希，曾经对苏氏父子非常推崇。苏轼擢升翰林学士之时，他赠送一副对子表示祝贺：“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章惇当政后，林希并非变法骨干，但善于见风转舵，主动投靠章惇，便成了章惇的笔杆子，贬谪苏轼、苏辙的诰词都是他所撰写，而且，词语非常恶毒：“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惊惑愚众……”连他们的亡父也不放过。以前对他们父子奉承惟恐不及，现在对他们父子辱骂惟恐不过。然而，利用与章惇这种的关系去取悦新的当权派，苏轼不仅不屑去做，而且连想都没想过，自然成了野心家们的施虐和泄愤的主要对象。苏轼不仅在元祐大臣中率先被贬逐过岭的，而且是唯一被贬逐到海南的。

苏轼不论在何种艰难的境遇中，都能豁达自安。既不沉沦，也不颓唐，始终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黄庭坚的一首赠诗由衷地赞扬了乃师的这

一性格特色：“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在贬谪之时，苏轼曾萌生过皈依佛门的念头，也想效法陶潜归耕田园的做法，但他那坦荡无畏的品格，注定他不可能出世或成为陶潜。尽管当时他作为贬官自身难保，依然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疾苦，竭尽全力造福地方、造福百姓。

苏轼在“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中，本受文字所累，可是，他在贬所依然不悔，笔耕不辍。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贬谪在惠州所作的《荔枝叹》。他在品尝美味的新鲜荔枝之时，不禁联想起唐朝由南方快马向京城长安进贡鲜荔枝给民间造成的灾难：“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并由此联想到当朝进贡新茶、进贡鲜花等带来的弊端。诗作尖锐地抨击那些为了向皇帝争宠买好的大臣，不顾百姓的死活，甚至矛头直指当朝天子。他痛心疾首地呼吁：“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早在唐朝，杜牧、杜甫就写过同一题材的诗，但远不如苏轼的《荔枝叹》揭露得尖锐，谴责得深刻，联想得更丰富。

苏辙生性淡泊，生活上一向节俭，粗茶淡饭，便能满足。即使在京城为官八年，擢升至执政之位，生活从不奢华，只是积蓄了些钱买了些田地，作为归隐之用。“乌台诗案”之后，苏辙由于受兄长的牵连，被贬监盐酒税，这是最低级的地方官，俸禄很薄。他家六女三子，食口如林，生活非常艰苦，但他自比颜回之乐。在烦琐的工作上，尽管其文名在士林中也很响亮，但毫不自命清高，而是认真地办事。他在《东轩记》写道：“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晚年被放逐岭南，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在《祭八新妇黄氏文》中说：“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风波恐惧，蹊逐颠绝。所至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翳，医药无有。岁行方闰，气候殊恶，昼热如汤，夜寒如冰。道行僵仆，居室闲瘁。”不仅如此，政治迫害接踵而至。苏辙在雷州租借了太庙侍郎吴国鉴的房子居住，南下巡视的酷吏竟然诬陷苏辙“强夺民房”，要将“他下州追诏究治”。苏辙出示借据，房主也证明是租借，董必才无话可说，但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再贬至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循州，房主吴国鉴也被削去官衔降为编管。雷州太守张逢曾礼遇二苏，且替苏辙修缮住房，也被勒令停职。苏辙

为了不再连累他人，从此杜门谢客，整理旧学，专心写作。《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等四书皆成，还撰写了《巢谷传》，缅怀老乡的侠义精神。宋哲宗死后，苏辙获赦回到中原隐居，他勉励儿子苏逊：“畴昔南迁海上雷，艰难唯与汝同来。……乘田委吏先师事，莫学陶公到即回。”（《送逊监淮西酒税并示诸侄二首》）尽管他自己在仕途上历尽坎坷，饱经沧桑，但仍然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教诲子辈，既然踏入了仕途，必须积极投入，不要学陶渊明遇到挫折就退避田园。

苏轼、苏辙兄弟对国家、对人民赤胆忠心，晚年却惨遭政治迫害，被放逐天涯海角，备受折磨。苏轼的爱妾和苏辙新娶的儿媳妇都死于流放地的瘟疫，苏轼回到内地的当年即一病不起。可是，兄弟俩对此无怨无悔。苏轼在返回中原过大庾岭时，给弟弟写了一首诗：“投章献策漫多谈，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数行清泪岭云南……”（《过岭寄子由》）这首诗道出了兄弟两人共同的心声。

苏轼临终前的绝笔中有两句诗：“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梦中作寄朱行中》），可以说正是苏轼、苏辙兄弟的写照。苏辙在其自传中写道：“以此居富贵，处贫贱二十余年，而心未尝动……”苏轼、苏辙兄弟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正是“浩然之气”的充分彰显，是他们人格力量中的精萃。

秦观是苏轼最得意的高足，对二苏理解之深、评价之高，超出常人。在《答傅彬老简》中，秦观如是说：“阁下谓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如天，故其文章如锦绮焉，其说信美矣，然非所以称苏氏也。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中书（指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补阙（指苏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沌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也。”（《淮海集》卷三十）傅彬老称赞苏氏兄弟的文章如蜀锦般华美，认为这是由于他俩是蜀人所以得天独厚。秦观以为此种说法固然很美，但是片面。认为他们最伟大之处在于其德行崇高，才识卓越，足以担当国家重任。

秦观评论非常恰当，苏氏兄弟的伟大之处，不

仅仅在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更在于他们卓尔不群的思想境界，崇高的人格力量。他们言行中始终如一地表现出的“浩然之气”，就是他们人格力量的精粹。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浩然之气”不仅单纯地传承了孟子的道德规范，而且突破了封建道德的规范，成为一种亘古常新的精神财富。

（山东济宁学院教授）

（上接第32页）

⑪朱熹著《御纂朱子全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1450页卷五十九《诸子二·苏氏》。

⑫⑬钱锺书《谈艺录·补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322页、第321页。

⑭杨胜宽《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356页《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析苏、黄创立“宋调”的一条作诗原则》。

⑮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三卷第170页《答李翊书》。

⑯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86页《陈言俗语的点化与活用》。

⑰《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70页叶燮《原诗·内篇上》。

⑱⑲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卷一、第67页卷二。

⑳㉑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25~1526页卷二十九《书鄱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第2630页卷四十八《韩幹马》、第1522页卷二十九《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

㉒㉓徐中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自是一家》、第71页《胸有成竹》。

㉔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苏轼的艺术风格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2~623页。

㉕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卷一，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㉖《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赵令畤《侯鯖录》卷七。

㉗缪钺、叶嘉莹《灵溪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叶嘉莹《论苏轼的词》。

（乐山师范学院纪委书记、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谈东坡“重复自己”

郑秉谦

内容提要：本文搜罗苏东坡诗文中重复使用“吾生如寄耳”、“匹如原是×州人”等词语并且分析此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东坡 重复自己 原因

一 苏诗九用“吾生如寄耳”

在古今中外的大诗人中，同一诗句在一用之后，很少再用，更不必说屡屡重复。但在《苏轼诗集》中，我们却可以查到作者至少曾九用“吾生如寄耳”一语，现以成诗的先后，排列如下：

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

——熙宁十年（1077），42岁作《过云龙山人张天骥》①

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

——元丰二年（1079），44岁作《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②

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

——元丰三年（1080），45岁作《过淮》③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

——元祐元年（1086），51岁作《和王晋卿》④

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

——元祐五年（1090），55岁作《次韵刘景文登介亭》⑤

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

——元祐七年（1092），57岁作《送芝上人游庐山》⑥

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元祐八年（1093），58岁作《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⑦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

——绍圣四年（1097），62岁作《和陶拟古九首》（其三）⑧

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

——建中靖国元年（1101），66岁作《郁孤台》⑨

二 诗文中多次用“匹如原是×州人”

东坡曾先后贬谪黄州、惠州和儋州，他文中常用“匹如原是黄（或惠儋）州人”一语，或意思近似但字句略有不同的话。如：

仆虽忧患狼狈，然正如当初不及第，即诸事易了。

——元丰三年（1080），45岁黄州作《答李寺丞二首》⑩

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

——元丰四年（1081），46岁黄州作《与赵晦之四首》（其三）⑪

譬如原是惠州人，累举不第，虽欲不老于此邦，岂可得哉！

——绍圣二年（1095），60岁惠州作《与程正辅三首》（其一）⑫

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

——绍圣二年（1095），惠州作《与孙志康二首》（其二）⑬

未说妙理达观，但匹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

——绍圣二年（1095），61岁惠州作《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十三）⑭

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鵲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绍圣四年（1097），62岁儋州作《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其二）⑮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元符三年（1100），65岁儋州作《别海南黎民表》^⑥

三 他为何要“重复自己”

东坡居士本是一个文思诗兴“如万斛源泉”，不择地涌出的大才子，但他却在诗中九用“吾生如寄耳”，在诗文中七用“匹如原是×州秀才，累举不第”一类句子，不是他江郎才尽，找不出另外佳句，而是因他对这两句话感触太深了，以至不时脱口而出。

苏轼一生，连头带尾，只活了66岁。而其中贬于上述三州，加上往来途中，连头带尾，则达15年之久。这不能不使他常常以“匹如原是×州秀才，累举不第”，只好长住本州，以安慰自己。在儋州的最后两年，他更安心得“鹄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甚至进一步以为自己本来就是“海南民”，只不过过去一度寄生于西蜀而已。他早在元祐大用期间，即曾写诗赠曾因乌台诗案而贬岭南的王巩的侍儿柔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便是东坡用来对付15年贬谪的不二法门。

这不二法门，又非东坡到了贬谪时才产生的。早在他进入仕途甚至被朝廷大用期间，他早就拥有了。苏诗中脱口就来的“吾生如寄耳”五字即是明证。按“吾生如寄耳”一语，来自谢安致支遁（道林）的信：“人生如寄耳，终日戚戚，迟（待）君来以晤言消之。”谢安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之一。在他那个时代，人并不以功业、学问、节操，而以思辨风神、精神状态，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得到集中反映）。这可说是人的觉醒。谢安为当时人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淝水大捷，而更是他闻捷报而照常下棋、罢棋后却不觉折屐下一齿的风采。在他之后的陶潜也是这种风度的另一代表。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束带见“乡里小儿”（即他的上司），弃官不做，非常自觉地从政治、功业中退出来，把精神寄托于饮酒、做诗、读书、劳动等田园日常生活中。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他“欢喜”。

苏轼与陶潜不同的是，他乃被迫从政治、功业中退出的。但相同的却是，他即使在政坛受大用期间，他就拥有极浓的退隐态度、人生感伤与强作超脱的思辨。“吾生如寄耳”，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的

归宿。正是拥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在当红时不得意忘形，不淫于富贵，而时时认为自己出处本无所择，不知何者为祸福，甚至早早想归田。正是拥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一当噩运来临，他便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对沉浮否泰看得开，把岭海之贬当作一次闲游。在贬谪生活中，他饮酒、做诗、读书、种花、种药、种菜、种粮食，把自己看成黄州一士、惠州一民、儋州一氓。

这时，他在政治斗争、文化斗争中那个“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战士形象消失了，而代之以“徜徉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隐士形象。这时的他，与陶潜一样，“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绌，且欣然而归止”。黄州与岭海15年，他的生活表象与普通一民完全相同，不同的仅仅是超脱的精神境界而已。

正是他早已看透“吾生如寄耳”，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把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庄子的遗世独立的精神结合起来。战士形象与隐士形象，在他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他在黄州时代就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他眼里，显时微时一个样，玉皇乞儿一个样，一切超脱，一切和谐。“吾生如寄耳”的宏观看法，“匹如元是惠州不第秀才”的现实做法，使他在达时穷时都安于饮酒、作诗、读书、劳动等生活表象，而孕育、培养了他超脱的精神世界，以及反映与纪录这一精神世界的浩如烟海的诗文词赋。后人称他的这些诗文词赋为“苏海”，而“苏海”就是他这一复杂而鲜明的形象的反映。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张志烈、马得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0年版，第1540、1951、2126、2971、3561、4040、4228、4884、5248、4934、5119页。

⑩、⑪、⑫、⑬、⑭张志烈、马得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0年版，第6602、6283、8610、5949页。

（浙江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温州大学兼职教授）

试论苏轼、苏辙《岐梁唱和诗》的意义

葛祥邻

内容提要：本文论及苏轼、苏辙《岐梁唱和诗》的意义：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美丽的盟约；中国邮政史上，一段有趣的奇闻；中国政治史上，一把神奇的钥匙。

关键词：苏轼 苏辙 岐梁唱和诗 意义

在中国这个诗歌大国和诗歌精神家园中，北宋三苏一家，是一簇十分夺目耀眼的诗歌奇葩。他们不但以父子三人，同题同地分咏的《南行集》诗的旅行纪要，称著于世；而且，还以兄弟千里，异地定时吟咏的《岐梁唱和诗》，扬名诗坛。《岐梁唱和诗》是他们执着地坚持诗歌创作的高尚情操的生动表现。也是今天，弘扬民族诗魂，发展时代新诗的光辉榜样。

苏轼、苏辙《岐梁唱和诗》的意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美丽的盟约

（一）兄弟相约，每月一篇，坚持不懈

岐梁唱和，本来是为了解决兄弟千里相隔，异地相念的一种掷抛忧愁的办法。因为，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自幼一起长大，从未分手离别。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为了壮志报国的价值追求。他们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曾顽强地奔走于汴蜀之间。经过科举和制科的两次考试，名列前茅，誉冠文坛，文动京师，成为冉冉升起的两颗耀眼的新星。

科场取胜日，政坛入门时。朝廷一封任命，肯定不会兄弟一处同官。面对当时三苏汴京家中的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折中的方案终于产生。苏轼挈妇携子，千里远行，以迈往之气，赴任凤翔，做好平生仕途的首任。苏辙则暂时弃却商州之任。留在汴京，照料父亲和家小。

正是这种政事困惑，还有将要分别三年的实际情况，促使兄弟二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诗歌通信的办法。首先由哥哥倡议，兄弟两人共同约定，每月通过邮路，寄写一篇诗作。坚持不懈，按时发送。从而，使岐梁唱和的棠棣诗约，得到真正的落实。

在《次韵子由除日见寄》中，苏轼的这种背景和情怀，表达得十分清楚。“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擲”。

（二）唱和内容，宽泛切实，直抒胸臆

《南行集》是一部用诗歌形式，记述的苏轼举家东迁的南行漫记。在这一过程中，在父亲兼老师的具体指导下，父子三人，命题作诗，当场吟咏，共同切磋。一路上观于外而感于衷，触景生情，取得了“江上同舟诗满篋”（《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二首》）的丰硕成果。

而《岐梁唱和诗》则是苏轼兄弟二人，自“郑西分马泪垂膺”之后，三年离别过程的诗文再现。在这一过程中，弟在东京，兄在西边。日思月念，异地唱和，以诗信为载体，远距离传达情谊，各自分别进行的诗歌创作。若要相互切磋商讨，要相隔一月，在下次唱和中，再作交换。

而且，父亲又不能亲在现场，耳提面命。因此，这就无形中增加了苏轼的长兄责任。有关唱和诗的题目和旨趣，都要他先行选择确定。

从已知的岐梁唱和诗的内容来看，苏轼的确是模范地尽到了兄长的责任。题材宽泛，内容切合实际，意味深长。政事文学，文才武略，宇宙人生，感悟体验，到琴棋书画，景观人物，喜怒哀乐等方面，涉及极广，均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

弟弟苏辙向哥哥所提出的“且学为政，益治其文”的建议得到接受。他们兄弟二人，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的钟爱。在积极勤奋的习练创作中，在雪夜或病休的偷闲之时，他们从同题分咏，和韵，步韵，

五古七律，长短句，五百字等方面，也都作了广泛的涉猎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被结集为《岐梁唱和诗》。

《岐梁唱和诗》又名《秦魏唱和诗》，是秦地岐下，与魏地汴梁，两地的代称。其中不少篇目，构架奇巧，思路独出心裁，令人爱不释手。许多名篇，在当时，就已广泛流传。在三年凤翔任期中，在其步履所及的区域内，在苏轼的周围，曾经吸引和凝聚了许多诗歌爱好者，也推动了当时当地的诗歌的兴盛和繁荣。

比如像《题宝鸡县斯飞阁》诗，既写出了宝鸡形胜的壮阔和春光的明媚，又将恪尽职守与思念故乡的复杂和矛盾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

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
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
昏昏水气浮山麓，泛泛春风弄麦苗。
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

有人认为，苏轼在斯飞阁上思乡念家，已经到了魂不守舍的程度。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斯飞阁在宝鸡，正对着通往故乡四川的归路益门山口。那是昔日熟悉，又曾经奔走过的入川蜀道。

苏轼在凤翔任上，十分怀念已经安葬在故乡的母亲。那是嘉祐二年的时候，他刚刚考中了进士。不幸母亲突然去世。千里奔丧，三年丁忧。功名仕途，暂且归于搁浅。后来，除去孝服后，举家东迁。好不容易，通过制举，才有了凤翔之任的机会。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子情怀，无论是谁，都会发此感慨的。而在四县行巡视中的公务之余，苏轼能有幸登临此阁，倚槛远望，自然会产生出无限的思绪来。

在诗中，苏轼情感的焦距，倚着阁槛，拉动了三次。一次是阁上望归路，由近及远。西南归路，远且萧条。二次是阁上看宝鸡，由远及近。野阔牛羊，长天草树。山麓水气，春风麦苗。三次是阁上思终老。由近及远。故乡家园，已交亲友看管，何时才能像渔翁樵夫那样，自由自在地在家乡，安度晚年生活。其中“谁使爱官轻去国”的自问，让苏轼整整思考了一辈子。

再比如《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诗中的怀弟之情，情真意切。重阳

独游僧阁，地隔心连，思绪绵绵。作者的泪，与读者的泪，同催俱下，挥之不去。

花开酒美曷不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在理解这首诗时，不少人，将“曷不归”读为“喝不醉”；将“不问秋风”读为“不向秋风”。由于未能解开“归”是“在一起’的本意，不了解重阳节时，东晋大将军桓温在襄阳龙山聚友，参军孟嘉赏景落帽，巧妙赋诗，自我解嘲的历史掌故，所以，也就难以深刻理解“问”的真正含义。

在如今的“一触即发’的电脑时代，诗歌创作，幸运的具有了新的条件和手段。只要爱好者，掌握了原理，勤奋地练习，是可以便捷地熟中生巧的。因此，今天，以两苏的执着精神为榜样，善于进行网上创作和手写创作，将传统方式和现代手段，交互结合使用，就一定取得成功的。

在建设新时代的精神家园中，应该不断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在诗文书画学习过程中，在广大青少年中，在一些有条件的家庭中，仿效三苏之家的诗歌教育和创作模式，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二、中国邮政史上，一段有趣的奇闻

（一）驿程邮路，文字通信

在没有电话、电报和手机的古代，除过官方急件羽檄，马不停蹄，急递快达以外。一般信件，都是通过常规邮路，沿着管辖线路，逐步传递的。从西边凤翔到开封京城，一般要走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二）八行信笺，承载有限

中国古代的信件，通常都是采用一页纵行八行的信笺，俗称“八行书”来书写的。岐梁唱和诗稿，也一定是以宋代依然通用的八行书笺书写的。如果内容较多，就要用很多信纸。然后，装入信封，做好密封。再由邮吏，进行辛苦的传送。每一封信，不能过多过厚和超重。因此，必须做到言简意赅。

苏轼有不少诗句，是感激和赞颂邮吏的。“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僧。”（《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这是有其原因的。试想，

一月之内，两次往来书信，三年记事三百六十多封信件。本来就交通和邮路不便的边远通信，由于他们的加入，加重了邮吏的负担，所以，从内心深感疚愧。

但是，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的邮吏辛苦，却为中国诗坛，传递和保存了具有伟大意义的诗歌瑰宝，轶闻趣事。邮政通信，功不可灭。

三、中国政治史上，一把神奇的钥匙

（一）三年资途，一条红线

苏轼在凤翔，三年资途，政事文学，成就突出，双获丰收。留下的文字成果，十分丰赡。概括起来，可用“三记”（《喜雨亭记》，《凤鸣驿记》，《凌虚台记》）；“一论”（《思治论》）；“两上书”（《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上蔡省主论放欠书》）；“百三诗歌五十文”（即一百三十首诗歌，五十篇短文），来加以概括。

其中，一百三十首诗歌，就包括有“岐梁唱和诗”中的最为主要的部分。有些篇目，虽然不是岐梁唱和诗。但是，也是与别人的唱和之作，或者是其他应景、应社之作。当然，从角度和深度上来说，是不能与岐梁唱和诗，进行比较的。在直抒胸臆方面，兄弟之间，自然是口无遮拦，心无挂碍，不用避讳和保密的。

如《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中，向弟弟释疑解惑说：“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真诚地表示，自己由于公务繁忙所耽误的诗帐，是一定会奉陪和补上的。

如《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关于“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月长”、“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的知心话，都是不便透露给别人的秘语。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因此理解岐梁唱和诗，是理解苏轼凤翔三年资途、万种情怀的一条红线。

（二）透视三观，一道屏幕

苏轼在凤翔，三年为官，初登仕途。勤政爱民，壮志报国。这是他“所至之处，悉有善政，诗文书画，俱成大家”的终生评价的重要部分。在这个仕途起点上，苏轼从一个初来乍到时的“文坛新星，文章熟手，政坛新兵，政事生手”，从一位二十六到二十九岁的小伙子，经过实际任职磨练，很快变

成一位“始者学书判，近已知问囚”的良吏熟手。由于功成任满，荣升回京。凤翔初任，留下了他的美好人生的重要一页。

苏轼在凤翔，“三观”明确，行端风正，有贤良廉吏之美誉。如今的风翔苏公祠，就是生动的见证。而且，他的言行，还成为了凤翔县的县训，保存在县志之上。“浚东湖以兴水利，新苏祠以励官方”，至今，依然受到重视。

苏轼的“三观”，指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凤翔，苏轼的世界观十分明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金玉良言；积极入世，奋厉有为，修齐治平的思想；格物致知，深究物理变化之道的思想，渗透在他的许多诗文之中。“从宦无功漫去乡”的信条，就是以民为本，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反观自照。也是他的“谁使爱官轻去国”的自问的深刻回答。

在人生观上，苏轼保持着乐以忘忧、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乐观人生，积极人生，奋斗人生的理念，时时坚持在他的人生信条之中。他还建议弟弟，要好好向深明《易学》的父亲请教《易经》，“易可忘忧家有师”，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苏轼在凤翔的价值观，总是按照利国惠民，益世自重的言行评判标准，清廉自守，贯彻始终的。他时时处处，不忘老父亲地教训和贤妻王弗的提醒。做到自尊、自重和自爱。诚如他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向宰相韩琦所表达的那样，“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自从到任以来，日夜厉精。虽无过人，庶几寡过”。也如在另一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国恩久未报，念此惭且泚”。

岐梁唱和诗，像一道灵魂屏幕，透视其中，可以睹见青年苏轼的三观状态，理解他们兄弟二人的精神家园。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汲取许多可贵的精神财富。

（陕西省宝鸡市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苏轼签判凤翔时期政绩述评

任永辉

内容提要：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期，积极要求改革，在其任上勇于实践，兴利除弊，改革“衙前之役”、“以官榷与民”、免除积欠、浚修东湖、祈雨重农，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

关键词：苏轼 凤翔 政绩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虽然个人仕途坎坷、宦海沉浮，但他始终实践着“致君尧舜、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无论在朝居官，还是任职各地，苏轼都深切地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生民、百姓的疾苦。本文对其任凤翔府签判时期的政绩加以述评。

苏轼于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应制科入三等，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罢任还朝。凤翔府位于陕西关中西部，府治在今陕西省凤翔县，是宋时西北军事重镇和关中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到任，“伏自到任已来，日夜厉精。虽无过人，庶几寡过。……所任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作为北宋西北军事重镇凤翔府的签书判官，苏轼除佐助太守，掌管文书，负责京都、边陲物资供给外，还经常到府属各县视察，兴修水利，监察狱讼，减决囚禁等等，并从国家大局出发积极要求改革，而且在其任上勇于实践，兴利除弊。

一、改革“衙前之役”

“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职责是代官府押送纳运，保管财物并要包赔损失。凤翔府的“衙前

之役”是每年砍终南山的竹木，编成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经三门峡运到京城，这使得很多服役之人倾家荡产。他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说：“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并指出衙前之役“荡民产业，忽如春冰”，自己深感“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后来他经过调查，发现木筏之害，本不至于这样严重，如果在渭水、黄河未涨时，让操筏的人自己考察水势运送木筏，情况可能就会好得多；而官府偏规定在渭水、黄河暴涨时运送，造成严重危害。于是他“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从此才使“衙前之害减半”。

二、“以官榷与民”

宋朝建立后制定了商税条例，对人民生活中的一些必需品如茶、盐、酒、矾，实行官卖，又叫官榷（商税和官榷是宋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苏轼早在《进策》中就反对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反对“天下之利，（朝廷）莫不尽取”。在签判凤翔时，他明确主张把官榷“尽以予民”。这样虽会失掉专卖之利，但可从税收中得到一些补偿，即使就是完全失掉这笔收入，比起“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来，也有利得多。并且指出“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怨而永虑也。”（《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三、免除积欠

当时凤翔府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欠官府的

债务而被关押，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掌管理欠，经常鞭笞小民，却只能收回很少一点积欠。他说：“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觉悲者。”（《上蔡省主论放欠书》）因为这些人欠债的原因有些是很荒唐的，如管押竹木，被水冲走了，要赔；守护粮食布帛，岁久霉烂，也要赔。朝廷上下明明知道这些人的无辜，并且没有油水可榨，赔不起，只好赦免。但是，贪官污吏却借此敲诈勒索，有钱行贿则赦，无钱行贿则照样关押，甚至赦免六七次了，这些无钱行贿的人仍照样未赦。苏轼愤慨地说：“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耶？”因此，苏轼上书主管部门，要求“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以便这些欠债之人“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上蔡省主论放欠书》）

四、浚修东湖

东湖位于凤翔县城东南角，原名“饮凤池”，相传周文王元年有凤凰来此饮水。嘉祐七年（1062）秋，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藉“饮凤池”挖掘疏浚，引县城西北角凤凰泉水注入，种莲植柳，建亭设桥，改名东湖。清道光年间凤翔知府白维清在《重修东湖碑记》中记载：“距郡城而东有湖焉，固凤凰泉注水之潞也。宋嘉祐中，苏文忠公以一代伟人，签判是郡。公余巾杖来观，相度地形，以斯湖可浚而成也。引泉水由西北折而之东，延袤数十里，注之于湖。水多则蓄之，以防涨溢；干旱则泄之，以润田畴。湖成而民利普焉。”苏轼本人亦有《东湖》一诗记之：“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泉源从高来，随坡走涵涵。东去触重阜，尽为湖所贪。但见苍石螭，开口吐清甘，借汝腹中过，胡为目眈眈。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飘摇忘远近，偃息遗珮簪。深有龟与鱼，浅有螺与蚶。曝晴复戏雨，戢戢多于蚕。……聊为湖上饮，一纵醉后谈。……不辞日游再，行恐岁满三。暮归还倒载，钟鼓已谿谿。”从其诗中可以看出，东湖在当时已初具规模，既为休憩园林，又可灌溉

农田。

从北宋起，东湖的历史近千年，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多次修葺，现保存有大量的古建筑，是我国北方古园林的典型，有“渭北平原明珠”之誉。“湖似郎官好，名因学士传”，苏轼离开凤翔虽已近千年，但在凤翔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与东湖同在，东湖成了凤翔人民缅怀这位“良吏”的最好去处。

五、祈雨重农

北宋仁宗嘉祐年间，关中地区民贫役重，生产凋敝，苏轼到任不久，关中大旱，数月不雨，“自去岁九月不雨，徂冬及春，农民拱手，以待饥馑，粒食将绝，盗贼且兴。”（《代宋选奏启封太白山神状》）面对如此情景，他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交织着强烈的爱憎情感，多次到太白山、磻溪等地为民祈雨，渴望自己能够消除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我来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是日至磻溪，将王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安得梦随霹雳驾，马上倾倒天瓢翻。”（《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和子由闻子瞻将如太平宫读书》）从中可以看出苏轼面对“农民拱手，以待饥馑，粒食将绝，盗贼且兴”的艰难处境，渴望解除旱象、减轻人民痛苦的忧民爱民之心。

苏轼在凤翔任职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在在这三年里，他本着儒家德治仁政、忠君爱国的思想，“日夜厉精”，征询疾苦，兴利除弊，申言革新，实现着他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凤翔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政治廉洁、为民造福的一代良吏，在东湖内修建了“苏文忠公祠”，几百年来祭祀奉拜。“道学寓风流当时帝许奇才一代文章高北宋，宦游同石隐此日人怀旧德百年笠屐寄东湖”，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政绩连同他在凤翔写就的寄寓着他政治思想的诗篇，在历史长河中将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苏东坡与雪浪石

张玉橙

内容提要：结合苏东坡有关雪浪石的诗文和相关的遗址、遗迹、文献、文物、诗词，导引读者体味一代文豪的豪迈与坦荡，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绵延悠长。

关键词：苏东坡 雪浪石 众春园

北宋时，定州城东北隅有众春园，松柏成荫，竹荷飘香，亭台轩榭造型典雅。这是宋太宗年间，由中山太守李昭亮创建，庆历八年知州韩琦扩建的著名的古典园林，取“偕众同春”之意。此园早已毁于战火，而今在旧址之上，假山、树影之间可见一亭，亭下保存着遐迩闻名的雪浪石。

雪浪石是定州八景之一，是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时所得。苏东坡一生政治生涯坎坷，屡遭贬官。元祐八年（1093）九月贬官定州，在知定州六个月的时间里，整治军纪，加强边备，发展农桑种植，留下了众多的遗迹与传说，其中雪浪石为其钟爱之物，寄托了他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对家乡的无限思念。苏东坡《雪浪斋铭并引》云：

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为“雪浪斋”云：

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
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
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
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

此处提到的孙位是唐代的处士，善画山水。苏公对他所画的奔湍巨浪很是欣赏，说其能“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而宋代的孙知微虽无作品传世，但苏公称其墙上所作山水“作输泻跳

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虽盛夏之际，也觉“阴风袭人，毛发为立”。将雪浪石与二位画家的山水画媲美，可见东坡先生对此石欣赏至极，倍加喜爱。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也就是题写《雪浪石铭》不久，苏轼贬知英州。此后盆石逐渐埋在历史的变迁中，直到明万历八年（1580）原盆才为真定令郭衢阶至定州时发现，原石也于万历十年被知州唐祥兴发现，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州牧韩逢庠将盆石移至众春园内。

据定州古志记载，众春园早期毁于战乱，后曾被豪劣侵占，至明万历十四年州牧唐祥兴寻获旧址，得以恢复。并在园内建韩苏公祠，以祀韩、苏二公。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相继巡幸过定州，置行宫于众春园旧址。道光二十七年（1847）罢止行宫。清末及民国时期为校址。建国后曾建干部疗养院，现在为解放军医院占用。

雪浪石自康熙四十一年以来，一直保存在众春园旧址之上，1952年建亭保护。在这假山树影间不仅有东坡珍爱的雪浪石，还有一块乾隆御题的“后雪浪石”。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州刺史李文跃在临城掘得一块白色太湖石，发现石上篆书“雪浪”二字。李文跃得知乾隆皇帝甚爱雪浪石，便请直隶总督方观成奏闻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下令迁石至众春园，并为此写了一篇《御制雪浪石记》记述此事，御题此石为“后雪浪石”。将苏东坡之雪浪石题为“前雪浪石”。后雪浪石高280厘米，为一方太湖石，仿前雪浪石盆刻芙蓉一周。前雪浪石高76厘米，青石质，黑质似山，白色的纹络犹如石间涓涓细流，盘旋曲折，奔流而下。下面的石盆高68厘米，径宽136厘米，盆唇刻有雪浪石铭，盆外刻芙蓉纹两周，如白莲绽放。石盆下面是六角形石座，六边阴刻水波纹。二石中乾隆皇帝御书依稀可见。石、盆、座组合巧妙，前后雪浪石相映成趣。

苏东坡一生对“雪”字情有独钟。著名的《前赤壁赋》中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诗句，贬官黄州时书斋为“雪斋”；在定州发现的这方青石似一幅俊美的山水画，将其置于盆中，激水其上，又似浪花飞溅，遂名“雪浪石”，书斋因石得名为“雪浪斋”。在流放海南的艰苦岁月中，东坡先生仍以《雪浪石》诗自慰：

雪浪石

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
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
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
千峰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门。
竭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
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
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
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
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
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

雪浪石

我顷三章乞越州，欲寻万壑看交流。
且凭造物开山骨，已见天吴出浪头。
履道凿池虽可致，玉川卷地若为收。
洛阳泉石今谁主？莫学痴人李与牛。

可见雪浪石对苏公影响之大，此石也因苏东坡的声望而名扬天下。正因如此，在我国各地也保存着苏东坡之“雪浪石”，除定州市现存前后雪浪石外，南京的瞻园、上海镇江的金山寺均收藏着大小不同、形态迥异的“雪浪石”。在这众多的雪浪石中是否都是苏东坡搜集赏玩的藏石，我们不得而知。但乾隆皇帝作诗吟咏的这块“雪浪石”确为定州所藏。

乾隆皇帝酷爱古董，对“雪浪石”兴趣极浓。乾隆十一年、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一年、四十六年、五十七年曾六次驻蹕定州，对雪浪石咏诗达三十余首。曾先后命张若霭、董邦达、张若澄、钱维城绘《雪浪石图》，蓝本均出于定州雪浪石，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冯春江先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第一幅《雪浪石图》是乾隆十一年（1746）张若霭绘制。张若霭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的重臣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康熙五十二年（1713）生，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后为内阁学士，擅长书

法绘画。乾隆十一年初冬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路过定州，驻蹕众春园（当时已辟为行宫）时，命内阁学士张若霭绘《雪浪石图》。这幅《雪浪石图》为宣德本，纵五尺五寸九分，横二尺九寸八分，现收藏于避暑山庄博物馆。第二幅是乾隆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巡幸五台回宫后命董邦达绘制《众春园图》和《雪浪石图》。乾隆赋诗再咏雪浪石：“憩游为想韩苏躅，苔藓全蚀波浪痕。由来忘筌乃近道，刻舟求者岂足论。此物颇幸仇池石，至今安在高丽盆。剪烛清吟参结习，地炉活火方温存。”第三幅是乾隆三十一年春，巡幸五台山驻蹕定州时，看到赵州刺史李文跃从临城掘得的这块太湖石，认为“是非真伪，无庸复辨，且均不朽矣！”即命“张若澄绘其状以归，与其兄若霭记图并藏之石渠”。乾隆赋诗道：“今复雪浪出，难唤泉下人。故其见长记，兹弗更赘言。然不可无图，若澄其继昆。”当时张若霭已故二十年，命其弟张若澄绘制了《后雪浪石》以告慰其兄。此图为宣德本，纵五尺七寸，横二尺八寸。第四幅，乾隆五十七年，乾隆西巡驻蹕众春园，对二石进行评论，他认为“既订以识，并书两图，此盆既有苏诗，应以为真。”乾隆命钱维城绘二石于一图之上，长手卷，宣德本，纵九寸，横六尺一寸。

张若霭绘《雪浪石图》是第一幅，乾隆皇帝给予了很高评价。曾赞道：“若霭昔图石，谓已传其神”，“壁张欲出云烟气，烛照曾无笔墨痕”。并在张若霭所绘的《雪浪石图》上三次题诗论证。

乾隆十一年，和苏轼“雪浪石铭”原韵，赋诗于《雪浪石图》的中上方：

造物精气视所屯，石中巨擘雪浪尊。
巍然曾见宋冠带，介尔不受世朝昏。
沃之以水跳珠沫，翠影仿佛浣花村。
曾闻此语半疑信，惜哉未访荒园门。
写真无虑道士醉，醉里越得传神魂。
词臣颇善米家画，渲染爰命探天根。
壁张欲出云烟气，烛照曾无笔墨痕。
两孙绝技亦已擅，兴来拟唤髯翁论。
此翁诗句岂易和，如继阳春以叩盆。
前言未足更叠韵，仇池事例今聊存。

同时将张若霭“和乾隆雪浪石诗韵一首”御书在此图左下角。（下转第53页）

随风入俗放飞鸽

——漫谈苏轼与鸽

钱邦伦

内容提要：苏轼对鸽情有独钟，本文重点结合苏轼诗《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的赏析，来看他对自由的向往与憧憬。

关键词：苏轼 鸽 雪衣

鸽子是和平、幸福、友谊、团结、美丽的象征，自由的希望。祖国历代文化名人都十分喜爱鸽子。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爱鸽恋鸽，更是情有独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1036年，卒于1101年，他22岁中进士。少年时代，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家养群鸽，翔集其间，殊不畏人。苏轼在《异鹊》诗中写道：“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亲自饲喂，观群鸽啄食，嬉戏竞飞。

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跟随其父及弟弟离开四川眉州，到了河南的开封。嘉祐六年，苏轼解除母丧之制，出任陕西凤翔签判，踏上仕途，官至翰林学士。但这位才华卓绝却不合时宜的诗人，一生仕途坎坷。他曾两度任职杭州。北宋熙宁四年（1071），36岁的苏东坡被外放任杭州通判，开始与江南“相忘于江湖”。他住在西湖边，远处可以望到奔流的钱塘江。他主持西湖疏浚工程，为了避免西湖被荒草侵蚀，苏轼鼓励百姓种菱、养鱼，以改善环境。在当时的杭州一带，民间养鸽成风。他们在鸽腿上系上风铃，数百只群起群飞，望之若锦，风力振铃，铿锵如云间之珮。正如北宋诗人梅尧臣描写系哨放鸽的生动景象：

孤来有野鸽，嘴眼肖春鸠。

……

一日偶出群，盘空恣嬉游。

谁借风铃响，朝夕声不休。

百姓爱鸽、恋鸽，以放飞为乐。“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女诗人周韶在这首诗中深刻地表现了古代杭州人放鸽竞飞的喜悦心情。民歌云：“万鸽飞翔绕帝都，朝暮收放费工夫。何如养取云边雁，沙漠能传二圣书。”他们平时放飞，万鸽竞翔，蔚为壮观。逢生日喜庆，送寿礼送鸽子，给寿星祝寿则别具情趣。据资料记载，北宋熙宁年代，王丞相生日，巩大聊组织饭僧献礼，携带笼鸽去到王丞相府，在举杯开宴前夕，放鸽者皆要席地而跪，揭帘开笼，逐一放飞，每放一鸽，祝福云：“愿丞相一百二十岁！”苏东坡尊重民风，随风入俗，不但喜爱养鸽放飞，就是制作的鸽笼也与众不同。一般鸽笼都是用竹、木、皮革制造，而他的鸽笼则镶金，做工精细，并且以养鸽放飞为题材，写了很多诗词，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他在《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写道：

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

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

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在这首诗歌的篇末，东坡还自注谓：“苏当生日，杭人为之放鸽。”鸽子，古称飞奴、青鸟、珍禽、雪衣、雪衣女、插羽佳人等，诸如此类称谓颇多。苏东坡把鸽子称为“雪衣”，呼之为青鸟，赞美信鸽纯洁、质朴的品格。前一、二联名句捕捉初春的景物：江南草长、花开、莺飞、燕入，组成有声有色、清新活泼的画面，别出心裁，由近及远，笔锋逆转，用“空落”、“未归”道出“事与愿违”的失望、惆怅、愤懑情愫。第三联写政坛风云，争名逐利，所以用了“何日是”、“几人非”六字形容。

这六个字，包含了丰富意蕴和情味。它使人联想到人世的悠悠岁月，官场生涯的沉浮、短暂与大自然的永恒，将前三联联贯起来。尾联照应全篇，点名题旨：“去年柳絮飞时节”，诗人在失望、烦恼之际，还“记得金笼放雪衣”，一咏三叹，一往情深，又使人感到苏轼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开始是观“莺乱飞”的惆怅、愤懑。尾联见柳絮飞舞，回忆起雪衣冲出金笼，翱翔青天的喜悦，心神俱往，创造出了高远的境界，也显示出他宽阔豪迈的胸怀。阳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绕梁徘徊，而一羽羽美丽的鸽子，鼓着它们雪白的翅膀，飞向广阔无垠的天空，翱翔着，愈飞愈高，它们的羽毛如银似雪一般耀眼，自由自在地飞入充满阳光而宁静的天庭去了。回忆起一羽羽白鸽的翱翔，他曾经的浮华与荣耀、烦恼与忧伤烟消云散。

“记得金笼放雪衣”，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诗人挣脱羁绊，对自由的向往与憧憬。随着视线的游弋，景物转换为“金笼雪衣”，诗人触发出了久滞于杭州、忘怀于江湖的思绪，苏轼飘然而去，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飞鸽生涯，他也真正把自己看作一个放飞者，即使风吹雨打，亦自守真性情。正是：

子瞻莅杭远离京，岁美人和易得情。
樽酒不空伴青鸟，学士遗踪冷泉亭。
放鸽竞翔与民乐，芒鞋拄杖步葛岭。
西湖长留东坡住，隔江相照雪衣明。

注：苏东坡贬官通判杭州，西湖山水的明媚风光让他留恋忘返。据说，灵隐寺的冷泉亭，葛岭的奇雨轩都是他经常办公或放鸽驯飞的地方。

2010年10月15日

（重庆市大足县龙岗镇）

（上接第51页）

一勺之水于兹屯，一卷之石于焉尊。
石之佳者岂斗色，皎洁欲谢尘埃昏。
遥知得此等和壁，当时醉客填园门。
痴人李牛公弗取，盖今后世销吟魂。
几曾坡嗜并未癖，仇池难割苍崖痕。
相如家山在灵录，较此或富波涛痕。
自从丽翰成古调，徒今二石相同论。
荒林下马土没迹，汲泉爱看珠跳盆。
物因人寿理则然，正如鲁殿灵老存。

乾隆十一年，乾隆过定州时，为新得“后雪浪石”题写《御制雪浪石记》。于敏中敬书于图的左下方。

乾隆五十七年，巡幸过定州时题写《御制雪浪石记》，对“后雪浪石”上的“雪浪”二字作了评论，由董诰敬书于图的中部左侧。乾隆皇帝一生颇爱此画，在这幅画中还留有他的“三希堂精鉴玺”、“乾隆鉴赏”、“石渠定鉴”等印文十余方。

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嘉庆帝驻蹕定州时，御制了《雪浪石赞》，“两间秀灵，蕴成奇石，浪花叠青，雪花漾白。体洁贞坚，纹浮润泽，盆刻芙蓉，永年留迹。宋代明臣，事著史策，历几沧桑，存此完璧。瑶阙流辉，明河贯脉，娲皇铄馀，下土弃掷。显晦因时，行斋题额，感锡生云，二敷甘夜。从来置前，高逾寻尺，真幻漫论，稽古有获。”书于图之上方。

张若靄所绘《雪浪石图》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写实与夸张手法兼而有之，表现出了云雾缭绕的意境美，乾隆皇帝曾以“雪自天上降，浪从海面生”赞誉此图。此外乾隆皇帝在定州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吟咏雪浪石的诗句占了很大篇幅，后人将这些诗句镌刻于碑上。随着岁月的流逝，众春园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石碑也多有毁损，至今在定州市博物馆、中山汉墓石刻馆内仍保留着十余通乾隆御碑。在探访品味之余，我们不仅体味出一代文豪的豪迈与坦荡，更能深刻感悟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绵延悠长。

（河北省定州市文物保管所）



（定州市众春园内雪浪石）

悼亡沉痛 爱情深挚

——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赏析

夏承焘

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他梦亡妻的词。“乙卯”是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这时四十岁，在山东密州作太守。他的妻子王弗，在宋英宗治平二年死于开封，至此首尾十一年（见《苏东坡集·亡妻墓志铭》）。全词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第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合生者、死者两边说的，自从妻子死后，十年来，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两无消息。“不思量”以下四句，是生者想念死者。这看去是很平淡的六个字，实是蕴含着深挚的感情，这确实是经久不忘的夫妇感情。如果说天天在思量，反而不真实了。王氏归葬于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也见《亡妻墓志铭》），所以下面说“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妻子的坟远在千里之外，连到坟上诉说自己凄凉的心境也不可能。“纵使相逢”以下三句，又合生者、死者两边说：生前相聚，既不可能；那么今后的“相逢”更是空想。“尘满面，鬓如霜”二句，想到自己仕途奔波，风尘仆仆，头发白了，人也老了，纵使夫妻有重逢之日，怕她也不认识自己了。这样左思右想，三四层意思折叠下来，逼出一个梦来。

上片写致梦的原因，下片直接写梦。“夜来幽梦忽还乡”以下四句写梦境很真实，既清楚，又带些朦胧。结尾，“料得年年肠断处”三句，是写梦醒后思索之情，是生者为死者设想之辞，为梦中原

来不了解的“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两句作解释。梦醒后想：她为什么伤心落泪呢？想必是在那故乡的短松岗上，孤坟一座，月明之夜，倍感凄凉吧？那就是她年年肠断的地方，那就是她“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原因吧？这里也和“千里孤坟”两句相呼应。整首结构相当严密，上片八句写梦前，下片前五句是梦中，末了三句是梦后。

这首词用白描的手法，语言自然，不加雕琢。“纵使相逢应不识”三句最沉痛，这里既有对死去的妻子的怀念，也有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慨。苏轼有与其弟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就是翻用这个意思。

《江城子》这个调，全首用平声韵；而三、四、五、七言的句子错综地间用、迭用，音韵谐协而又起伏不平；宜于写平和而又复杂的情感。苏轼选用这个调子写悼亡之作，能够表达旧体诗所难以表达的感情。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苏轼的《密州出猎》词，也用《江城子》这个调，而所表达的情感完全不同。同一调子可以表达不同的声情，问题在于作者如何运用而已。

晚唐、北宋人的词，几乎篇篇写妇女，而且多半以谑浪游戏笔墨出之。真正把妇女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尊重她，并且写出她的品格，这样的词并不多见。苏轼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一首，写出女子高品，“颇欲与少陵（杜甫）佳人一篇互证”（谭献语）。而这篇《江城子》悼亡词，写夫妇真挚爱情，也可与杜甫的“今夜鄜州月”五律诗比美。

（选自夏承焘著《唐宋词欣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6页；作者：已故杭州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前期顾问）

不思量，自难忘

——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赏析

唐玲玲

苏轼十九岁时，娶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王弗至二十七岁时，卒于京师，《东坡集》卷三十九《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记载了王弗生前与苏轼一起生活的情况：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即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

这样一位“敏而静”的贤内助，一旦永别，苏轼悲怆之情自然难以抑制。到了熙宁八年乙卯（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因记梦写下《江城子》

一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悼念妻子王弗，虽然十年时间过去了，但他对王弗还是一往情深，怀念的哀思仍是深挚。这首词运用白描的手法，细密真切抒写梦中及梦醒后的实情。起句写十年里人世间沧桑变化，“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一笔，道出心灵深处的凄怆，十年来政治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东奔西荡，使他不由写出“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的场面。接着以“夜来幽梦忽还乡”句进入梦境，苏轼选取与妻子生前的闺房生活的细节“小轩窗，正梳妆”表现亲密幸福的时刻，更衬托“无处话凄凉”的悲伤，因而涌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千行泪。在无言中默默地倾诉十年的痛苦，而蓦然之间，梦醒了，“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词中以明月照射短松岗的凄凉意境，抒写对亡妻的哀思。苏轼以生前朴实的生活片段，明白如话的语言，构写了长长十年的情思。

在众多的词集中，表现对亡妻思念的悼亡词，应该说这还是第一首。《花间集》中张泌的《浣溪沙》（枕障熏炉隔绣帷）^①一首，是写对死去姬妾的悼念，所表达的感情也不能与这首《江城子》相较。在苏轼以前，倒是有一些诗人写过感人肺腑的悼亡诗，如晋太康时代诗人潘岳的《悼亡

诗》：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亡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龟勉恭朝命，回心返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帟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周遑忉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尤可击。

又如唐代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
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
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
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
贫贱夫妻百事哀。

唐代李商隐的悼亡诗《正月崇让宅》：

密锁重关掩绿苔，
廊深阁迥此徘徊。
先知风起月含晕，
尚自露寒花未开。
蝙拂帘旌终展转，
鼠翻窗网小惊猜。
背灯独共馀香语，
不觉犹歌《起夜来》。

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比起前代诗人的悼亡诗，有共通之处，又具有词的独特风格。过去这些悼亡诗，即哀念死者，也为自己的坎坷遭遇而悲伤；李商隐的又一首悼亡诗《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因

悼亡日近不去，因寄》中云：“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在悼亡中又抒发伤时情绪。苏轼的悼亡词也是一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既是悼亡，也是伤时，为自己十年的波折而哀伤。“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既为死者而悲，也为生者悲戚不已。所以词中说的“无处话凄凉”，这凄凉的境遇，既写千里孤坟的凄凉，也写人世间遭遇的辛酸，把哀思与自叹融成一体，哀婉欲绝，表现了他的深挚感情。这首悼亡词，写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读之催人泪下。

注释：

①张泌的《浣溪沙》：“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两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词解：昔日的枕头与熏炉依然隔着绣帷，两年来日夜思念逝去的爱人，庭中的杏花与天上的明月都应知道他这痴情的相思。天上人间，不知该去何处把她寻找，只有在梦里才能与她相见。旧日的种种欢情又出现在新近的梦中，然而梦醒之时，却只见画帘低重，黄昏时分正飘着霏霏细雨。梦中的欢乐与醒后的孤寂清冷相对照，更让人觉得凄凉悲苦。——《花间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44页。

（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节选自唐玲玲著《东坡乐府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1-74页。）

苏词研究的新探索

——《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评论

潘殊闲

苏词研究是近世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苏轼以其创作，提高了词的地位，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和社会作用。举凡议军论政、记事抒怀、民间疾苦、身世友情、山水风光、田园生活、咏史怀古、说理谈玄，什么都可以在词中表现。诚如清人刘熙载所言：“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①内容如此博大，而风格又复多样，极豪放雄健之致而无叫嚣，极深婉缠绵之思而不细碎。这样词风深刻影响周围的一批作家，以后流播南宋和金元，沾溉直至近代。

对苏轼词集的编刻整理，前人甚为重视。今存苏轼词集版本二十余种，可大致划分为三大系统，而在流传中又存在互相汲取、交错渗入的情况。其一，为成书于南宋绍兴初之傅干《注坡词》。其二，为南宋曾慥辑《东坡先生长短句》，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原书不存，其钞本流传为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中之《东坡词》，再衍为天一阁钞本《唐宋名贤百家词》中之《东坡长短句》与紫芝漫钞本《宋元名家词》中之《东坡词》。明人茅维所编《苏东坡全集》中之《东坡词》，焦竑所编《苏长公二妙集》中之《东坡诗余》，均系据曾慥本改编。明人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中之《东坡词》，又是在茅、焦二家基础上增补删改而成。近代唐圭璋编《全宋词》，其中苏轼词即主要取据于此系统。其三，为元延祐七年（1320）叶曾云间南阜书堂所刻之《东坡乐府》二卷。此为今存苏轼词集之最早刻本。据原序知其曾以傅干本和曾慥本参校并有增订。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东坡乐府》即据此本翻刻。朱祖谋创始编年之《东坡乐府》，即以四印斋刻本为底本，而用毛本参校。龙榆生《东坡

乐府笺》即在承袭朱本校注编年和参取傅本注文基础上再加扩展而成。就以上三大系统之流传繁衍关系看，龙笺本在它出现之时，确为唯一的一部东坡词编年笺注本，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

最近，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的《苏轼词集校注》即以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第1版）为底本，在参考传世苏词各重要版本和近期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苏轼词集作校勘、注释、编年、集评、辨疑等文献整理工作，在各个领域均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意象词旨的深微探析

该书每首词的第一条注释，在编年考订、本事说明、背景交代之后，对全篇思想情感、内容和词艺特殊风貌均作出简要提示，尽可能地向读者表明，这首词究竟在说什么。

词是心灵的歌唱、精神的舞蹈，通过“声”和“画”展现出来的是“心”。《蕙风词话》卷五云：“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②刘永济先生《词论》绎解此言时说：“盖研诵文艺，其道有三：一曰通其感情；二曰会其理趣；三曰证其本事。三事之中，感情理趣，可由其词会通，惟本事以世远时移，传闻多失，不易得知。然苟察其所处何世，所友何人，所读何书，所为何事，再涵泳其言，而言外之旨，亦不难见。此学者所当知者一也。至作者当性灵流露之时，初亦未暇措意其词果将寄托何事，特其身世之感，深入性灵，虽自写性灵，无所寄托，而平日身世之感即存于性灵之中，同时流露于不自觉，故曰‘即性灵，即寄托’也。学者必深明此理，而后作者之

词虽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自能由其性灵兼得其寄托，而此所寄托，即其言外之幽旨也，特非发于有意耳。此又学者所当知者二也。”③

该书在解读苏词时，处处谨慎地贯穿这一精神，因而能在历来被视为疑难的问题上提出自己新的探索。

如极有名的苏词《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
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
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此词傅注本存目阙词。元本无题。吴讷钞本、《二妙集》本、茅维《苏东坡全集》本、毛本题作《春景》。龙笺本列卷三，未编年。该书在第一条注释中即对其意象词旨作了详细论证：案关于此词情事，说法较多，然皆难以圆满通释。就苏轼一生情绪变化的特殊性考察，这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受最集中突出的当是在定州罢任遭贬之时。元祐八年（1093）九月三日，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一批打着“继述”旗号的新党人物上台，对于元祐人士，一律进行打击。九月下旬，苏轼赴定州知州任，按宋朝旧例，当上殿面辞，而哲宗降旨不允见而促其行。此后朝局迅速变化。到次年四月十二日改元“绍圣”。北宋后期的年号，就是当权者的政治口号，“绍圣”即绍述熙宁、元丰圣政之意，表明斗争以元祐党人失败告终。闰四月三日，苏轼即被加以“前掌制命语涉讥讪”的罪名，被免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职位，以左朝奉郎官阶，降职为英州知州。而在这之前，首宰吕大防于三月四日贬知颍昌府，两天后又改知永兴军。参知政事（副宰相）苏辙于三月二十六日贬知汝州。四月中旬，侍讲学士范祖禹出知陕州。紧接着另一宰相范纯仁出知颍昌府。到闰四月十三日礼部侍郎孔武仲出知宣州，四月十四日工部尚书李之纯出知单州。苏轼此词就写于这批元祐人士纷纷赶出朝堂的初夏时节。所以这首伤春的小词绝非泛泛之作，而是他此时此地沉痛心情的抒发。上片写伤春，花残杏小，燕子翩飞，柳绵快吹尽，芳草遍天涯。在这春残景象中透出无限伤痛情绪，而其中寓托着的正是对朝局变换、元祐人士遭遇的感叹。所谓“枝上柳绵吹又少”，就是上文所说的元祐诸人陆续遭贬，驱除殆尽的独特象喻。“天涯何处无芳草”既用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

萋萋”之意，感叹诸同人普遍被谪外地，同时芳草就是楚辞“美人香草”的香草，喻正人君子，而今都远窜天涯。下片写墙外行人和墙里佳人的“多情”和“无情”、“笑”和“恼”的对比，将生活中可能有的常见情事作了哲理性的升华，从而寓托此时此地内心的复杂感受。“多情却被无情恼”，正是他多年来对宋王朝一片忠心而却遭贬岭南的最恰当写照。他在赴定州时上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反反复复、翻来复去地说了许多话，中心就是“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皇上“降旨拒臣，不令上殿”，使我“不得一面天颜而去”，但我决“不敢以不得对之故”而不“少效愚忠”。这就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具体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最切身最深刻的体验。全词写景写事，鲜明如画，语言优美，情感浓郁，比兴神妙，风调缠绵。寄托在有意无意之间，更增其妍丽与醇厚。

根据对此词意象词旨的上述绎解，该书系此词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苏轼时罢定州责知英州，启程南下，作于途中，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该书中类此研究处很多。仅就以上一例可知，深微地探索苏词的意象词旨，是该书的一个特色。

二、编年本事的精细考订

苏词编年，始于朱祖谋。其所据为南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及清人王文诰《苏诗总案》。朱氏在《凡例》中说：“合此三家，证以题注，参酌审定，大凡可考者十之六七。”龙榆生笺本承之，略有调整。近年来学术界对苏词编年研究颇多，成果卓著。然自朱本以来，已编的时有新说更动，未编的在陆续编定中越往后困难越大。《文心雕龙·序志》云：“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④该书遵此精神，通考全集，广参史乘，在前贤时彦已有成果基础上对苏词编年再作考校。在每首词的第一条注释中，即先提出编年结论意见，继即叙述理由加以论证。对限于资料，未能明辨者，亦不强为臆断。

该书将确认为苏作的词315首（组词作1首计算）进行全面考校，能编年的261首，未能编年的54首。其中许多是经过仔细研究而增广编定的。如苏词《渔家傲》：

临水纵横回晚鞚，归来转觉情怀动。梅笛

烟中闻几弄，秋阴重，西山雪淡云凝冻。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腰跨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

此词龙笺本列卷三，未编年。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列卷三（未编年词）中有校语云：“傅注本、元本俱无。此词不似东坡作。闲得无聊，骑马散心，用‘舞雪狂歌’下酒，东坡没有这种富贵悠闲的生活。词末蔑视富贵而不说明理由，只是歌颂醉生梦死的享乐，看不出有苏轼的胸襟。‘雪淡云凝冻’与‘秋阴重’相抵牾，苏轼不会出这种错误。姑因毛本收了它，留以存疑。”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注》列在卷三（入翰林后之什）中，有《校记》云：“按词意，似应作于守颍州时，故编辛未九、十月间，以俟更考。”

该书在此词的第一条注释中却是这样来论其编年的：作于元祐八年（1093）九月中、下旬，时在将赴定州前。案此词所写地域与定州合（“西山雪淡云凝冻”的“西山”就在定州）；所写官职与知定州身份合（苏轼元祐八年十一月在定州作《祭韩忠献公文》中自署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九年四月十六日所作《北岳祈雨祝文》中所署完全相同。这与知杭、知颍时区别显然。简言之，知杭时带“浙西路兵马铃辖”，但无赐紫金鱼袋，故不能说“腰跨金鱼旌旆拥”。知颍时，已“赐紫金鱼袋”，但未带兵马铃辖，故也不可能那样说。只有到定州，既赐紫金鱼袋，又带安抚使和马步军都总管，所谓“开幕府在中山”，是一路帅臣，才能说自己是“腰跨金鱼旌旆拥”）；所抒情绪与赴定州前心态合（元祐八年五月，有董敦逸四状攻苏辙，黄庆基三状攻苏轼事，赖有吕大防为之辩解，宫中有太皇太后高氏支持，对方恶毒目的暂未得逞。六月廿六日，朝廷同意其外补请求，除知定州。八月一日，妻王闰之卒。八月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有疾，朝中两派处于紧张状态。九月初三，太皇太后高氏卒，哲宗亲政。朝政迅速变化，苏轼赴定州前要求面辞而哲宗不允。事情还要你做，但并不信任你，下一步如何收拾你，还是未知数。苏轼内心难受，可想而知，所以说：“腰跨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这局面许多人都看到，陈师道于此来诗送行，劝其静退，也就是这个原因）；所写时间与赴定州前夕合（苏轼是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所，

其出都时间据《朝辞赴定州论事状》明言是九月二十七日。所以，如果这首词是作于到定州后，则词中“秋阴重”一语无法理解。既言“秋阴重”，必得是在九月三十日以前。临行前有友朋送别等人事交往。“临水纵横回晚鞚，归来转觉情怀动”，是应友人送别游宴之后回家有所感触。“梅笛烟中闻几弄？秋阴重，西山雪淡云凝冻”，是言时光流逝，《梅花落》的笛曲才听几遍，又是夏去秋来，甚至秋天也快完了，秋阴中将要去的定州，正是那冻云薄雪笼罩定州西山啊。故知其必为将赴定州前在开封之作。陈师道《后山集》卷六有《寄送定州苏尚书》一诗为苏轼送行：“初闻简策侍前旒，又见衣冠送作州。北府时清惟可饮，西山气爽更宜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无违具一舟。枉读平生三万卷，貂禅当复自兜鍪。”陈师道诗中“西山”，即苏轼词中“西山雪淡云凝冻”的“西山”。此西山在定州。苏轼在定州所作《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其一）云：“臣窃见西山之下，定、保之间，山开川平，无陂塘之险。澶渊之役，虜自是入寇。”苏轼赴定前，其处境与心态极为复杂。元祐八年五月，黄庆基三上状攻击苏轼，语极险恶，赖吕大防为之辩解，更赖太皇太后高氏不听那些谗言，但朝廷也要苏轼自己上一道《辨黄庆基弹劾札子》说清问题。六月八日，苏轼即请知越州，诏不允。六月二十六日，朝廷同意其补外，除知定州，可见其在朝堂无法容身之状况。七月，苏轼再乞改知越州，诏不允。八月一日，其妻王闰之卒。八月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有疾，朝局紧张。九月初三，高氏薨，哲宗亲政，一切发生迅猛变化。苏轼赴定州要求面辞，而哲宗根本不愿意见他。苏轼是无奈才在九月二十七出国门离开开封的。这首词即在此前数日于友朋送行活动中有感于陈师道来诗劝勉静退而发，抒写了此时面对现实困境的复杂感受。

这样翔实的考论编年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词语注释的准确追寻

词，作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传导功能全靠词语。解读词语是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实质上，对意象词旨对探索，对编年本事对考订，均依赖于对词中所用语言的准确解读。

该书以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为底本。注释中，凡底本笺释之不误者，原则上全部保留。其误者，改正之；其略者，补详之；其漏者，增注之。凡采用前贤时彦之独创性论证，皆详载来源。凡异于他

人之说处，则唯述己意。

这里略举数例，以见其词语注释准确追求之一斑。

苏轼词《定风波》开头两句：“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这“琢玉郎”何意？傅注：“言其美姿容如玉也。”以下各家都这样解释，近世学界，似无异议。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望文生义。该书载释此词语时，引出苏诗《次韵王巩独眠》中句子：“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馆孤眠体生粟。谁能相思琢白玉，服药千朝偿一宿。”诗集王注指出东坡此用卢仝诗（案见卢仝《与马异结交诗》）：“白玉璞里琢出相思心，黄金矿里铸出相思泪。”施注引《神仙传》：“彭祖曰：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综合这些材料，可知“琢玉郎”深含戏谑王巩之意，“琢玉”有特殊含义。

有时候，对一个字的理解歧异，会导致对整首词的理解偏差。如苏轼在黄州所作组词《浣溪沙》五首，其第五首上片：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这里“不记苏”的人是谁？清杨守敬《景苏园帖》收此组词墨迹，“不记苏”句后有苏轼自注：“公田在苏州，今年风潮荡尽。”那么，这个“公”指的是谁呢？有的著作理解为指苏轼。该书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同组词中，其第二首“睡梦昏昏晓未苏，门前轳辘使君车”句下墨迹有自注云：“公见访时，方醉睡未起。”其第三首“荐士已闻飞鸞表”句下墨迹有自注云：“公近荐仆于朝。”该书认为墨迹中自注的这三个“公”字皆当为指同一人，那就是太守徐君猷而不是苏轼。因此，“万顷风涛不记苏”的人是徐君猷。徐君猷有田在苏州，今年海潮为灾，全无收成，但他并不记在心上，相反，看到黄州雪兆丰年，雪晴后麦苗长势好，未来必获丰收，老百姓将有饱饭吃，自己的忧愁就消失了。这里是写徐君猷作为一个好官的精神状态，当然也是东坡自己思想感情的折射。又关于这组词的作年，傅注本在词序后有“时元丰五年也”六字，诸本皆无。傅藻、王文诰皆认定作于元丰四年。该书为此补充一条证明其作于元丰四年的材料。苏轼《书游垂虹亭》云：“吾昔自杭移守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吾过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今七年尔，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

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也。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黄州临皋书。”垂虹亭在今江苏省吴县东垂虹桥上，离苏州只有十多公里。故知荡平垂虹亭与荡尽徐君猷苏州田地收成的是同一次风潮，即元丰四年七月九日平地丈余的大风海潮。因此，本组词作于元丰四年的十二月是完全肯定的。

苏轼词用语精妙而自然，普通字面下往往深藏信息，不下功夫研究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如《浣溪沙》：

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画楼南畔夕阳和。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

这首词写于何时何地？文本中乍一看来似无信息。傅注本、元本皆无题。吴讷钞本、《二妙集》本、毛本调名下题作“荷花”。龙笈本列卷三，未编年。关于此词写作地点与写作时间的信息，其实就藏在第一句的描述中。该书此词下第一条注释指出：案苏轼《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一笑之乐。夜归，被酒不能寐，戏作放鱼一首》查注：“《名胜志》：颍州西二里有湖，袤十里，广二里，翳然林木，为一邦之胜。欧阳公自扬移汝，有‘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之句，秦少游亦有诗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苏轼在颍州所作之《木兰花令》有云：“万家游赏上春台，十里神仙迷海岛。”本词中“四面垂杨十里荷”之句，惟与颍州西湖景况相契合。词中说“天气乍凉”，与到颍州时令合。欧阳修有写颍州西湖的《采桑子》十首，本词用语，多与相应。就此数端看，此词当作于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初到颍州时。像这样通过细析词语，挖掘信息，从内证把握词旨与确定系年，也是该书的一个特色。

论文注释：

①（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8页。

②况周颐《蕙风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页。

③刘永济《词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④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友胜教授的治学与成就

向二香 吴春秋

我们对王友胜师的最初印象，是源于师友与同学的传说，因为他身兼数职：图书馆馆长、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古代文学硕士点负责人、省级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又是我校中文系的第一个文学博士。两年前我们有幸成为他的研究生，入门的第一堂课上，他并未辨章学术，而是先传授给我们治学的态度与方法，于后学印象最深的是其引用《沧浪诗话》中“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八个字，指导我们治学要入正门，切忌走旁道，立志要高远，只有求其上，方能得其中。他还说：“对学术目标的追求要高标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要低标准。”为印证其说，王老师特意复印《朱东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所附《朱东润先生年表》（朱邦薇、吴格合编）让我们阅读，并写读后感，以领会一个真正学者所应有的学术精神。对于古代文学才初窥藩篱，并未登堂入室的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更多，但也由此明白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非一时之功”的道理。现在我们跟随其学习已经两年，对老师的为人及学问有了更深的了解，此文不妨细说一二，与学界同道分享。

一、东坡耕未已，苏海钓无涯

苏轼以其杰出的天才与多样的文化成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苏学爱好者。苏学研究专家不断涌现，王老师即是众多苏学研究者中的一位。无论是在科研、教学，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王老师都酷爱苏轼，始终保持一种浓厚的“苏轼情结”。

1996年3月，王老师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海内外著名宋代文学研究专家王水照教授。第二年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时，他义无反顾地选

择“苏诗研究史稿”为题进行研究，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苏轼研究。该文经过反复修改、增补、完善，1998年12月提交答辩，2000年5月，以同题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从文艺学、文献学及学术史等多角度切入，可谓一本全面描述与论析历代苏诗研究的学术专著，它不仅对存世的有关苏诗研究史料做出详尽的辑录、认真的考辨和准确的阐释，对其中一些重要的著作，如历代有关苏轼的年谱、传记，有关苏诗的选录、评点、注释和研究著作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对历代苏诗研究者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及文学观念作了初步探讨与总结。王水照先生为作序，认为该书“对建立并进一步完善本学科的体系与规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为今后更全面、更深入的苏轼接受史的诞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该书虽不是王老师的处女作，却是他的成名作，《中国图书评论》、《中国韵文学刊》、《古籍研究》等刊先后有九篇书评对其评介，《文学遗产》、《古籍新书报》等刊载有书讯，《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及韩国《东亚人文学》、日本《橄榄》、加拿大《文化中国》等刊均摘要发表相关章节，并于2002年12月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该书还获得200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课题鉴定意见书》中认为“本成果实际上具有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严密的规范之中时现创新思维的闪光点”，“不但可供专业研究者参考，而且可供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学术史之用”。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认为本课题“是一项有开创性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不仅将苏诗研究掘进了一大步，也为整个古

典文学的接受史、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苏诗研究史稿》出版后，王老师不仅得到国内苏轼研究同行专家的好评，在海外亦产生了一些影响，韩国、日本、英国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一些学者在看过此书后皆遥传尺素，一方面赞誉该书惠泽学林，另一方面则就相关问题与王老师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探讨；还有些学者一开始与王老师素昧平生，因其所在地区无法买到该书，便写信向王老师求购，王老师亦慷慨地把书送给他们，并由此结交成为文友。韩国岭南大学洪瑀钦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先后邀请王老师前往韩国参加学术会议，日本内山精也博士则请山口若菜女士将王老师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一文翻译成日语，在《橄榄》上发表，台湾张高评教授还多次推荐王老师的苏诗研究文章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推荐该书在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再版（虽因故而作罢，但张先生的雅意与高情值得称扬）。正因此书在海外颇有市场，韩国新星出版社于2002年3月将该书予以重版，改题《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32万字），使《史稿》有了海外传本。

勿庸讳言，无论是岳麓版还是韩国版因出版时间较早，书中难免出现疏漏与错误，兼之曾枣庄先生与数位海外学者合撰的《苏轼研究史》也已出版，故近十年来，王老师继续就苏诗接受与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反复对该书作修改与增补，这方面的成果除反映在业已发表的十余篇论文外，又集中体现在中华书局2010年8月再版的《苏诗研究史稿》（修订本）上。一书而有三个不同版本，既反映了该书具有学术生命力，也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精益求精的精神。

除开《苏诗研究史稿》，王老师研究苏轼的另一力作是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苏诗补注》。此为王老师2003年申报并立项的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苏诗补注》笺正”的最终成果。该书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影印之乾隆二十六年查开香雨斋刻本《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50卷）为工作底本，同时参校他书，对一些明显错误，且影响阅读的地方作了文字上的校勘，径予改正，未出校语。其它异文，只要不影响文意，则不作改动，以存原貌。第二，原本诗题及

诗中原有的校语则予保留，并专设校记一栏。第三，原本卷首所附《宋孝宗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等材料均予保留，依古籍整理著作惯例，将《东坡先生年表》、《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采辑书目》与《续采书目》移于书末。第四，原本所附唱和诗及考辨性按语，均予保留，并补充注明了唱和诗在原集的卷次，以便读者查对。第五，对全书作了新式标点，采用繁体横排，便于今人阅读。查注中有些引文仅撮述大意，则未加引号，也未核对原文。第六，卷四七～四八遗诗、补编诗，卷四九～五十它集互现诗，原本无注释，为使全书体例统一，作了适当的补注。其它各卷则仅保留查氏的原注，原本中苏轼的自注，也予以保留。第七，原本查注与苏轼自注夹杂在正文中，且为双行小字，难于辨认，此次整理则全部移于诗后，并予标注，以求醒豁。第八，据原本所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采辑书目》及《续采书目》，查注所引古书凡632部，实际所引书恐怕还不只此数，查氏引征这些古书时多用简称，且多不注明作者及卷次，为省篇幅，作者整理时仅对一些不常见的书改用全称，补充作者。第九，全书增补两万余字的前言，详细论述查氏校、注以及按语的学术价值与局限，对其在苏诗辑佚、辨伪、编年等方面的成就作了深入分析。此部分内容经删改后，以《〈苏诗补注〉的文献诠释与历史价值》为题在《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第十，书末附该书篇目笔画索引，极便利读者检索。

王老师研究苏轼最大的特点是不喜欢赶时髦、逐浪潮，而是独辟蹊径，得风气之先。《苏诗研究史稿》在国内最早地从接受史的角度研究宋代经典作家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多有可借鉴处，因而也受到了一些高校老师与学生的关注与喜爱，有的导师将此列为其博士生必阅的参考书，台湾成功大学张高评教授则将该书列入《宋代文学专题研究参考书目》，有的博士论文选题则是“苏诗研究史”的延伸与拓展，如“苏词接受史稿”、“苏词接受史研究”、“明代苏文研究史稿”、“历代苏轼诗注研究”等。武汉大学刘学博士的《2002—2003年内地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定量分析》一文对此作了充分肯定，认为“作为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新锐，他的治学路数值得借鉴。”又如在清代的几本苏诗注释著作中，一般人多看好王文诰编撰的《苏诗编注集成》，中

华书局1982年整理苏轼诗集时,即以此为底稿。而王老师所撰论文《冯应榴与〈苏文忠诗合注〉》指出清代冯应榴所撰《苏文忠诗合注》的学术成就远高于历来颇受称誉的王文诰所撰《苏诗编注集成》,该文以其观点新颖,在《文学遗产》2000年2期上发表后,不少刊物转载,并获湘潭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的《苏轼诗集合注》时,责任编辑丁如明先生即热情邀请王老师撰写出版推荐意见书。

近几年来,王老师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即从先前纵向的接受史研究转向横向的文化学研究,他决心用十年时间完成“苏轼与宋代文化”的大课题,力求拓展苏轼研究的新领域,向世人展示一个多元、立体的苏轼形象。迄今为止,他已完成了《苏轼的科技活动与科普文学创作》等系列论文的写作,而且还指导与此相关的多篇硕士学位论文及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如“苏轼园林文学研究”、“苏轼音乐诗研究”、“苏轼诗与养生文化研究”、“苏轼涉梦诗词研究”等等。他还曾在校内外多次作“苏轼的文化价值与学术魅力”等学术报告,旨在从文学化的角度来引导他人重新审视和认识苏轼,努力为大家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丰满的苏轼,而不仅仅是前此以文学家、政治家身份为人所熟知的苏轼。王老师已经用敏锐的学术思想为学界奉献了较多苏学研究的扎实成果,他还将继续在“苏海”中航行,可谓“东坡耕未已,苏海钓无涯。”

王老师在多年研究苏轼的学术生涯中,不知不觉滋生了一种苏轼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比如王老师的新居“听雨轩”,有个近二百平方米的私家花园,他雅称其名为“苏园”。王老师效苏轼耕种于黄州东坡,亲自在园中植草栽树,凡苏轼作品中出现过的海棠等二十多种常见花草树木,皆予栽种,每日游览苏园,吟诵苏诗,乐在其中矣。

二、沐唐风宋韵,研诗词义理

王老师治学的又一个特点是研究视域颇广,但广而不滥,深而不涩。二十余年来,其研究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苏轼,还涉及到作家别集整理、唐宋诗词及民国学术史等方面。王老师开始学术研究是从唐代文学,尤其是从李白起步的。他1989年至

1992年在安徽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程自信、徐定祥二教授,硕士学位论文即为《李白歌诗中的神仙世界》,毕业答辩时唐诗研究大家刘学锴教授曾予以高度评价。此文分七篇先后发表在《中国道教》、《中国李白研究》等刊上,后又集中收入《唐宋诗史论》一书中。中国李白研究会前会长郁贤皓教授、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明非教授由此推荐王老师为《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李白研究”的专栏作者。作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王老师还举办过“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暨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研究生毕业后,王老师先在常德师专教学两年,1994年被著名唐诗研究专家陶敏教授引荐到湘潭师范学院古文献研究室工作。他与陶敏先生合作整理的《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后,日本《中唐文学会报》等刊有文评介,1999年获得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中华书局2005年还出版了他们合注的《韦应物诗选》。他与李德辉博士合作完成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李贺集(校注汇评)》,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后,《古籍整理出版研究情况简报》(第398期)、《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均有文评介。除此之外,王老师还撰写了二十余篇唐诗研究论文,如《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李白道教活动考述》、《李贺诗歌艺术三论》、《李颀诗中人物形象简论》、《论〈樊川诗集注〉的成就与特点》、《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获》等,涉及的唐代诗人主要有沈佺期、李白、李颀、韦应物、李贺、杜牧、李商隐等,这些文章已被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唐宋诗史论》中。

王老师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后,研究重点转向宋代文学。除苏轼研究外,他主要从事宋诗总集、别集的研究,读书期间即发表了《清人编撰的三部宋诗总集述评》、《〈宋诗别裁集〉指瑕》等文。2007年王老师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与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历代宋诗总集研究”均获立项资助;2010年,他又以“清代宋诗选本研究”为题申报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亦获立项资助。其前期成果则有《论〈濂洛风雅〉的文学史意义》、《论〈宋诗精华录〉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五十年来钱钟书〈宋诗选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读〈诗家

鼎齋>札记》、《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论〈宋诗选注〉与〈宋诗三百首〉的异同及原因》、《论〈王荆公诗笺注〉的学术价值与局限》、《宋诗宋注名著四种叙录》等十余篇质量较高的论文。2010年10月,王老师受著名学者、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前会长傅璇琮先生之邀在清华大学参加“目录学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研讨会”,会后承担了宋代别集、总集的提要撰写任务,此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大项目。王老师还尝试做过一些词学普及工作,如独撰《唐宋词选注》(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宋词三百首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与人合撰《纳兰词注》(岳麓书社2005年)、《西风吹梦》(岳麓书社2002年)等。

在民国学术史方面,王老师的研究始于2004年在湖北大学做特聘教授时。他多次为该校及我校研究生开设“民国间经典学术著作导读”的选修课,并发表了数篇相关研究论文。王老师主著,与人合作编撰的《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绪论部分阐述了民国间38年的学术风气、学术流派及学术师承,探析该时期学术研究的基本走势、学术视域及学术著作的总特色等问题;主体部分重点对六十五部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名著作了题解,对作者的学术经历、学术精神、学术观念、学术渊源、学术见解、学术成就及学术方法等,对著作的编撰缘起、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基本内容、写作特点、学术创获与局限、学术地位与影响等皆有详细而深入地分析。此书得到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岳麓书社2010年出版,获湖南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三、聚专业图书,助学术研究

王老师撰写的学术论著,少言空话、大话,材料扎实,论从史出。他常引胡适致罗尔刚书信中“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治学格言教导我们:“一篇好的论文,往往不是通过一个大课题,来写一篇小文章,而是通过一个小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做出大文章。”为了学术研究,王老师嗜书如命,可谓十足的书迷。他半辈子的学术人生总是围绕“书”在转,买书、读书、教书、著书,甚至卖书。他说:“学术是我的生命,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研究者,治学的先决条件是建立自己的学术资料库,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更应如此。”关于王老师淘书、买书,师

友们口耳相传许多轶事,比如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每个周末都要去逛文庙、城隍庙及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淘旧书,有一次为了买清初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把返校的车费都花光了。又比如古人有爱妾换书、宝马换书,王老师则是棉被换书,他那套破旧的《辞源》就是二十几年前用一床棉被与人换来的。王老师将听雨轩的三楼与阁楼辟为书房,雅称“唐风宋韵书屋”,入得其室,但见墙壁四周均是“顶天立地”的书架,藏满了各类专业文献。爱书至此,唯吾师矣!

王老师藏书并非为藏书而藏,为装点门面而藏。他的藏书有两个标准:一是专、精,只收集那些学术含金量大的研究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二是成系统,并以唐宋文学研究方面的书为中心,大凡与此相关的学术史、目录学、哲学、史学、美学、语言、宗教、诗话、笔记等皆予以购藏。王老师对古代文献目录学颇熟,又身兼图书馆长之职,经常接触到全国甚至海外的图书出版信息,这使得经、史、子、集、丛五部之相关专业资料均能出现在他的书架上。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有联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王老师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上坐了二十余年的冷板凳,取得了较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他从不自矜,一直抱有“多闻阙疑”的态度,并将孔老夫子的这四个字悬挂在古代文学研究所的墙壁上,时刻自警与劝人。王老师是个大忙人,除了教学、科研、学术与行政管理外,他还曾在人大、政协及民主党派中有兼职,参加诸多社会活动。曾有人采访王老师,问身兼多职是否会影响其学术研究,他以曾国藩为例答之,表示搞行政虽会或多或少影响学术研究,但二者并不十分矛盾。曾国藩曾经评价其两个著名学生曰“李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一心著书”,其言下之意便是批评此二人不能兼顾“学”与“政”,但曾国藩本身确是政学俱佳的好例子。王老师常自我调侃,说自己既做不了曾国藩那么大的官,更没有他出经入史的大学问,但作为在曾氏故里工作的人文科学研究者,更愿以此自勉。我们衷心祝愿王老师身心顺遂,学术精进。

(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漫谈苏轼葬邳探因之旅

乔建功 王宪斌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探索苏轼葬邳原因进程中各个认知阶段的特征和影响，同时以翔实的资料着重论证了苏轼葬邳是无奈的选择这一新的论题，通过反思，汲取教训，启示真谛。

关键词：苏轼 葬邳 探因 进程 无奈选择

苏轼葬邳是苏轼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历来说不清的老话题，同时又是一个人人都想了解的新话题。尤其是近年旅游热，参观邳县三苏坟的游人大增，人们在拜谒游览一番之后，往往会问及苏东坡为何葬邳这个话题。人们怀念、崇拜苏东坡的感情愈深，急于弄清这个话题的心情就愈强烈。值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认真回顾梳理探索苏轼葬邳原因的漫漫旅程，弄清苏轼葬邳的真正原因，对于走近苏东坡，认识苏东坡，学习苏东坡，都不无裨益。本文试就自己近年的读书心得体会，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聊表后学的崇苏之心，同时也借此就教于方家师长。

漫漫探索路

苏东坡建中靖国元年（1101）病逝于常州顾塘桥，翌年安葬于汝州郟城上瑞里，至今已历九百余年。苏轼为何不惜辗转千里最终安葬于郟城一隅，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研究角度出发，按认知特征大致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330年开始为“练汝说”

据文献记载，探究苏轼葬邳原因始自元代。至顺元年（1330）郟县教谕孙友仁为“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撰写的碑阴记在谈到苏轼葬邳原因时说“方先生之治汝也，地有小峨眉之名。及卒于常州

也，得归葬故里，奈道途险阻终不获济，因卜厝于斯焉。”这里说苏东坡在汝州做官时，看到此地有小峨眉山。他在常州病逝后，本该归葬眉山故里，怎奈道途险阻不能实现，所以才安葬在这里。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不大，但这是最早的。

时隔二十二年，元至正壬辰（1352）三月，曹师可撰写的《三苏先生祠堂记》说“昔东坡先生由黄州而来，为汝之团练副使。墨相其风土于郡治之东约六十五里，乡曰钧台，里曰上瑞，有山曰峨眉，……观其形胜，适可为宅兆之佳地。……因病以书嘱弟子由曰：‘吾死后葬之于汝。’既卒，由是而安厝之。”此论对孙友仁的观点有所发展，说苏轼练汝期间，看中上瑞里的小峨眉，是莹兆之佳地。此说一出，历代地方史志多有所载。该碑现在在三苏园祠堂东厢房内，是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元碑。碑刻加史志，言之凿凿，给后世造成很大混乱。

时光推移到1479年，也就是明代成化年间，胡谧撰写的《重修三苏祠墓记》在谈到苏轼葬邳原因时说“盖文忠尝谪汝，爱其地有山形胜类其乡，遂有终焉之志。因号曰‘小峨眉山’。贻书仲氏文定曰：‘他日我死，贫不能归，其葬我于是。’”这里比曹师可的说法又美化了许多，更易被人接受。说苏轼之所以葬邳，是因为他练汝期间，看到这里的山水似其家乡峨眉，遂产生了将来安葬于此的想法。此地的山水风光为一代文豪大师倾慕，又作为归葬之地，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庶民百姓都无限荣光，当然都欣然认可。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之情，人皆有之！于是此论便不胫而走，风靡数百年，长盛不衰。以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国家级报刊、书籍仍沿袭此说。如1973年第7期《文物》上李绍连的《宋苏适墓志及其他》及其在1981年第1期《今古谈》的《苏轼、苏辙

乐葬河南小峨眉》，1983年第1期《历史知识》上陈显泗的《三苏为何葬河南》，1980年3月23日《河南日报》第一版《郑县“三苏坟”修缮一新》的消息，甚至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辞典·郑县·三苏坟》也说“苏轼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贬授汝州团练副使时，曾赞赏此处似其家乡峨眉山，因嘱其弟在他死后葬于此地”等等，不一而足。有关地方史志及大大小小的宣传材料，在谈到苏东坡时无不沿用此说。时至今日，此说仍是舆论主流，几成信史。

以上可以看出，苏轼葬郑的最初几百年间，人们一直认为苏轼在汝州任团练副使期间，曾到郑县选择墓地，所以权且称之为“练汝说”。

第二阶段，从1608年开始为“形胜说”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汝州知州刘谨文撰写的“重修三苏先生坟记”说，“盖邑志所载，长公团练汝州时，谋为永宅。及考宋史暨公年谱，俱谓移汝命下，辄于中途，乞常而去。即方学宪亦谓长公练汝官司多不载。岂传闻以来，误以汝阴为汝上，误以练黄为练汝，并误以卜兆为练汝时耶？意者，宋都汴，苏居蜀，往来汝郑间，爱其山而菟裘之，家人奉遗意安厝之耶。”这是第一次对“练汝说”的质疑，明确指出苏轼练汝根本就未到任，同时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是苏轼往来汝、郑间，看到这里的山水很美，有意在此隐居，后来家人遵其遗愿，把他安葬在这里。这种说法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可能这个声音有些微弱，向来被人漠视。此碑现在三苏坟院飨堂檐廊东。

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的东风吹遍祖国的大河南北，长城内外，一批责任心较强的苏学爱好者清醒地看到，苏轼练汝根本就未到任，无论曹师可之说，还是胡谧之论，全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何较为完满地解释苏轼葬郑之因，成了他们肩上沉甸甸的使命。

巍巍嵩山绵延纵横数百里，苏东坡一纸“即死，葬我嵩山下”，其弟苏辙就径直把他葬在郑城小峨眉，如果兄弟俩事先不亲临其地，指地为穴，苏辙能这样准确做到吗？那么，苏轼何时来过郑城小峨眉，何时在此选择墓地，就成了问题的症结。人们循着这条常规思路，苦思冥想，寻找证据，纷纷撰写论文，发表见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已故刘英照先生撰写的《苏轼为何葬在郑县小峨眉》。

文章认为，苏轼练汝虽未到任，但因郑县地处

许洛古道之要冲，据史料记载，苏轼一生经过许洛古道的机会会有五次。第一次进京赶考，第二次入川奔母丧，第三次凤翔赴任，第四次任满回朝，这四次都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壮年时期，不可能有选择墓地之举。第五次是绍圣元年闰四月，苏轼罢定州任，知英州（广东英德县）军州事。途中他曾携长子苏迈从陈留折道汝州，向时任汝州太守的弟弟苏辙筹措路费，并在汝州盘桓数日。如果选择墓地，只能是这一次。因为此时苏轼已近六旬，又在贬谪途中，心情沮丧，选择墓地正在情理之中。作者格物致知，令人不可不信。但当文章谈到苏轼如何选择墓地时就显得底气不足了，便演绎出一段苏辙送别兄长的传奇轶闻。说二苏登临道教圣地莲花山，站立山巅，北望嵩岳逶迤，南瞰汝水萦带，脚下两道山梁，东西对峙，状如峨眉，不由赞赏胜似家乡峨眉。作者自知其事没有文字依据，只能说这是情理中的事。同时又拉出了元丰七年苏轼自黄移汝途中，赴筠州与苏辙告别时写的《别子由三首兼别迟》的第二首（简称《别子由诗》）：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
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
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冰玉。
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

文章说，这就是苏轼赞美包括小峨眉山在内的嵩山一带山水，并打算在此隐居的明证，后来家人就遵“即死，葬我嵩山下”之命，把他安葬于此。

不难看出，此文比刘谨文的见解进一步具体形象化，在当时确属最新研究成果，曾轰动一时。该文先发表在《中州今古》杂志1984年第5期，后在第四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交流。此后就有不少人引用《别子由诗》，说明苏东坡赞美郑城小峨眉，着意在此隐居。此论虽显牵强，但这也是仅有一点新发现，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以上两种说法都明确提出苏轼练汝根本就未到任，他之所以葬郑，是因为路过这里看到山水秀美，“形胜类其乡”，故我们称之为“形胜说”。

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为“求是说”

苏东坡以善于为文著称，平生无意不可表达，无事不可入文，就连洗澡搓背这样的生活琐事都能写就一篇脍炙人口的美文，但选择墓地这样的大事，为何没留下蛛丝马迹？对郑城小峨眉怎么就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多少士人学子数百年来在茫茫“苏海”中苦苦寻觅，几近山穷水尽。难道说此路

不通？抑或另有蹊径？

果其不然，2002年纪念苏轼葬郑九百周年暨第十四次苏轼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县召开。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一篇王昊先生撰写的《苏轼葬郑之谜窥测》。该文首次提出苏轼葬郑源于苏辙致信兄长，商量为八郎妇黄氏选择墓地事宜，苏轼回信（即致子由第八简）表示“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钱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莫循俗也”。苏轼同意和八郎妇黄氏同用一块葬地，于是遂成苏轼葬郑之史实。另一篇是谢照明和潘民中二位先生合写的《郑县三苏坟相关问题辩证》。该文引用大量史实，说明小峨眉山名历来就有，并非苏轼所命名，苏轼也没有亲勘墓地，苏轼之所以葬郑，是他同意和八郎妇黄氏同用一块葬地。这两篇文章的问世，在苏轼葬郑探因领域里无异于石破天惊，别开洞天，掀开了实事求是、科学研究苏轼葬郑的新篇章。所以我们称之为“求是说”的开端。此时本应组织力量继续深入研讨，揭开苏轼葬郑的神秘面纱，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却就此搁浅。这两篇文章的影响面也仅局限于此次研讨会而已。本文意在旧话新提，聊作引玉之砖，发扬苏东坡实事求是、勇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把苏轼研究推向深入，再续新篇。

无奈的选择

大量史料表明，苏轼葬郑并非出其本意。他生前无论身为朝廷重臣，还是被贬海南天荒，心系梦绕的都是兄弟“夜雨对床”，终老归葬老翁泉下。早在治平四年（1067），32岁的苏东坡在眉山安葬嫡配夫人王弗时，就将坟墓“凿为二室，期于子同”，希望将来与亡妻“死能同穴”（《祭亡妻文》）。晚年，苏辙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得更明白，“先塋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从，夫其不怀？”看来在归葬问题上，父亲曾有遗言，兄弟也曾有约，他们的本意都非常想安葬在祖塋父母身旁。

苏东坡对汝州、郑城这块地方并不陌生。早年他西出巴蜀，东进汴京，至少曾五次路过，绍圣元年，还曾在汝州盘桓数日。应该说，他对这里的山水地理，人情风俗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元丰七年

（1084）三月，神宗手诏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时，他十分勉强，不愿前往。行前他在《别黄

州》诗中说：“长腰尚载撑肠米，阔领先裁盖瘿衣。”意思是说，黄州的“长腰米”还在腹中，因汝州流行大脖子病，我已预先准备好领子阔大的衣服。

同年八月，苏轼行至金陵会晤沈遼，在《送沈遼赴广南》一诗中说，“勾漏丹沙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意思是，你去广南可以得到传说中勾漏山的仙丹，我到汝州去，可能会患上大脖子病，并且像瓮盎一样大。

看来，苏轼对汝州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流行大脖子病。这种病医学上叫甲状腺肿，是缺碘引起的地方病，为贫穷落后的象征。患者的脖子粗胀肿大，有的赘瘤达五、六斤重，使人容貌变形，发音不清。望之令人生厌。直到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种病在当地还时有所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政府大力推行加碘食盐，此病才基本绝迹。

苏轼对这种大脖子病历来就很反感。嘉祐七年（1062），他在凤翔签判任上，在《怀子由》诗中劝慰没去商州赴任的苏辙说：“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内容是说，商州人说话像外国语，仅可通名姓，很多人生着大脖子病，不辨肩颈，这样的地方不去也罢。

这次，他在离黄来汝前给当地朋友王齐愈（文甫）的信中说得很明白：“蒙恩量移汝州，比（近来）欲乞依旧黄州住，细思罪大责轻，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数日念之，行计决矣。”（《与王文甫书》）宁愿仍旧住在荒僻的黄州，也不愿前往人地两生的汝州，为了不忍拂违神宗恩赐知遇的厚意，才勉强汝州之行。一路上他游山逛水，探亲访友，迤迳而行，姗姗来迟，行程将近一年也未到达。

也就是在这次赴汝州途中，于元丰七年五月，他绕道筠州探望被贬至此的弟弟苏辙，临别时写下了上述的《别子由诗》。诗中讲了对将要去的地方——汝州及附近地方的印象和将来生活的设想。如果说诗中含有准备在此隐居的意思，那么，时过五个月，在扬州和泗州两上《乞常州居住表》，坚辞恳请朝廷不愿前往汝州，一再申请要求居住常州，又该作何解释？

次年二月，苏轼在南都商丘，接恩诏获准常州居住，使他欣喜若狂。离开黄州时他曾作《满庭芳》一阕为别，此时则“蒙恩放归阳羨，复作一篇”。于是，马上调头而回，不到一月就来到常州。他在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写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放归阳羨，梦想成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晚年，从海南北归途中，蒙恩任便居住。弟弟苏辙致信苦苦相劝兄长，前去许昌比邻而居，但是苏轼慑于政治风云莫测，又一次选择了常州，并最终客死于此。

苏轼在两次人生的重大抉择时刻，均独钟情于常州宜兴，并均放弃了前往汝州、许昌中原居住的机会。苏东坡一生漂泊奔走，足迹几达半个中国，但每一处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唯有卜居宜兴才是他自主选择的结果。美丽富饶的吴越阳羨，“土如濡，米如珠”，山清水秀，极富诗情画意。他曾于熙宁七年和元丰八年两度在此置买田产。他在《楚颂帖》中感叹：“吾来阳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

苏东坡一生如此钟爱阳羨，最终又客死常州，为何不就近安葬于彼，却又专留遗言，不惜千里迢迢转葬于郟县一隅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绍圣年间的党祸纷争中，苏东坡先被贬岭南惠州，再流放海南儋州。苏辙也先贬筠州，又迁雷州，再徙循州（广东龙川）。在长达七年的贬谪流放生涯中，苏轼是由三子苏过相伴。苏辙则始终由三子苏远和儿媳黄氏（八郎妇黄氏）相陪，服侍照料自己和史夫人的起居生活。不幸的是，到达循州的第二年（元符二年，1099），八郎妇黄氏身染瘴毒不治而亡。对于八郎妇黄氏的死，苏辙深感悲痛，专为其撰写《祭八新妇黄氏文》。文中对儿媳为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颠沛千里备尝艰辛，以致不幸身亡的愧疚心情充满字里行间，并表示“犹冀灾厄有尽，天造有复，全柩北返，归安故土”，决心对八郎妇黄氏有个好的交代。

明年（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听政，元祐党人纷纷被量移或内迁。苏辙先移永州，再迁岳州，十一月接旨“提举凤翔府上清宫，外州军任便居住”。于是他就率领家人带着八郎妇黄氏的灵柩，千里迢迢，匆匆忙忙，在岁末赶至许昌。苏辙是个笃守信用的仁人君子。他回到许昌刚过罢春节，二月二十二日就给哥哥写信，一是劝兄长来许昌比邻而居，二是和哥哥商量安葬八郎妇黄氏的事。苏轼此时正在海南北归途中，行至真州时接到弟弟来信，时值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这时苏轼和表兄程德孺及钱世雄等人在金山

相聚，听到向太后去世后，朝中局势骤变。于是他立即复信，告诉弟弟决计不再北上赴许，而将南下常州居住。在谈到葬地时说，“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可也。更破十缗钱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莫循俗也。”

这段话是苏轼关于葬地事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之一。遗憾的是，苏辙的二月二十二日简早已散佚于历史的烟云之中，苏辙为八郎妇选择葬地如何讲述，已无从考查，但这也无碍大局。苏轼行文历来惜墨如金，言简意赅。他关于葬地的这段话同样如此。这是一句在特定前提条件下，富含逻辑推理的肯定式答复，个中蕴含着大量的信息。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到三个重要问题说得相当明白。

一、葬地有两块可供选择，一是自家已有的，一是需花十缗钱再买的。苏轼主张就用自家已有的，不要再花钱另买葬地了。这是本段话的主题。二、苏辙为八郎妇黄氏安排的葬地，也是老兄弟二人百年之后的最终归宿之地。因当时苏轼尚未染疾，兄弟二人都健康如常，所以，此葬地是苏辙拟将辟为苏氏家族之墓地。三、关于葬地之事，让弟弟单方决定，一切从简。

天有不测风云，苏轼五月复信，六月就病倒，七月便谢世，翌年即葬郟城上瑞里。从时间如此紧迫来看，郟城上瑞里处的葬地，就是第八简中兄弟二人所讨论的自家的田地（有关此事拙作在《苏轼研究》2008年第3期已有论述）。苏轼病危时，又“以书嘱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这仍是第八简中心疼弟弟，告诫不要另买葬地这一主题的重申。为省下十缗钱而没另买葬地，最终促成苏轼葬郟的史实。可以想见当年苏轼的丧事多么凄凉、低沉和无奈，那是在没有官府任何赞助情况下，纯属私家的丧事活动，苏东坡既没有亲勘墓地，更没有为小峨眉山命名，又是那样一任自然，天意巧合。正像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所说：“地虽郟鄏，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古人云，高深莫远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苏东坡葬郟小峨眉，天命也！

大量史实表明，常州宜兴仅是苏轼生前的理想居住之地，最终归葬郟县实为兄弟情义高于一切的注脚。苏轼平生本不重视身后葬地之类俗事，“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寥寥数字，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苏辙慢说选择郟县葬地，即使选择其它任何地方，兄长也会义无反顾地前往相

随。“夜雨对床”是弟兄二人的终生夙愿，生前难以实现，身后归葬一处也不失为幸事。只要不使弟兄一人孤单独处，埋葬在哪里都可以。正所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明代著名学者王尚炯（号苍谷，郟县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兵部主事，曾任山西、四川参政，浙江左布政使，有《苍谷集》十二卷行世）在浩瀚的苏学海洋中，独独采撷此联，配以横额“青山玉瘞”，于正德二年（1507）特意刻石立坊于三苏坟院，昭示苏轼葬郟之因。应该说，苍谷先生是读懂苏轼葬郟的第一人。可惜我辈后人冥顽不灵，却在世俗的圈子里团团打转，极力寻找苏轼葬郟的原因，演绎出了多少美妙的传说和神秘的遐想。

至此，不禁有人会问苏轼既能葬郟，何不直接归葬四川眉山呢？过去有人曾说，苏轼葬郟是因为经济窘迫，关山阻隔所致。仅此解释似乎偏颇。试想，如走水路，溯长江而上，至乐山再入玻璃江，可直抵眉山故里，岂不更便当一些！笔者认为，经济拮据是真，更重要的是政治形势险恶，使他们难以回蜀。

在熙宁变法以至绍圣年间的党祸纷争中，轼、辙兄弟始终处于斗争的风口浪尖。由于苏轼那率直的天性，雄辩的口才和辛辣的笔锋，首先被陷“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五年。此虽属个案，却震动朝野。后哲宗亲政，新党得势，大规模迫害元祐党人，东坡又首当其冲，先贬惠州，再至儋州，必欲置之于死地。期间，他“深自闭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见及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即使偶尔与人书信，往往再三叮嘱“不须示人”或“看乞，火之”。苏轼也说：“士大夫皆讳与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巢谷传》）孤寂无望与觥觥惶恐之情，可见一斑。长达七年的流放生涯已使他们“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随之而来的蔡京当政，更是彤云密布，党祸再起。苏轼还没有下葬，就被“追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其元追复旧官告交纳”。苏轼也“自太中大夫降复朝奉大夫”。在后来的元祐党碑上，兄弟二人两度榜上有名，尤其是苏东坡两次都被列为待制以上官员的首恶。对他们的学术著作诏令“毁书绝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剥夺一切政治权力。

世道有升降，人心无古今。我们现在说起千年前轼、辙兄弟的遭遇，可能没有切身体会，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扩大反右或十年动乱时期的情景，就

可以感同身受他们的境遇。那时的他们无异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牛鬼蛇神”，“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更何况苏轼还是犯有前科的“极右加反革命”，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他们还敢有何奢望？

时差上下近千年，专制暴力所造成的恶果是类同的。轼、辙兄弟二人此时已经彻底沦为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古人历来重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但更重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遥想治平二年，兄弟二人置办父亲苏洵和轼夫人王弗的丧事，奉皇命官船直送眉山故里，朝廷诏赐银绢，达官贵人各致厚赠，沸沸扬扬，风光无比。昔日他们是展翅云天，比翼齐飞的一双“凤凰”，而今却是遍体伤痕，人人嫌恶的两只“乌鸦”，天壤之别，今非昔比，“愧见江东父老”之情，尽在不言之中。

轼、辙兄弟葬郟，除了政治形势所迫外，还有多种因素。苏辙自绍圣元年在许昌西买田，至建中靖国元年已七年之久，“子孙安之，殆不复迁”。那时的中原腹地正值政治经济隆盛时期，类似于今日之京津地区。而眉山故里早已人去楼空，廖无亲人。另外苏辙之所以定居许昌，选择墓地于汝州郟城，受范镇影响颇大。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仁宗时举进士第一，知谏院，授端明殿学士，累封蜀郡开国公，一生为官以忠耿直谏著称，与苏洵故交，晚年定居许昌。轼、辙常得其关照提携，亲如叔侄。苏过之妻及苏远之续娶皆为范镇之孙女。苏、范两家不但是老乡加姻亲，而且在朝政治倾向又相一致，关系非同一般。苏辙在《祭范子中（镇之长子）朝散文》中说“苏氏、范氏，同出坤维，蜀公告休，居颍之湄，我老去国，归亦从之。”对此，苏学大家孔凡礼先生在他撰写的《苏辙年谱》中说：“苏辙谋居与定居颍，与范氏有联系，镇及妻葬于汝州（临汝）之襄城，苏辙兄弟葬于郟城，属汝州，皆在汝州之东南，相距甚近。”

苏东坡在人生的最低谷，无奈之中选择了郟城，郟县的山山水水敞开无私的胸怀，热情地接纳了这位昔日的罪官，今世之骄子。郟县因为苏东坡而增加几多光彩，苏东坡卧静小峨眉安享千年。郟县人民视三苏坟为“传家之宝”，细心呵护，爱戴有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即使在风雨如磐的十年动乱期间，人们也千方百计智护圣贤，使三苏墓祠较为完好的留存。常言道“患难之交贵似金”，千百年来这种历经沧桑的情意比金子还贵重，比白

玉还纯洁。这比那子虚乌有的“练汝说”，比那难以使人信服的“形胜说”，岂不是要悯诚得多，圣洁得多吗？

思考和启示

回顾苏轼葬郑探因之旅，感慨颇多。公允地说，无论是“练汝说”，还是“形胜说”都有一定道理，均为依据事理主观推测之言，尽管缺乏直接证据，却代表着一个时期的认知水平，表达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崇敬苏东坡的殷切心情。人们的认知过程总是由不知到渐知，逐步深化，逐步修正完善的。

有一个问题长期萦绕笔者脑际：苏轼致子由第八简中关于葬地的一段话，与苏学其他著作一样传世近千年，为什么那些汲汲探索苏轼葬郑之因的士人学子就没有发现？最近，我县长期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原副县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第四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年近八旬的高文焕同志坦言告诉我，苏轼关于葬地的一段话，他是1982年在黄冈召开的第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从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那里听到的。至于看到第八简全文就更晚了。后来他从河南大学借到一本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如获至宝，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抄写一遍，前后耗时七个月。

高县长的一席话使我释然！看来，探讨苏轼葬郑之因长期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主要原因是郑县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占有资料有限。人们仅面对“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的遗言，极易产生无尽的遐想。而知道第八简关于葬地这段话的圈外人士，往往又不会把它和葬郑之事联系起来，这或许就叫做“说者不知道，知道者不说”吧！因而才使探索之路显得曲折而又漫长。行文至此，不由笔者想起坡翁《日喻》中眇人“扣盘扞烛”以为日的故事。如果像眇者那样只求一点，不及其余，片面、孤立地观察认知客体，必然会闹出穿凿附会的笑话。从而使我们悟出全面调查研究，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我们只有运用三极思维的科学考证方法，准确把握，精心“吃透”二苏的一系列文字资料，把认知客体放到北宋末年社会政治的大环境和苏家人事关系的小环境中去分析研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胸怀东坡，目游北宋”，自然就能得出苏轼葬郑是无奈的选择这个比较接近历史的结论。

事实证明，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两极思维方法是没有生命力的，陈陈相因，积非成是的陋习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惯性的势力是强大的，改变已有的成见是艰难的，否定自我更是痛苦的。但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历史总是要进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让我们放下种种思想包袱，充分解放思想，发扬苏东坡实事求是、勇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把苏学研究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推向政治化、社会化、群众化的新高潮，找回历史事件之真相，廓清历史人物之原貌，更多地发掘博大精深的三苏文化宝藏，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此，方无愧于坡翁，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参考书目

- 苏轼《苏东坡全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
苏辙《栟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孔凡礼《苏辙年谱》，中华书局2001年版。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1年版。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
《郾县志》（清同治三年），郑州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郾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三苏坟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王正瑞《三苏坟艺文类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年版。
《苏东坡在平顶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郾县名胜古迹》，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徐中玉《苏东坡文集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
2010年8月5日定稿
（河南省郾县财政局）

苏东坡与美好女性

——辛卯年五月“三苏文化沙龙”综述

廖文凯

在苏东坡的一生中，有几位女性对他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欣赏苏东坡的千古绝唱，感受他“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情，深刻体会到苏东坡毕生对美好女性的尊重、呵护与赞美。

端午节之际，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市诗词楹联学会在远景楼举办的主题为“苏东坡与美好女性”三苏文化沙龙上，应邀参加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名誉会长曾枣庄、邱俊鹏，与眉山市相关领导以及苏学专家、文化学者共话“苏东坡与美好女性”。

“佳人相见一千年”、“来生便嫁苏东坡”，诸如此类曾经风靡网络的滚烫热辣盟词重在这火红的六月天金光闪烁、激情燃烧。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在作热情洋溢的致辞之后，在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著名作家刘小川以及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徐丽女士的共同主持之下，将“苏东坡与美好女性”这个妙趣横生的话题引向热烈和深入，一席精彩发言碰撞出一缕缕美丽的火花……

上篇 才子佳人那些尘封千年的美丽往事

纵观这次文化沙龙大家所谈，无不涉及对苏东坡毕生影响至深的四位女性，她们分别是苏东坡的母亲程氏、妻子王弗、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侍妾王朝云。除了母亲程氏，一个是苏东坡年少时期的结发妻子，一个是与苏东坡同甘共患难的女子，还有一个是陪他度过晚年的红颜知己，三位女性出现在苏东坡一生中的不同时期。

苏东坡与王弗

王弗是苏东坡的第一位结发妻子，十六岁就嫁给苏东坡，二十七岁却红颜早殒。与苏东坡共同生

活的十一年里，正是苏东坡发奋学习和步入仕途的时期。王弗是一个才女，与苏东坡称得上少夫少妻，两小无猜，郎才女貌，可惜她，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寰。苏东坡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称她是贤内助。

就在王弗去世十年之后，有一天夜里，苏东坡忽然梦见了她，醒来即写下这首流传至今的千古绝唱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上千年来，这篇绝唱不知让多少人泪洒其中，扼腕叹息！

苏东坡与王闰之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进士之女，以十一岁的年龄相差给姐夫苏东坡填房，毕生充当着贤妻良母和糠糟夫妻的角色。她不但视王弗之子如己出，而且陪伴苏轼经历了宦海的大起大落。

在苏东坡与王闰之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年里，不仅遭到了“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黄州贬谪”的厄运，过了不少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苏东坡极为失意的时期，王闰之的全力支持这个贫困的家，与苏东坡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度过困难时期。应该说，王闰之与苏东坡之间，最浓的是亲情，最真的是同心。

王闰之去世后，葬礼极为隆重。苏东坡亲自为她写祭文，承诺“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在王闰之的百日祭上，苏东坡请挚友、著名画家李公麟画了十张罗汉像，并在为她诵经超度时，将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灵。其后，王闰之的灵柩一直停放在京西的寺院里。

公元1101年，六十五岁的苏轼在从荒蛮之地岭南应召回京途中凄然而逝，弟弟苏辙把他在京

西寺院里停放了十年的王闰之的灵柩一同安葬，苏东坡终于实现了他与王闰之“惟有同穴”的盟誓。

苏东坡与王闰之生活的这段时期，苏东坡处于中年，是他精力最为充沛，然而又是他一生中多灾多难的时期。这时期，苏东坡为我们留下了《水调歌头》、《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

苏东坡与王朝云

熙宁七年，三十九岁的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为了给继室王闰之减少家务负担，苏东坡收养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作为王闰之的侍女，她就是王朝云。王朝云比苏东坡小二十七岁，聪明伶俐，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思想。

有一天苏东坡坦腹歇凉，露出大肚皮，他开玩笑地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肚皮里装的是些什么？”有人回答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连连摇头。这时，站在一旁的王朝云笑着说：“我看你呀，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王朝云才是真正理解自己的红颜知己。

“乌台诗案”结案后，苏东坡谪居黄州，做了一件令黄州人民永远难忘的事情，那就是拯救溺婴。虽然苏东坡头顶着“罪臣”的恶名，但他仍以个人名义与鄂州太守朱寿昌去信，恳请他出面革除此种陋习，并在黄州自发组织拯救溺婴小组。在自己生活异常困难情况下，率先拿出“一千钱”，帮助那些即将生养小儿的穷困人家。

苏东坡高尚的人格、菩萨般的心肠，让王朝云感动不已。王朝云曾见过苏东坡任密州太守时拯救饥荒被遗弃的孩子，而今又看到身处逆境的苏东坡心胸依然坦荡。她从内心深处对苏东坡产生了敬意，决意一生侍候好这位心地善良的蒙难之人。

王朝云对苏东坡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令苏东坡心领神会。就在苏东坡人生旅途最为艰难的时期，征得王闰之同意，苏东坡将十八岁岁的王朝云正式接纳为侍妾。虽然两人年龄相差甚远，但是爱情没有年龄界限。火热的激情，将一对才子佳人紧紧地拴在一起：一个学富五车，一个敏而好义；一个心怀坦荡，一个柔情似水。

只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公元1094年，苏东坡已经年近花甲，却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侍从都不敢跟着去，只有王朝云坚决追随苏东坡南下，与苏东坡同甘共苦，生死相依。

只可惜，王朝云在惠州因为水土不服等原因，一年多后，34岁的王朝云病逝于惠州。苏东坡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作散花天女。

有人说，王弗之死，应该是对历史的成全。家庭的突然残破虽然让苏东坡很伤心，但是王弗去兮，王闰之去兮，苏东坡这时候碰上了美如春园、眼若晨曦的王朝云。如果不是这样，苏东坡就不会有西湖船上的灵思妙想，就不会有以后的多灾多难，就不能展开绮丽的双翅，中国文化史就会因此黯然失色。

中篇 美好女性把苏东坡推向了文化的巅峰

从苏学专家到文化学者，参加此次“三苏文化沙龙”座谈的人，无不形成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母亲程氏对苏东坡的人生观形成，特别是在苏东坡为官之后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妻子王弗、继室王闰之、侍妾王朝云这三位美好女性，更是为苏东坡擦燃了文学的火花，随着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名篇问世，逐步将苏东坡推向了文化的巅峰。

三苏祠博物馆馆长杨常沙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若把父亲苏洵喻作种子，把母亲程氏喻作土壤，妻妾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则好比养分。是这些美好女性给予了他充足的养分，才使苏东坡茁壮成长为一棵穿越千年时空依然不朽的参天大树。”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曾枣庄说，苏东坡成功的背后都有美好的女人，他在人生的三个时期分别遇到的三个美好女人，都有惊艳于世的好作品问世。尤其是母亲程氏了不起，培养出了苏轼、苏辙两个好儿子。

记者从2010年4月14日，曾枣庄教授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访谈的一份资料中，找到并印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曾枣庄说，自古以来四川文化较为发达，元代以前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无论婉约词还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都产生于四川。宋代刻书业很发达，眉州就是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这些只是出现三苏的大环境，至于三苏出现的具体原因，一是靠他们自己努力，二是靠母亲的培养、妻子的支持。

苏轼兄弟少年时代以母为师，在苏洵游学四方时，母亲程氏对他们亲授以书，成了他们的家庭教

师。她曾教他们读《后汉书·范滂传》，要苏轼兄弟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在苏轼十岁以后，则是以父为师。苏洵经常以他在游学中的一些感受教育苏轼，他非常推崇颜太初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苏轼兄弟一生牢记“先君之遗训”，不为文而文。

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载：“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旦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表明程夫人早就希望苏洵能发愤苦读；但学习必须靠自觉立志，如果因父母、妻子要求自己读书而勉强应付，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取得成绩的。

司马光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曾枣庄说，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程夫人，三苏父子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就的。

的确，王弗、王闰之、王朝云等美好女性激发了苏轼的创作灵感，从而诞生了《江城子》、《水调歌头》、《赤壁赋》、《念奴娇》、《蝶恋花》等千古绝唱。正道是，美好女性催生了苏东坡的好作品不断问世，逐渐将苏东坡推向文化的巅峰。

下篇 苏东坡与美好女性是当今和谐社会的典范

张志烈：苏东坡至始至终把对女性的尊重，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他的这种高尚境界不仅使他成为北宋女子的梦中情人，就连当代女子也撰文表达自己的心愿《来生便嫁苏东坡》，足见其人格魅力是横贯古今的。

邱俊鹏：苏轼一生为女性写过很多诗词，均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他对女性的赞美和爱也是非常高尚的。

王影聪：通过苏东坡与美好女性的那些经历，可以看出他尊重女性，热爱女性，赞美女性。尤其

是他对女性的尊重与呵护，与当今一些人对女性的恣意践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成仕：这次“三苏文化沙龙”的选题很好。苏东坡无论成长、仕途乃至文化上的成就，都与美好女人相关。程夫人教子有方，我们的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当向程夫人学习，学习作为古代女性杰出代表的这种伟大精神。

宋明刚：苏东坡尊重女性、赞美女性，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金庸夫人说，每读一次《江城子》就会流泪一次。

刘川眉：母亲程夫人是苏东坡来到这个世上所接触的第一位美好女性，程夫人闭上双目后，都未能看到三苏父子成材，未能享受到辛勤教育孩子收获的劳动成果，程夫人奉献的一生，体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王军：一个好女人就是一所好学校。苏东坡年少时，有“以母为师”的程夫人教育，在他成人后王弗、王闰之、王朝云这些美好女性的浇灌。因此，苏东坡与美好女性，构成了他艺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忠全：苏东坡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是美好的。他对女性非常友善，欣赏她们，呵护她们，赞美她们。今天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家庭和谐才能构成整个社会的大和谐。无疑，苏东坡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苏东坡的家庭就非常和谐。

黄玉璠：“三八”节妇联也可举办有关活动，程夫人、王弗、王闰之、王朝云的贤良淑德是值得现代女性学习的，有利于促进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

华子：苏东坡之所以能成为当今文化的巨人和生活的全能，是因为母子之爱、夫妻之爱、友情之爱、兄弟姊妹之爱，总之世间的所有爱，苏东坡都享受了。

（《眉山日报》记者）



“美好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李海燕

远景楼上望远景，东坡湖畔品东坡。6月3日下午2时30分，远景楼11层的茶厅里，随着氤氲的茶香向四周弥漫开来，由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和眉山市诗词楹联学会联合举办的主题为《苏东坡与美好女性》的文学沙龙活动如期举行。

主持人刘小川在开幕词中介绍了本次文学沙龙活动的主旨：“德国诗人歌德说过‘美好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在中国古代的大文豪里，受女性影响最深的，可能就是苏东坡了。因此今天，我们汇聚一堂，一起来分享苏东坡与美好女性的故事。”

四川大学教授、著名苏学专家曾枣庄、张志烈、邱俊鹏就率先就“苏东坡与美好女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曾枣庄说，苏轼的伟大成就与母亲程夫人的良好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说是程夫人的良好教育让从小不思学习的苏轼有了最终的伟大成就。张志烈认为，苏东坡至始至终把对女性的尊重，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他的这种高尚境界不仅使他成为北宋女子的梦中情人，就连当代女子也撰文表达自己的心愿《来生便嫁苏东坡》，足见其人格魅力是横贯古今的。邱俊鹏说，程夫人善于教育孩子，她的两个儿子不但文才过人，而且为人也不错。苏轼一生为女性写过很多诗词，他对女性的赞美和爱是高尚的。

王晋川表示赞同，他说，司马光在为程夫人写的墓志铭中诠释了“贤慧”二字，其实，程夫人作为苏东坡的母亲，可以与孟母、岳母齐名，甚至比她们更优秀。她出生在一个家世并不见好的家庭却格外贤德聪慧，为丈夫、孩子默默奉献一生，成就了伟大的“三苏”。孙开中也说，任何人都可以没有妻子，但不能没有母亲。苏东坡有一个好母亲，他受母亲的影响非常深。

苏东坡不但有一个好母亲，还有好妻子、好侍妾，他们为苏轼默默奉献的精神同样为大家所称道。黄玉成认为，苏东坡身边的“二王”夫人温柔

敦厚，侍妾朝云更是一个美丽的谜，她从十一岁跟随苏东坡到三十四岁时羽化登仙，整整二十三年，是苏轼的“红颜知己，忠实伴侣”。孙开中却认为王闰之最好，他说，王闰之与苏东坡相处时间最长，感情甚好，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共得患难，无愧为“美好女性”。他还指出，苏东坡是个风流而不下流的人，虽然姬妾成群，但并不都是与他有性关系，因为在古代，男人有妾，女人也有妾。侍妾才是有两性关系的人，比如朝云。徐济文、赖正和也认为，侍妾和妾应该有所区别，苏东坡不是现代人想象的“姬妾成群”的“风流才子”。

王影聪说，苏东坡曾以美好女性“西子”来比喻美丽的西湖景色，足以看出，他对女性是饱含尊重和赞美的，不像与他同时代的官员，大多都对女性随意践踏，他的这种高尚品德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张忠全说，在苏东坡眼中所有的女性都是美的，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他的为人之道。宋明刚说，正因为苏东坡尊重女性、赞美女性，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那位烟台老师才会写出感人肺腑的文章《来生便嫁苏东坡》，金庸夫人也曾说，每读一次《江城子》就会流泪一次。王军在发言中说，与美好女性相匹配的当然是美好男性。俯仰古今，苏东坡无论作为文人，还是官员，都是值得广为传颂的美好男性，他是百姓心中智慧的化身，是官员学习的清廉楷模。“妻贤夫祸少”，美好女性与美好男性是相辅相成的。熊朝东认为，东坡诗词之所以灵动，充满激情，是与苏东坡身边有着众多的美好女性分不开的。美好女性对男性有很大的激发力量。

杨常沙说，如果说苏东坡的父亲是优良的种子，母亲是肥沃的土壤，那么与他有关的美好女性便是他后天汲取的肥料和养分。这些女性是他当一个人，当一个大文学家的最大底气。他认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是否优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性，而不是男性。（下转第78页）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八）

——命运多舛

雷金贵

三〇 秀才造反的必然选择

苏东坡当然有他的局限。

历史的局限。

时代的局限。

任何人都不是完人。

金还没有足赤呢。

就是神仙，也有他们的弱点。

有神仙吗？

现在有一类批评家，总爱用现代标准，甚至个人好恶，拿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说事，拿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说事。甚至把历史简化为成王败寇，甚至把历史戏说为张非张李非李。以史为鉴，是为不重蹈覆辙；所以议史，不管是人是事，应用历史的眼光，也要用发展的眼光。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社会的发展是曲折的。

儒文化的背景里，读书人的读书，并不是要做小说家，做诗人，做散文家，做杂文家，做戏剧家……他们的抱负，在于治国平天下，苏东坡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却把实现抱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们只能这样。他们不能不这样。

这就是历史。

苏东坡同样也不例外。

好像，还没有过秀才造反的历史。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才有秀才领衔的戊戌变法；直到1919年，才有年轻的学子，走出书斋，走上街头。

如果他们幸运，遇上了开明的皇帝，其才华就能尽情的施展。中国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盛世”里，皇帝的麾下，就聚集着一大批文韬武略的人才；而当某“家天下”走向衰微的时候，都是奸臣弄权了。以宋来说，北宋之章惇、吕惠卿、蔡确等等，所谓新党人物，一步一步地，把北宋搞灭亡了；南宋的蔡京、秦桧等等，把苟延残喘于一隅的南宋，彻底的葬送了。

苏东坡不幸运，赏识他才华的仁宗和英宗皇帝，都没有来得及重用他，就呜呼哀哉了；虽然他一生都得到了皇后的偏爱，没有被一棍子打死，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我说过，皇帝是靠不住的。我

敢说，即使仁宗皇帝，即使英宗皇帝，有时间给予苏东坡机会，苏东坡的荡涤刷新，也很难施展，在他之前，王禹偁、范仲淹的新政，都短命了。而且，宋朝官场那种告密和攻讦恶习，那种朝三暮四的人事变易，尤其神宗皇帝起始，今天把张三推上台，明天又把李四弄上浪尖，苏东坡把朝廷没有基本原则的人事政策，喻之为“三易医而病愈甚”，杂乱投药的北宋，缺乏荡涤振刷的土壤。我的意思是说，即使苏东坡有机会一展身手，最终也逃脱不了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一样的命运。因为皇帝，不可能让家天下变为民天下，这是要害的要害。

几千年的历史里，几乎所有意图经时济世的知识分子，其命运都没有逃出一个宿命的轨迹——金榜题名，郁郁而不得志，皈依林泉，寄情山水。苏东坡后来很喜欢陶渊明，作了很多和陶诗，也是没有逃出那个轨迹。

这是秀才造反的一种选择。

这是必然的结局。

历史的必然。

皇家天下，皇权思想，不被彻底打破，新政也罢，新思想也罢，一切都是空了摆——茶余饭后摆摆龙门阵罢了。

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立场，对历史说三道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就是历史。应该是，我们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为鉴，观照今天，面向未来。

所以我说的是历史的苏东坡。

我们不能苛求历史。

三一 家事之变

苏东坡意图的裕民之举、强军之举、强国之举、吏治之举，或者说，苏东坡意图卓然有所立的所有主张，遗憾得很，全都付诸了东流。

追究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是家事国事的大变化。

家事的变化，推迟了苏东坡真正踏进“仕场”的时间。

苏东坡踏上仕途的初期，母亲程夫人，也是苏东坡的启蒙老师之一，是在苏东坡金榜题名不久，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依照宋朝律治规矩，东坡兄弟辞官归蜀，为母守丧。那个时候，从西蜀之眉州，到皇城开封，或坐木船，或走步行，来来去去，费了三年多些时间。

苏东坡守丧回京，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却没有到任。不是苏东坡嫌弃官职小了，瞧不上，而是恩师欧阳修爱才，直荐东坡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这次考试，给了苏东坡系统阐释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他向仁宗皇帝呈上了二十五篇《进策》、《进论》等，加上他四年前进士考试时震动京师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苏东坡把仁宗皇帝振动了，视苏轼兄弟为宰相之材。

仁宗皇帝坐了数十年的天下，在整个赵宋历史中，算得最鼎盛的时候，包拯、范仲淹、“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等等著名人物，多出于仁宗朝，群星闪耀，光照千秋。我的意思是，经验老到的仁宗皇帝，把苏轼兄弟视为为子孙选拔的宰相人才，自然是不会看走眼的。

制科考试后，苏东坡被任命为凤翔签判，仁宗皇帝原本是想把他们留在京城，委以重任，予以培养。但皇帝采纳了大臣的建议，先把年轻的苏东坡，放到基层去锻炼。

从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到真正踏进官场，苏东坡已经二十六岁了。

在苏东坡三十一岁那一年的四月，父亲去世，苏东坡和苏子由，再次辞官，扶柩回川，居乡守丧。这一次，同时被扶柩回家的，还有苏东坡的结发妻子王弗。之前一年的五月，仅仅和苏东坡生活了十余年的贤内助王弗，也撒手而去了，他们的感情很深，他们的爱情很甜蜜。

他们的爱情，很值得一说。他们的爱情，与水有关。

苏东坡的老家，四川眉州，就是我现在“讨着生活”的城市，在岷江边上，顺流而下，只需小半天，就到了王弗的老家青神，号为蚕丛氏的故里。青神的岷江边，有一古刹，名曰中岩寺。中岩寺的半山处，有一天然池水，名为唤鱼池，巍峨的岩壁上，苏东坡手迹的“唤鱼池”，刚劲而洒脱。唤鱼池是苏东坡和王弗浪漫爱情的见证。

苏东坡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中岩书院求学，老师王方，是乡贡进士，后来成了苏东坡的老丈人。某日，我把它想象成风和日丽的一天，王方在一天然的池水之滨，举行为池命名的游乐会，其实是要为他的才貌双全的女儿，选择乘龙快婿。消息传出，方圆几十里的俊才学子，赶场一样的，会聚而来，场面很是闹热。命名开始，好像八仙过海，各显身手，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却都不中王方的意。

待到苏东坡登场亮相了，但见他踱步到池边，轻轻一拍手，那藏在池水里的鱼，悠然地游泳而出。于是，苏东坡面向众人，朗声道，命名唤鱼池，可妙。王弗在闺房里为水池命的名字，写在一张素绢上，也恰在此时，让丫鬟送到现场，王方展开一看，居然也是唤鱼池。

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池从此就叫了唤鱼池。

这唤鱼池就结了苏东坡和王弗的姻缘。

说这么多，我是要说，苏东坡很爱他的妻子，很爱他的家。我有一个观点，纯属个人意见，不一定要人人都赞同，那就是，不爱自己的老婆或者丈夫，不爱自己的家，要让他爱国，爱人民，那是空话。现在，市面上流行着一个说法，那也不是凭空捏造的——升官，发财，死老婆——说的是一些成功男人的三样渴望之事。在王弗去世十年后，苏东坡在密州任太守，写下悼念王弗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我以为，在多如牛毛的爱情诗中，能够超越这首东坡词的，不多。和苏东坡做事的态度一样，苏东坡对他爱着的人——妻子、父母、子女、朋友、百姓，用的是真心。文章，玩弄技巧也罢，堆砌辞藻也罢，在真情面前，比已入膏肓的病人，还要苍白。

中岩寺，不仅记载了苏东坡的爱情故事，而且，当年的中岩，交通商贾，往来骚客，李白、杜甫……在历史的星空里声名赫赫的人物，都在中岩唱和吟诵。最著名的当数李白在此写下的《峨眉山月歌》。所以民间至今都有一种说法，先有中岩，后有峨眉。现在的峨眉山，名声很大，而中岩寺，几乎已经被湮灭了。这些年，当地一直在努力把它作为旅游风景来开发，因为没有新颖的创意，没有资金的投入，所以效果一般。

青神，与眉山比邻而居的蜀中小城，对苏东坡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政治生活，影响至深。

三二 国事之变

国事的变化，影响了苏东坡的仕途环境。

仁宗皇帝，视苏东坡为宰相人才，是想重用他的，但是皇帝还没有来得及起用还在凤翔锻炼的苏东坡，仁宗就寿终正寝了；苏东坡为仁宗皇帝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凤翔做签判时，受命督察自陕西运输木材到京城，为仁宗皇帝修建寝陵。

苏东坡在凤翔三年任满，他千里迢迢回到京城，需要重新安置，坐到金銮殿上的，已经是英宗皇帝了。

苏东坡的才华名气，英宗早就知道，苏东坡一回京城，英宗皇帝就要破格提拔他，拟任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但是宰相韩琦反对。皇帝还是

放不下苏东坡，又准备把宫中公务记载之职，交由苏东坡执行掌管，韩琦还是反对。韩琦为什么反对，后面的文字里，我将有话要说。

韩琦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任职，而且，不是直接提拔，和其他人一样，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

经过考试，苏东坡以最高的“三等”入选，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首次在朝中任职殿中丞直史馆。宋朝时候，设置三馆，为集贤院、史馆、昭文馆，掌管校讎典籍图书管理的事务，好像现在的图书馆职务，当然那是皇家的图书馆，所以特重文才，一经入选，就跨进了名流的行列。馆职高低，最高为修撰。次之为直馆，其三为校理，末者为校勘、检讨等。苏东坡以最高的三等入选，却没有得到最高的职位。有一个说法，宋人治蜀，一直是高压政策，政坛对蜀人也一直很偏见，不予重用，北宋时候，近百位宰相，蜀人仅有可怜的四人，开国时候的太祖、太宗两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没有一个蜀人；至于苏东坡，从政几近四十年，虽然官至文学侍从之臣，却从未掌控过可以改变事物走向的权力，每一次苏东坡将无限接近那种权力的时候，就会遭到无情的攻击，让皇帝下不了决心。即使如此，也有人为苏东坡戴上了“蜀党”领袖的高帽子，那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倒是英宗的皇后、哲宗十八岁前垂帘的那位太皇太后，很知道苏东坡的苦衷：“只有老身晓得，你们兄弟二人，在朝廷中，不愿意做应声虫，自来感到很孤寂。”

我在想，如若不是有这样一段插曲，苏东坡后来的命运，或许又是另一番光景，甚至，我们的历史上，会少了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大师，而多了一位或许早以被人遗忘了的宰相。在封建王朝的背景里，在皇帝的家天下，即使苏东坡能够有机会推行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可以肯定的是，绝不可能善始善终，苏东坡的主张，既要动皇家的奶酪，也要动整个上层建筑的奶酪，其荡涤刷新的力度，甚于王安石的变法。而苏东坡在朝的时间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经典作品。

我们可以假想如果怎么样，历史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这些后来人，好做事后诸葛亮。而其实，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

苏东坡刚刚经过考试，在史馆任职，结发的妻子死了。次年的四月，父亲又死了。待苏东坡从四川老家守丧再回京城，只坐了四年天子的英宗皇帝，早就一命呜呼了。

此时的天下，已经是神宗皇帝的天下。

王安石，曾向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未被采纳，就一直在朝廷之外韬光养晦，现在终于出山了，神

宗皇帝信任有加，王安石遂按自己的主张，排除异己，急进用事，朝廷里风起云涌。王安石的主张，很合神宗皇帝急于有功的心态，原本就是拗相公的王安石，虽然只是个副宰相，但是有了皇帝做挡箭牌，就有了一人之下的权力，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掀起了北宋熙宁的狂风骤雨。

其实，神宗皇帝是很看得起苏东坡的，他把苏东坡贬谪到黄州后，也是几次要启用他的，“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被当路者沮之。”“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但是“皇帝的天下”，已经被政治小人把持，皇帝的金口玉言，也不管用了，就像王安石，提拔了那些政治“新锐”，却被他们毫不留情的赶出了朝廷一样，神宗皇帝好像也驾驭不住他们了。

苏东坡在黄州的第五年，神宗皇帝好像晓得自己命将不长，发出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本能，要解放苏东坡了。在自己的提议多次被挡回后，不得已，使出了手札，皇帝自己草拟文告，移轼汝州。“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这是神宗皇帝将要启用苏东坡的信号。苏东坡没有到汝州去，他已经是奔五的人了，他请求允许去常州养老，这一次，朝廷很干脆，“朝奏，夕报可。”这里面，颇有玄机，苏东坡虽是罪犯，身在黄州，心却在天下，没有发言权，却代官写奏，以诗文发言，在黄州时候的前后赤壁赋、大江东去等等，让他的声望不仅没有损伤，反而日盛一日，现在皇帝释放他，有朝一日是要调动他回到朝廷的，如果这样，一些大权在握的人，日子将不好过，或许有些人正在密谋，阻止他的东山再起，既然他递交了申请，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那就让他去养老吧，有人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后面的文字里，我将用专门的章节，写苏东坡在朝廷做官的际遇，以及他的“天真的官念”。

神宗皇帝把苏东坡软禁了五年，无心插柳，完善了苏东坡，升华了苏东坡，成名了黄州，成就了黄州。神宗皇帝，急功近利，使用了一大批新锐，却没有给他带来期望中的结果，他准备启用苏东坡了，老天爷却不给他机会，苏东坡才到常州，他就一命呜呼了。

苏东坡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就是韩琦反对英宗皇帝破格提拔他的例子，力劝神宗皇帝不可用人太急，但是，神宗皇帝听不进去，一任王安石专权集权，把一大批老臣，纷纷赶出了朝廷。志不同，道不合，事情自然不可以谋。苏东坡与王安石，其政治主张，不在一条道上。朝廷当然就不是苏东坡呆的地方。

苏东坡五十岁那年，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流放等等坎坷后，十岁的哲宗皇帝即位，高太后

垂帘听政，苏东坡的政治生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做了小皇帝的老师，而且，在几个月间，虽然他一辞再辞，官位竟然连升三级，至于翰林学士知制诰。

宣仁后曾问他：“何以遽至此？”

苏东坡的几个答案都不对。

宣仁后说：“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

再次回到朝廷，苏东坡已经风霜满面。

重新执掌朝政的司马光，按一般的划分，苏东坡应该是他的同党，同属旧党一派。前面我还说了，苏东坡还是司马光的门生，王安石变法的初期，司马光曾极力举荐苏东坡出任朝廷要职，虽未如愿，却看出司马光对苏东坡才华的赏识。以牛脾气一样倔强而出名的司马光，王安石变法初期，他荐人不被用，他的建议不被理睬，他就发了牛脾气，皇帝一再挽留，他却不给皇帝面子，执意地远离了朝廷，深藏在洛阳的某个宅子里，潜心自己的著述，修撰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如果，历史当然不会有如果。如果他能在朝廷，以自己老臣重臣的力量，给予王安石一定的制衡，或许变法又是别样结局。后来再次出山的司马光，又发出了牛脾气，出于对王安石的否定，而不分青红皂白，对新法予以全盘否定。苏东坡坚决地反对，而主张兼用其长。于是，苏东坡遭到了新、旧两党的无情夹攻，而致于在政治旋涡的中心，无法施展自己的主张。

所以老实说，苏东坡仕途的坎坷沉浮，有阴错阳差的错失了机遇，其实，最关键的，是那些政治小人，借了皇帝的手，对苏东坡实施无情的打击。

苏东坡是个性情中人，是个认真的人，是个认定事实的人，不善于察言观色，不善于上下勾兑，不善于阳奉阴违，他赞成就赞成，反对就反对，不遮掩自己，不伪装自己，《苏轼传》说：“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如果真是这样，苏东坡也随波逐流，也就没有苏东坡了。苏东坡三次在朝廷，都有机会获得高官，尤其在元祐时，司马光死后，凭着他的声望，凭着太皇太后的无比信任，如果他耍一些手腕，完全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但是苏东坡就是苏东坡，“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义谏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疾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苏东坡属于民间，不属于朝廷，对朝廷中你争我夺的乌烟瘴气，正合了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郁闷，苏东坡很郁闷，遂一而再请求外任。熙宁元丰间，先通判杭州，然后知密州、徐州、湖州，谪黄州，量移汝州，元祐绍圣元符间，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

赴定州任时，“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轼不得入辞”。

苏东坡，哲宗皇帝的老师，居然落得如此结局。

苏东坡却将个人利害置之度外，既行，还向哲宗皇帝上书——

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臣恐激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大祸将临，尚在为国家为皇帝出谋划策，耿耿忠心，昭然天下，无私无欲，可鉴日月。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呜呼归天，哲宗亲政，启用新党人物，章惇、吕惠卿当政，苏东坡的命运，由此而急转直下，定州之后，是一贬再贬，谪英州，再贬至惠州，再贬至琼州……

如果，苏东坡的仕途顺畅一些，他的主张会被付诸实施？北宋的历史会被改写吗？

这还真的难说。

现在来做假设，好像已经没有意义。

我要说，这不对！

为什么？

答案很明白，历史不仅是历史的镜子，也是今天和明天的镜子。

（未完待续，眉山电视台副台长）

（上接第74页）

华子也说，苏东坡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他拥有美好的母子之爱、夫妻之爱、姐弟之爱、异性知己之爱。几乎所有与女性有关的爱，他都拥有了，这是他成为一个优秀男人的必备前提。

对此，黄玉璠建议，在“三八”节，妇联举办有关活动，学习程夫人、王弗、王闰之、王朝云的贤良淑德，促进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周成仕指出，当前研究对苏东坡的生母和乳母的研究不够，对他的弟妇“史夫人”的研究不够，对“苏八娘”研究不够。

整个文学沙龙气氛热烈，其乐融融。邓湘娟朗诵《浣溪沙》（轻汗微微透碧纨）、杨芬朗诵《王氏生日致语口号》将苏东坡对王朝云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王志超与李晓苹合唱《永遇乐》（明月如霜），忧伤婉转、情动全场。余音未尽，徐丽一首苏州韵味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和另一首《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将大家带进了另一番如诗如画的情景中……

那一刻，大家与苏东坡同在，与苏东坡身边的美好女性同在，他们引领大家在诗情画意中不断上升，上升……

（东坡区新闻中心《今日东坡》编辑）

在眉山三苏祠诗二首

龚学敏

在眉山三苏祠，读水调歌头

她说，夫子不胜酒力。一个趔趄，我就跌进了，那片月光，锻打成的水调歌头。

言语洁净，像是衣衫的白，唤鱼时漂在水中的才情。我在听宋时的雨。那盏孤灯，映着长袖中散落下来的诗句。

夫子的酒杯空了。小二，拿酒和诗来，要蘸着陈年的月色。
我吟一句。你们就泪流满面，
就暖和。就像夫子一样的恋爱，让我知晓，直到月圆。
我饮一盏，就是黄荆开花，在水做的梦中，芳香。像是远处的母语。你们就衣着齐整，在岸边，
合唱，水草样干净，用聆听触摸那些宋时的拐杖。

她说，夫子不胜酒力。在那片月色的船上，那位姓苏的宋词，
把我写成了那尾在井中读诗的鱼，白，像是玉做的酒杯。老哥才情呵。在宋，风流成性情，成诗，成醉倒了的那井。我想起茶水中的无限风光，你们要小心，要斟酌，要一饮而尽。

有人在宋，在我的身边，读书，习诗，写字，还要恋爱。
还要用月光筑一座祠堂，让我身陷其中。
像是宋词中喂鱼的水草。你们在船上。看见了

我自己饮醉的那片月光。

我在当下。只有把线装的宋词，缓缓地，翻到第十七页时，
你们才可以月光。

在眉山三苏祠，饮茶

在宋词中萌芽的茶叶，已经精致成一枚枚的月光了。
在午后祠堂深处蛰伏的光阴中，蝴蝶瘦清，
像是一枝竹泊在纸上的声音。她们在远处的竹寮里，
翻检一片片的词牌，把她们透明的翅，
叠成玉做的鱼，在水中恋爱。让我用十年的时光，
茫茫，
不知生死。

一片茶，拂袖而去。像是我干净的诗歌，在秋天状的清晨，
闻风而动。

所有的花朵都要凋零在她们自己的芬芳中。
这是我饮茶的缘由。和前世抱着的那枝细腰。

在宋词中饮茶。水，要好水。一盏，敬那苏姓的鱼。
杯中的月光，是中国最好的茶叶，
可以情不自禁，千里。可以
把自己饮成宋词，被鸟鸣挂在枝头，并且，
伸进我用毛笔写出的好水中。

（《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

东坡为媒 心手相连 共谋发展

本刊台北 5 月 23 日电（王 欧）5 月 23 日，千里共婵娟——东坡文化交流会在台北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李静，中国国民党智库永续发展委员会执行长陈世圯，世界苏姓宗亲总会常务副理事长苏克福等出席交流活动并讲话。

李静在致辞中说，1000 多年前，东坡先生曾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著名诗句，眉山市经贸文化交流团越过台湾海峡，与相隔万里的朋友们相聚，正是对东坡先生这句诗词的最好注解。此次东坡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为了让台湾企业界、文化界的朋友认识眉山、了解眉山。她希望能以东坡

先生为媒，广交台湾社会各界朋友，促进相互往来与活动，心手相连，增进友谊，共谋发展，并诚邀台湾各界代表、朋友能到眉山观光做客、投资兴业。

中国国民党智库永续发展委员会执行长陈世圯说，两岸之间血浓于水，通过经济的交流让两岸手连手，通过文化的交流让我们心连心，心手相连，进一步加强两地联系，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交流。

活动还通过多种方式展示了东坡文化。眉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宣迅，有关区县和部门负责人及眉山企业家，台湾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长办公会在眉山召开

本刊讯（秘书处）6 月 3 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邱俊鹏、曾枣庄，会长张志烈一行莅眉，召集常务副会长、眉山市政协主席苏灿，副会长、眉山市委宣传部调研员宋明刚等，召开了会长办公会，就学会人事变动等事项进行商议，并形成决议。学会秘书处、学会就相关事项通报了不能与会的学会领导，他们电话上原则同意会长办公会议定的相关事宜。

根据工作需要，会议议定：增补中共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祝云为副会长，并任《苏轼研究》执行主编；眉山市政协副主席周成仕，继续担任副会长；同意蔡心华辞去秘书长一职；根据《章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任学会秘书长；增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刘清泉为学会副秘书长。

书 讯

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但多少年来因为翻不过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这道“坎”，一直不能从政治上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说苏东坡。

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赖正和十年前出版了《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今年即将出版《苏东坡

杂谈》，大胆地提出“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正确说”，翻过了那道难翻的“坎”，还苏东坡以历史的真实的政治面貌。现正开展《苏东坡杂谈》的征订工作，欲订的读者请与赖正和联系：电话：13909031993；电子信箱：Lzh37722@163.co（四和）